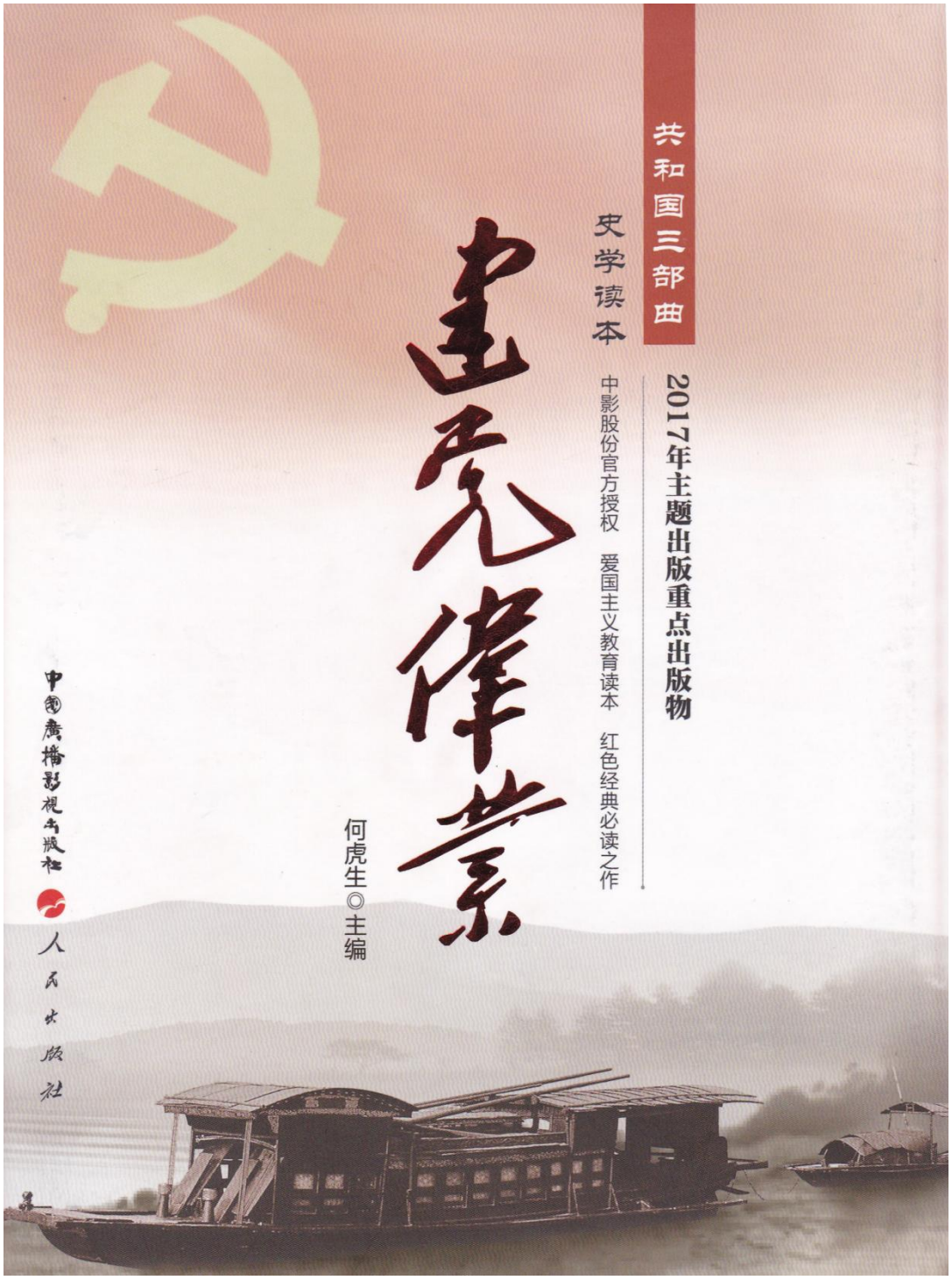

共和国三部曲
史学读本
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影股份官方授权 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红色经典必读之作
忠先偉業
何虎生◎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三部曲

史学读本

建党伟业

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影股份官方授权　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红色经典必读之作

何虎生◎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序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时序更替，留下的是奋斗跋涉的足迹，时间是奋斗者筑梦的见证，也是开拓者前行的刻度。在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历史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即将隆重召开之际，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共和国三部曲史学读本”丛书。该丛书是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影股份）已经上映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即将献映的《建军大业》三部影片改编而成。三部影片是我党、我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不同节点推出的献礼巨制，真实地记述了我党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生动地塑造了革命领袖与仁人志士的伟岸形象。全套丛书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文艺创作的指示精神，将是影视出版界具有政治意义与正面影响力的重要读物。

电影《建军大业》定于7月28日首映，此际推出“共和国三部曲史学读本”丛书，正是以建军90周年献礼为契机，其中的《建军大业》一书浓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90年的峥嵘岁月。随着南昌城头第一声枪响，一支伟大的红色武装宣告诞生。从此，这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武装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将一面八一军旗化作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不朽图腾。

特别是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民军队全面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强军目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开创出我军发展的崭新局面。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如今，那永载史册的枪声虽已远去，但这个特殊的日子却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

“共和国三部曲史学读本”丛书，既承载了国家与民族前行的进程，也还原了我党我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史料翔实而丰富，叙事生动而形象。丛书对于各行各业的读者，尤其是成长中的青少年，都是生动别致的爱国主义与理想教育读本，在追忆民族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中，激发着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作为重大出版项目与红色经典读物，丛书也必将为影视出版界唱响主旋律，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起到积极而特殊的作用。

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祖国已经迈向新的征程。在追忆与畅想的时刻，我们有理由心生感慨：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珠矶合璧的“共和国三部曲史学读本”丛书，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注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2017 年 5 月 11 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一、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窃权…… 2

1.苟利国家生死以——近代中国人的救亡图存…… 2

2.汉家还有烽火燃—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创立…… 7

3.狼子野心夺共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12

二、政党政治和民国政局……17

1.风雨过多春已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17

2.悠悠帝梦骤然碎——袁世凯的复辟闹剧……20

3.城头变换大王旗——北洋军阀的黑暗年代……24

三、反对北洋军阀，维护革命成果……29

1.国父悼亡起遗甲——宋教仁遇刺与二次革命……29

2.临危改制铸新魂——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32

3.壮士断腕再呼号——护国与护法运动……36

第二章 十月革命和中国民众的觉醒

一、新文化运动下的中国……42

1.革故鼎新师德赛——陈独秀与《新青年》……42

2.文坛新风别旧韵——胡适与提倡白话文运动……48
3.兼收并蓄向自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51
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55
1.一夜春雷百蛰空——撼动世界的十月革命……55
2.必是红旗现环球——十月革命对中国人的启迪……59
三、五四运动滚动春雷……64
1.漫卷诗书喜欲狂——中国成了战胜国……64
2.九州飘摇学子怒——巴黎和会外交失败……67
3.学工联动开天地——改变中国的五四运动……70
4.日出江花红胜火——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75

第三章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一、上海的早期党组织……80
1.风雨欲来上海滩——上海的革命形势……80
2.黄浦江畔汇群英——上海早期党组织的缔造者……85
3.万里奔波党初成——维经斯基帮助建党……91
二、北京的早期党组织……95
1.晨钟惊醒紫禁城——北京的革命形势……95
2.青春校园荡新风——北京早期党组织的缔造者……98
3.亢慕义斋谱新篇——北京大学图书馆建党…… 108
三、京沪两地早期党组织的活动…… 113

1.震荡九州传心声——宣传马克思主义…… 113
2.红旗一举千里明——组织工人运动…… 117
3.五月风来成花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123

第四章　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一、长沙的早期党组织…… 128
1.三湘大地赤焰燃——湖南的革命形势…… 128
2.革命志士聚星城——长沙早期党组织的缔造者…… 132
3.湘江两岸塑新艮——秘密发展的长沙党组织…… 139
二、武汉、广州、济南的早期党组织…… 142
1.滚滚浪潮起江城——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立…… 142
2.羊城先锋承斗志——广州早期党组织的创立…… 149
3.革命曙光耀泉城——济南早期党组织的创立…… 156
三、海外的早期党组织…… 162
1.一寸丹心图报国——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创立…… 162
2.革命火炬传东瀛——旅日中共早期组织的创立…… 169

第五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各地代表聚上海…… 176
1.出入江山多险阻——共产国际代表来华…… 176
2.排难历险齐聚首——各地代表抵达上海…… 180
3.唯憾独缺二先生——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出席…… 186
二、第一阶段会议在上海召开…… 192
1.千里革命行跬步——大会正式召开…… 192
2.奈何节外又生枝——会场闯进的陌生人…… 198
3.力图大业暂离沪——代表们决定转移…… 202
三、中国革命的航船正式启航…… 208
1.泛舟南湖言壮志——在嘉兴的闭幕会议…… 208
2.一唱雄鸡天下白——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 212
3.星火燎原赤县天——焕然一新的中国革命…… 217

第六章　完成建党伟业

一、中共二大的召开…… 222
1.思想成熟重国情——陈独秀认识的转变…… 222
2.革命增筑民族魂——制定党的最低纲领…… 225
3.同舟共济万里航——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 231
二、掀起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238

1.缜略运筹起盛事——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238
2.云开月明见薄光——取得胜利的罢工…… 244
3.暴雨疾风事堪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镇压…… 252
三、开展农民、青年、妇女运动…… 258
1.千年沃土耀星火——将农民发动起来…… 258
2.书生意气斥方遒——将青年组织起来…… 263
3.巾帼解放亦栋梁——把妇女动员起来…… 267

结语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273
参考文献…… 275
后　记…… 277

第一章

中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一、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窃权

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民族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征程。19 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先后创建兴中会、同盟会，并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反抗清王朝统治。最终，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走到了终点。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了。然而，刚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却面临内部和外部的重重危机，在强大的反动势力下，革命党人不得不做出妥协：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与了军阀袁世凯。正所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窃取了。

1. 苟利国家生死以——近代中国人的救亡图存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古老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方面，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羸弱的清政府受制于列强，俨然已成了“洋人的朝廷”；另一方面，民族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也刺激着中国，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处于摇摇欲坠之中。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目睹了中国在列强前的无能为力，痛惜中国今日的颓败，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征程。

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在列强对华侵略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把“以夷制夷”作为基本对策。他们主张“师夷长技”，创办军事工业，制造洋枪洋炮军舰，还办起织造局，开始发展近代工业。但腐败的官僚政权根本不可能办好工厂，“徒靡巨款，无救危败”，最终，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痛感中国在列强面前的软弱无力，想出了“君主立宪”的救国方法，力图讲西学，用西学之术，实行君主立宪，改变官制，变法维新：他们说服光绪皇帝于 1898 年 6 月开始施行有限度的新政，然而三个月后，维新运动便因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而宣告失败。

1898 年，华北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有历史局限性，他们没有统一的领袖，也没有夺取政权的要求，他们的活动还有相当的迷信色彩，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他们武器落后，仅以血肉之躯对抗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八国联军，结果被镇压。

八国联军于 1900 年打到北京城，由于清朝军队腐朽不堪，闻敌辄溃，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和皇族大臣仓皇出逃。1901 年，八国联军胁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决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经历了一系列风风雨雨，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日益提高，从要求政治的改良，到要求彻底推翻这个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从而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他们的带领下，社会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孙中山。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1866 年 11 月 12 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孙中山受广东斗争传统的影响很深，听到长辈讲述的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故事，便萌生了投身民主革命的想法。1879 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后来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这也为他形成较为进步的思想奠定了基础：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进一步萌生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1892 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积极探索救国之措。

孙中山曾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受其影响，孙中山起初也曾奉行过改良主义。直到 1894 年，他还认为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挽救中国的危亡。当年 6 月，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批评当时洋务运动只顾装点门面而舍本逐末的形式主义，提出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希望清政府效法西方列强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使中国独立富强。他直言：“间尝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力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对李鸿章怀着深深的期望，然而时值甲午战争，李鸿章正因中日之间的战事而焦头烂额，看了上书，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仗打完了以后再说吧！”李鸿章的反应，让孙中山大失所望，他无奈地叹息：“所有的希望完全成了泡影。”

上书李鸿章的失败，加上对国内形势认知的成熟，使孙中山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年夏秋之季，他偕友“北游京津”，“深入武汉”，“窥清廷之虚实”，“观长江之形势”，认为清政府已经腐败透顶，无可救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以期救国已属不可能。此时，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全国震动，而西太后却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庆祝六十大寿。这些深深刺激了孙中山，使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国，振兴中华，“和平之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念愈坚，要求之念愈切”。严重的形势迫使孙中山“积渐而知和平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革命，唯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1894 年 10 月初，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冀图以海外为基地，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发起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当年 11 月 24 日，在檀香山卑涉银行华籍经理何宽的寓所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何宽、李昌、宋居仁、邓荫南等 20 余人，会议通过了由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会员按照誓词宣誓，誓词如下：

“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这次会议后，相继入会者有孙眉、杨纳德等 90 余人，会员共有 126 人。

◎兴中会首批会员宣誓处

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兴中会的职志是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为中国近代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便着手筹集经费，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然而，由于叛徒告密和革命党人

接应不周，广州起义还未等起事就失败了。作为策划和领导者的孙中山、陈少白和郑士良等人也不得不搭船流亡日本。

登岸后，他们看到日本报纸载有“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的消息。“革命”两个字触动了孙中山的神经——在这以前，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从未使用过“革命”二字，他看完文章后说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至此，始有“革命党”之称。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896 年 10 月 11 日，孙中山在伦敦活动时，被清政府诱捕至当时的驻英公使馆，险被秘密绑架回中国杀害。幸而孙中山之前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得到了这一消息。他多方奔走营救，并决定将清驻英公使违反外交规定捕人的行径通过媒体公之于众。这一案件一夜之间轰动了西方，迫于英国外交部和舆论的压力，成为众矢之的的清驻英公使馆不得不在囚禁孙中山 12 天后将其释放，孙中山也因这一经历而得到更多的关注。

伦敦蒙难脱险后，孙中山又回到了日本横滨，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从 1895 年到 1900 年这五年间，实为革命进行之最艰苦时代也……当时之时，黑暗无似，希望几绝。”

1900 午 8 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大肆劫掠，清政府政局岌岌可危，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国内人心惶惶。6 月份，孙中山曾策划广州独立，没有成功。随后，他于 9 月 2 日由日本到台湾，得到台湾总督儿玉原太郎的支持，在台北建立了指挥部，由革命党人郑士良率领在惠州发动起义。惠州起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先后占领了新安、深圳、龙冈、淡水、黄沙洋、平潭、白沙、大鹏等沿海一带，但最后还是因“外援难期”

而失败。

惠州起义失败后，部分将士为革命捐躯，大部分则逃亡海外，孙中山也于 1900 年 11 月 16 日返回东京。此后一直到 1904 年间，孙中山到访香港、越南、暹罗（现在的泰国）、香山、旧金山、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新加坡等地，把拯救中华民族的道理传播到各个地方。所到之处，革命团体纷纷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华侨倾向于革命，支持革命。到了 1905 年前后，国内外已涌现出华兴会、日知会和光复会等一批革命组织，革命形势日趋成熟。

1905 年 7 月 19 日，孙中山回到横滨，结识了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黄兴是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华兴会的领袖，在留学生中深有影响；宋教仁主办宣传反清革命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交游较广泛。所以，孙中山怀着“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的想法，立即找来黄兴、宋教仁等人进行商谈。

孙中山、黄兴两人具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光明磊落的品格，这使他们相见恨晚，立刻成了挚友。孙中山所建议的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于革命一事，得到黄兴的赞同。孙中山与宋教仁也相谈甚欢，孙中山倡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主张，得到了宋教仁的全力支持。

在此前后，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的留学生，有李书城、邓家彦、何天炯等人，也先后拜会了孙中山，他们都拥护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

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他提出的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意见，得到了在日本的各革命小团体中多数人士的赞同。

当年 8 月 20 日，经过二十来天的筹备，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友人阪本金弥（众议院议员、东亚同文会会员）住宅内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会员有一百余人。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讨论通过了黄兴等起草的同盟会章程草案 30 条。章程中确定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 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会议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会上推举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

新成立的同盟会和以往的革命小团体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真正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国内 17 省都有人人盟，打破了以省界组织革命团体的习惯；它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 1905～1907 年间加入同盟会的成员中，如今出身可考知的有 379 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为 354 人，占了绝对多数，达到 93%以上，其次是官僚、有功名的知识分子 10 人，教师、医生 8 人，这两类各占 2%多一点，至于资本家、商人、贫农等为数极少。有明确的党章、党纲和其他各种规定，以推翻清政府和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这些要素使它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个革命团体，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1905 年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合影

同盟会的成立意义重大，它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广泛联合，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领导核心，从而使中

国民主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加速了革命的步伐，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2.汉家还有烽火燃——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创立

同盟会成立后，其首要任务就是指挥革命党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孙中山除了派遣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秘密回国，为准备武装斗争集结力量外，他本人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武装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往来于日本、南洋、欧美各地，建立革命组织，宣传革命道理，联络会党，筹措款项。和兴中会时期相比较，“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

从 1905 年同盟会成立至 1911 年武昌起义成功，革命党人发动了数十次起义。这一时期的起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05 年至 1908 年的起义，在当时主要是联络会党发动起义。起义的地点大多在华中、华南一带，少数在长江流域。著名的起义包括 1906 年同盟会运动哥老会等会党组织发起的萍浏醴起义；1907 年 5 月至次年 4 月，由孙中山亲自策动指挥，在广东潮州、惠州，广西防城、镇南关、钦州及云南河口多地接连发动的六次起义，秋瑾、徐锡麟发动的江浙地区光复会起义等。这些起义虽最终都被清军镇压，但给予了清政府极大的震慑。

第二阶段是 1908 年以后，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发动新军进行。这一时期较大规模的起义包括 1908 年革命党人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1920 年 2 月胡汉民与黄兴、赵声策动，倪映典等人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 年 4

月黄兴亲自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尽管历次反清起义都归于失败，但革命党人并没有丧失信心，反而更加渴望改变国家的现状。正如孙中山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所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武昌起义便爆发了。

1911 年 4 月，四川、湖南、广东等地掀起的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湖北革命党人组织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决定借助保路运动提供的有利时机，联合发动起义。为此，革命党人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预定在 10 月 6 日（当年的中秋节）举行湖北新军的武装起义。

然而，在起义日期临近的时候，革命党人意识到时间仓促，起义的准备尚未做好，遂决定将起义延期到农历八月二十日。不料，在八月十八日也就是公历 10 月 10 日这天，孙武在汉口革命总机关试制炸弹时，因操作失误触发了炸弹。巨大的爆炸致使起义的准备泄露，汉口的机关也因此被破坏。

蒋翊武闻讯后，果断约定当夜 12 时新军各营以炮声为号起义。然而，由于武昌的革命机关当时也已经被破获，蒋翊武无奈之下被迫出走。晚上，又因为送信人未能到达炮营，号炮未响，各营没有起义。

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澂开始按查获的名册大规模抓捕革命党人。由于形势紧迫，革命党人熊秉坤等秘密商定顺势于当晚起义。晚 7 时，熊秉坤、金兆龙等在工程第八营后队首先发动起义，并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局，新军各营随即响应，开始兵分三路进攻总督府。瑞澂被隆隆的炮声吓

得魂不附体，眼见抵御不住新军的进攻，赶紧派人从总督府后墙挖了个洞，匆忙逃走。清军统制张彪，最初凭借有利地形，带领清兵拼死顽抗。然而，他们并非斗志昂扬的新军的对手。熊秉坤组织敢死队猛冲猛打，很快摧垮了清兵的防线，眼见手下士卒无力守住武昌，张彪率领残兵败将退往汉口。

11 日上午，革命军在武昌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强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政务部长。12 日，革命军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随后，各省纷纷响应，到 11 月，全国有江苏、湖南、广东等 14 个省区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清政府的统治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它的成功与各省的纷纷响应，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于革命党的始料之外，充分显示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所谓在情理之中，首先是革命形势发展到清王朝必将垮台的临界点，这时只要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足以使充满火药的大厦腾空崩裂。清政府的专制腐朽虽久为人们所知，但由于它采取高压政策而使一般社会阶层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最开始革命只可能在无私无畏的勇士中秘密进行。但革命者总是少数，尽管起义不断，可歌可泣，但若没有全社会的共识，没有各阶层对现政府的绝望，总归只是少数人的行动。而当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迫面对世界时，它的一系列腐朽落后的方面就更为显著地凸显出来，人们在自强求富的愿望中一次次地对清政府失望，改变现状，另立政府的呼声也就越来越迫切，这就使得清政府最终崩溃成了历史的必然。

所谓的始料之外，是因为革命党人举行了数次的起义斗争，但都以失

败而告终。因此，武昌起义的猝然成功大大超出了革命党人的预料，首义后的数省响应更是革命党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武昌起义后，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府就成为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11 月 11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和上海都督陈其美联名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派代表到上海讨论成立中央统一机构的事宜。接着程德全又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公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

15 日，各地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规定每省派代表两人，组成“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7 日，黎元洪发电建议各省派代表到武昌开会。考虑到武昌是起义首捷之地，黎元洪是第一任都督，拥有极高的威望，于是代表联合会议定以武昌作为中央军政府所在地，推黎元洪代行中央政务，并请武昌政府委派伍廷芳、温宗尧为革命政府外交代表。决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在上海组成联络机构。但当各省代表到达武昌时，黄兴所指挥的湘、鄂联军在袁世凯的进攻下正处于劣势，不久汉阳失陷。

袁世凯进攻武汉的同时，革命党领导的江、浙联军于 12 月 2 日攻下了南京。12 月 4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认为汉阳失守、武昌危急，在那里的代表已无法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于是，他们与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集会商议，将临时政府所在地改在南京，并投票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武昌各省代表接电后，认为上海的各省代表是联络员身份，无权议决有关组织临时政府等重大事项。革命党内部产生了分歧。

12 月 10 日，在上海和武汉的各省代表陆续到达南京。原定 12 月 16 日举行临时总统选举会，在这期间，他们得到了袁世凯和谈代表到达汉口的

消息，一部分代表被时局迷惑，决定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上海代表选出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的方案，这时仍然维持下来，由大元帅暂行总统职权，但黄兴深有顾虑，佗认为黎元洪是首义的元勋，如果现在让他屈居副职，恐怕武昌方面的同志会有意见，因而致电推辞了大元帅的任命。代表会又于 12 月 17 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这时，黄兴已接到孙中山回国的电报，又觉得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会使孙中山感到不快，并且会使党内同志产生猜忌。所以，对副元帅的职务也坚决推辞不接受，临时政府面临着“难产”的局面。

那武昌起义爆发时的孙中山，又在哪里呢？彼时的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筹集革命经费等活动，起初对武昌起义并无耳闻。1911 年 10 月 12 日中午，孙中山上街到饭店吃饭，购得一份报纸，见有一则消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喜出望外。他心情很激动，本想回国亲自指挥作战，“以快生平之志”，但又想到共和国即将成立，将遇到外交、财力方面的困难，尤其担心某些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决定先在外交上进行活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尽力于革命事业，“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故在之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周旋于美、英、法三国之间，办理外交，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为革命党人寻求外交上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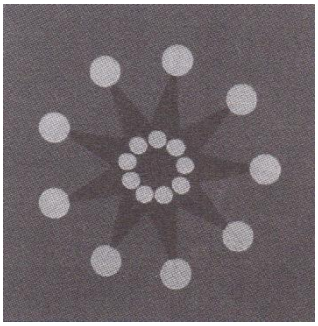
孙中山在与各国的政界、商界人士商谈时，一度曾得到过各帝国主义国家“皆极表同情于我”的印象。但事实上，从中国共和政府成立，到以后反对军阀的斗争，再到孙中山逝世，都没有得到英、美、法、日等列强的实际支援。相反，他们同情和支持的是其敌人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

曹锟、吴佩孚、陈炯明等反动军阀。到了晚年，孙中山才清楚地意识到，“反革命和恶势力之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遗憾的是，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之前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对此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在这段时期，国内的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飞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随着宣布独立、响应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多，革命党人在商讨组织民国临时政府的时候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另一方面，南方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极力从革命内部攫取权力，并与清政府新内阁暗中勾结。在这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孙中山在接到国内一再敦促他回国的电报后，于 11 月 24 日，从法国马赛港乘轮船回国。

12 月 25 日，孙中山从香港抵达上海，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其地位是大家公认的。回到上海，外间传闻他带回巨款，有记者询问此事，孙中山明确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的确，孙中山带回的“革命之精神”一扫上海的妥协论调，民气为之一振。反对妥协的革命党人聚集在孙中山周围，坚持革命统一全国和创建中央政权。29 日，各省代表参会在南京选举总统。

在采用何种政权组织形式的问题上，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分歧。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则主张总统制。黄兴赞同孙中山的主张，多数人也赞成总统制。17 省总计 45 人出席会议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三：孙中山、黎元洪、黄兴，每省一票。



◎武昌起义革命军军旗

选举结果，孙中山得 16 票，黄兴得 1 票，孙中山依法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就职典礼上宣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民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就任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宣誓完毕，代表会授给孙中山以大总统印，并致祝词。孙中山启印钤于宣言书。宣言书对内提出五大政务方针，即“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对外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找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全国各地纷纷发来贺电。

代表会议定五色旗（原江、浙、沪联军攻克南京所用）为国旗，十八星旗（原武昌起义所用）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原为陆皓东设计广州起义时所用）为海军旗。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本来只有大总统，无副总统。行政各部只有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湖南代表宋教仁提议在大总统外加一副总统，行政各部不加限制，这一提案获代表会议通过。接着，通电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并以临时大总统任职的 1 月 1 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作为民国建元的开始。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就这样诞生了。

3.狼子野心夺共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

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仅在职 90 天便让位于袁世凯了。照理说，孙中山担任总统是众望所归，而袁世凯乃“巨奸大憝”，居然能迫使孙中山让位于他，其间症结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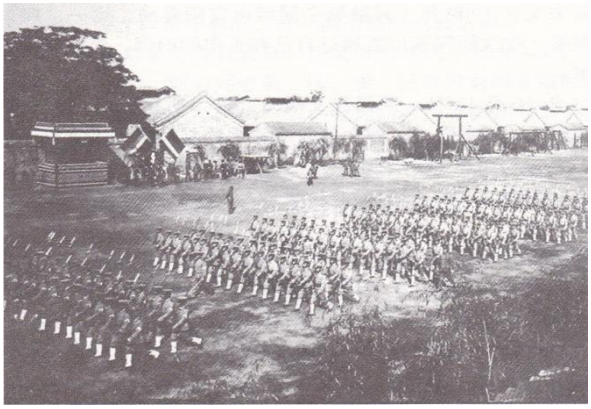
首先还是要了解袁世凯的经历。

1859 年 9 月 16 日，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一个官宦大家族，所以又有人称他袁项城。袁世凯早年热衷科举，却连连科场失意，无奈之下，他于 22 岁时弃文从武。

1882 年，朝鲜发生兵变，23 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到了朝鲜。可能是因为不习惯长时间坐船，很多士兵都晕船了，登陆速度缓慢。吴长庆对此很不满，命令袁世凯部署督促，袁世凯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任务，这样的速度和效果令吴长庆很满意，于是他当众嘉奖了袁世凯一番。

但袁世凯的真正发迹并非是由于出兵朝鲜，而是始于小站练兵。清朝末年，连年的内忧外患迫使清廷尤其看重编练新军，清政府从财力和人力等方面为编练新军积极准备。

1895 年 10 月 22 日，清政府命令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编练新军的基础，驻扎在天津附近的小站，即新农镇。袁世凯在当时有着非常务实的性格。当时中国懂军事的人中，都认为德国陆军天下第一，日本效仿德国后也变得强盛。袁世凯就参考德国军队的编制，在定武军十营的基础上又招募了 2000 多人，号称新建陆军。这就是后来北洋军阀的前身。



◎天津小站练兵

编练新军没能拯救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反而被袁世凯抓住机会，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为将来北洋军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最后逼迫清帝退了位，这是当初清廷当政者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编练新军两年后，清廷认为袁世凯练兵有功，升其为直隶按察使，仍旧负责练兵等事。1898 年 7 月，维新变法达到高潮，光绪皇帝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赏他做候补侍郎，以求拉拢。8 月 3 日，变法遇阻，谭嗣同等人接到了皇帝求救的诏书后，向袁世凯求救，希望他能利用手中的兵力杀掉荣禄，帮助皇帝实行新政。袁世凯当时一口答应，甚至还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可随后他就向荣禄告了密，于是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被杀，维持了一百天左右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袁世凯在这件事后取得了荣禄与慈禧太后的信任和赏识，从此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不久就升任为工部侍郎。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袁世凯在保存实力的同时，又以种种理由扩充实力。《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集团。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又把淮系势力吸收过来，势力迅速膨胀，北洋军阀集团在这段时期基本形成。

袁世凯势力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清政府的猜忌。1907 年，他被削去了兵权，后来又在 1909 年 1 月被勒令回河南安阳养病，这一“病”就病了三年。但是，在这期间袁世凯通过自己在军中的旧部，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北洋军。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这个时候能应付革命军的，只有手握北洋军的袁世凯了。四面楚歌的清廷此时又想起了袁世凯。当要其复出时，袁世凯借机提出了如下条件：“(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解除党禁；(4)宽容武昌起义人员；(5)授予指挥前线军事全权；(6)宽筹军费。”

面对局势的危机，清政府不得已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并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就任后，为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密令北洋军进攻汉口；经过几天猛攻，北洋军于 11 月 1 日占领了汉口。此时的清政府也信守了诺言，宣布解散皇族内阁，委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此时的袁世凯可谓是大权在握。

与此同时，革命军虽然失守汉口，但斗志不减，相继光复了上海、贵州等地，建立了军政府。在这危机时刻，袁世凯几乎成了清廷的唯一救命稻草。袁世凯也审时度势，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摆出了议和的姿态。当时，黄兴为争取袁世凯，还曾特意致函。他在信中强调，革命军的目的在于推倒清室，“复我汉人之政权”，并劝袁世凯反正：“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得到了这样的期许，袁世凯同意议和。不过，他在议和的条件上却与

革命党人意见不一。他先是站在清廷的角度上，主张君主立宪，但被革命党人拒绝后，决定布置属下冯国璋攻打汉阳，以给革命军施压。经过十几日的激战，北洋军于 11 月 27 日拿下了汉阳。此时如果渡江强攻，武昌可得。然而，袁世凯此时却让冯国璋在汉阳按兵不动。如此布局，一方面是想挟制清政府，另一方面也是给革命军摆出宽容姿态，迫使其就服。

如前文所述，当时起义各省由于各自为政，对于议和的问题也是莫衷一是，到最后上海和湖北等地的革命军代表，迫于局势限制，和袁世凯方面商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就这样，袁世凯当政竟成了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

孙中山等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并不认同这种妥协，但他于 12 月底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囿于形势也只能执行既有决议：“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催促袁世凯“早定大计”。而袁世凯本打算用南方临时政府作筹码，逼迫清政府让位于他，但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的消息却使他非常恼怒。因而，他扬言反对共和，要全面整军再战，欲与南京临时政府抗衡。

孙中山见袁世凯对革命没有诚意，决定出兵北伐。但实际上，北伐并未能顺利开展。一方面，西方列强英、法、美、俄等国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并以武力威胁欲干涉中国内政。与此同时，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大分歧，有人甚至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顾全大局，派代表转告袁世凯，如果他能使清帝退位，宣布实行共和制，自己立即宣布解职，推举他为大总统，决不食言。

袁世凯得到这样的保证后，便指示心腹胡惟德、赵秉钧等频繁进宫，

对隆裕太后进行威胁，隆裕太后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和皇帝已经成为别人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于是同意退位。1912 年 2 月 12 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离过年虽不过五天，但紫禁城里一点也没有过年的喜庆气氛，相反，所有太监和宫女脸上都是悲戚，偌大一个宫殿一片寂静。养心殿里，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溥仪，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觐礼仪，隆裕太后替幼小的宣统皇帝溥仪签署了退位诏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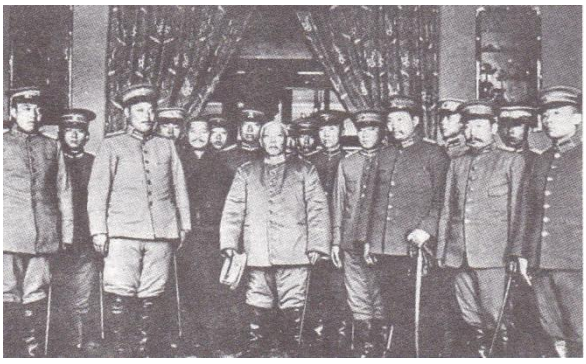
得悉清帝退位诏书及袁世凯赞成共相的电报后，孙中山为了实践让总统给袁世凯的诺言，除对退位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表示异议，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外，遂即于 2 月 13 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和推荐袁世凯的请求。2 月 15 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 省议员每省 1 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于当天给袁世凯发去电报，称誉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16 日，袁世凯欣然接受选举结果，就这样，袁世凯窃权的阴谋得以实现。

孙中山虽然让位于袁世凯，但并非没有戒心。他在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时，附有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2)辞职后，俟参议院所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3)临时政府约法为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孙中山提出以上三个条件，是希望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南京建都，可以把就任总统的袁世凯调离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以削弱其势力；二是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防止他利用手中大权实行封建军事独裁。

奠都南京和新总统南下就职，就成了孙中山与袁世凯集团的最后一搏。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当然清楚孙中山的意图。他表面允诺，与孙中山派来的使团“恳谈”南下就职的问题。与此同时，却指派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北京、天津等地制造暴乱，然后以北方局势不稳为借口拒绝南下。驻京的各国公使团也以华北地区发生了“兵变”为由，派出军队在北京街头巡逻，配合袁世凯，制造紧张气氛。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系将领更发出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此时革命党人中也有部分人主张妥协。孙中山无奈，只得再次选择迁就退让。

3 月 10 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总理，负责组织第一届内阁。25 日，唐绍仪抵达南京，着手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他把内政、外交、陆军、海军四个重要部门，都交由袁世凯的心腹掌握，财政部也在拥袁的立宪派手中。为中华民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同盟会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分别被任命为教育、农林、工商等部总长，而握有军权的黄兴则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随着孙中山在 4 月 1 日正式解职，以及临时政府机构的陆续北迁，新生的中华民国在表面上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实际上，政府大权却转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的手里。从此，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开始了。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二、政党政治和民国政局

袁世凯统治下的北洋军阀政府，虽继续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但其属性却已发生了变化。政党政治也沦为各方势力较量的工具。以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被刺身亡为起点，袁世凯集团逐步撕破了伪装，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但他还嫌不够过瘾，竟然一心抱着“称帝”的愿望，最终闹出了复辟的丑剧。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国人的唾骂。在其死后不久，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地方军阀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军阀彼此之间互争地盘，内斗不止，张勋趁机又闹出了复辟清室的丑剧。各派军阀依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卖国，对内镇压人民，刚刚见到革命曙光的中华大地，又重新陷入了黑暗。

1. 风雨过多春已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和各省的光复，中华民国建立，封建帝制被推翻，人们以为，向往已久的民主共和国的议会制多党制内阁即可实现。各种政治势力在议会政治的幻想下，纷纷组织政党，“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中国也开始进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

“一时政党成立，好似雨后春笋”，这句话成了当时政党政治的生动写照。民国初年成立的政党和类似政党团体一度达到三百余个。这些政党虽纷繁复杂，但可以根据其斗争焦点而简单划分为几类，那就是坚持革命、

主张共和，还是反对革命、拥护专制。

最初出现的政党，革命派主要有同盟会以及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旧立宪派主要有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国民协进会，不久，它们分化为统一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及其他小党，其他还有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公党、温宗尧组建的国民党、国民新政社，等等。

这样，民国初年便出现了“党争”这一奇特的现象。不过，那时政党虽然很多，但“党争”基本上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旧立宪派组建的政党和以旧官僚军阀扶持的代表地主、买办势力利益的政党这三者之间展开的。而且在这三者之间，旧立宪派组建的政党常常成为革命政党和地主、买办势力组建的政党互相争取和拉拢的对象。至于其他小党，他们自知人微言轻，没有靠山，况且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十分单薄，即使存在下去，也不可能有组阁的希望。于是，多数小党打算提出“建设强国政府”等纲领口号后，附庸在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下，以便在将来有机会时，分享部分政权。

袁世凯在 1912 年春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后，为了打压革命势力，在国会中与同盟会形成抗争态势，于当年 5 月 9 日，以民国元年兴起的民社、统一党为基础，联合民国公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协进会及温宗尧组建的国民党等六个团体正式组成了共和党，成了当时最大的政党。共和党以拥护袁世凯为己任，对革命派构成严重威胁。

同盟会的宋教仁等人认为，民主政体既已在民国确立，日后的任务是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来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他们秉持着参与议会政治

的良好愿望，议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党对峙，不宜小党分立，政党内阁方有成功的希望”。在这一指导思想支配下，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积极联络政见相近的其他政党，共建起国内另一大党，企图通过合法的竞选，争得议会的多数，重新组织责任内阁，以分享袁世凯的政治权力。他们在孙中山、黄兴的帮助下，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团体，于 1912 年 8 月 25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国民党。

◎宋教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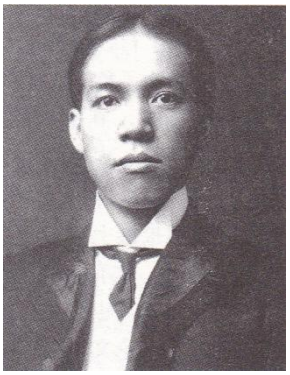
共和党、国民党的相继诞生，使中国政治生活中首次出现了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为了与国民党抗衡，汤化龙、林长民等立宪党人，同袁世凯暗中协商，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与国民协进会、统一共和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团体，于 1912 年 8 月 27 日合并成立民主党，梁启超后来成了该党领袖。这些人希望发展壮大民主党，使之以第三大党的地位与共和党、国民党鼎足而立，议会一旦出现后二者相持不下的局面，这些民主党人便以“超脱”姿态而组织内阁，控制大局，掌握国家权力。

1912 年 11 月，全国举行了第一次国会选举，尽管共和党、民主党以立宪党人、旧官僚为主，背后有袁世凯作后台，但它们终究难以同革命传统悠久、声望极高的国民党比肩并驾。1913 年 2 月，大选结果揭晓，参众两院 870 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 392 席，其他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加起来也只有 223 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得胜利。

大选的胜利给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导人精神上带来莫大鼓舞。

孙中山见到选举结果，曾高兴地说：“本党今既得占优势地位，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黄兴也主张：“依政党政治之常轨，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国民党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却引起了其反对党和袁世凯的惊恐不安。梁启超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哀叹道：“吾心力俱瘁……党人多丧气，吾虽为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袁世凯也十分担忧地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因为按照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正式国会将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实行责任内阁制。凡总统命令，不特需内阁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而且每令阁员的任命均须经议会讨论批准才行，这就使得总统实际上处于无责任的地位，形同傀儡。


◎梁启超

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将担负起组织责任内阁的职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和平夺权，这对袁世凯的统治构成了严重挑战。为了对付国民党，袁世凯想出了种种办法，肆意破坏责任内阁制。他一方面重组御用政党，将素不满于国民党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重组成为一个进步党，以利与国民党对抗，做破坏国民党的工作；另一方面，用金钱收买国民党中意志不坚定的党员，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后来，袁世凯甚至直接秘密派人暗杀国民党的中坚力量宋教仁，使国民党失去政党活动之领袖。袁世凯的计划实现了。在其对国民党磨刀霍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于是，昙花一现的国民党“遂分裂成相友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超然

社五个小团体”，分裂后的国民党，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雄风。

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以求捍卫革命果实。奈何国民党武装力量薄弱，缺乏统一指挥，很快被袁世凯军队击败。国民党随之被宣布为“乱党”而勒令解散，国民党参议员被驱逐出参议院。到后来，甚至扶持袁世凯上台的保皇党、进步党，也都被袁世凯一脚踢开。民国初年浩浩荡荡开展起来的政党政治，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虽然民初的政党政治最终没能成功，但是这一过程也的确为近现代中国留下了诸多宝贵遗产。一是民国的政党政治，促进了中国政党观念、政党思想的传播。早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负面色彩的“会党结社”这一概念，经过民初政党政治的洗礼，为国人逐渐了解、接受，并为五四运动后期组党结社的热潮奠定思想基础；二是一大批政治精英也经过这段时期政党政治得到了锻炼。这些人后来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2.悠悠帝梦骤然碎——袁世凯的复辟闹剧

民初的政党政治在袁世凯的淫威下走向失败。然而，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并没有就此收手。相反，他在将权力一步步集中在自己手上的同时，也渐渐显露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称帝。

袁世凯为了称帝的梦想，曾授意手下大造舆论，并请来“专家”帮忙造势，大肆鼓吹帝制。其中一位是弗兰克.J.古德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另一位是杨度。古德诺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交情很好，曾于 1915 年

8 月 3 日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一篇论文《共和与君主论》，这篇论文后来在《泰晤士报》等报纸上转载，影响很大。《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低下，没有参政议政的品质，实行君主制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杨度与古德诺一样，也跟袁克定是好朋友，他曾留学日本，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在古德诺发表论文之后，杨度也紧随其后，发表《君主救国论》。同时他和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共六人，组织了“筹安会”，人称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名为“学理讨论”，实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他们援引古德诺之说“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通电全国各地文武官吏、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很快，袁世凯在各地的支持者纷纷派代表进京参加讨论。仅数天，筹安会即宣布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并向全国通告：立国之道不外两端，首日拨乱，次日求治。中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立君主专制。

袁世凯深知，仅仅在舆论上造声势是不够的，他又发动心腹们在各省成立公民请愿团，于是，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匠社请愿团凭空而起，甚至于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也相继出现。社会上“拥护帝制”的声音，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再度甚嚣尘上。

“请愿”行帝制是强奸民意，稍后的“推戴”更是由袁世凯直接操纵。

1915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9 时，参政院开会议决帝制，与会的各省“国民代表”共 1993 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 1993 张，无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日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参政杨度和孙毓筠又提议说:“本院（参政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林长民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拥戴书当场宣读，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 时半，在一片欢呼声中散会。当日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驳回，并煞有介事地申明自己虽尊重民意，但“唯推戴一事．无任惶骇。……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袁世凯很善于做戏，他的推托是假，让其党徒为其洗刷背信弃义是真。于是，参院下午再次开会，通过早已准备好的第二份推戴书，这份推戴书，堂而皇之地将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于是，袁世凯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发下一道冠冕堂皇的告示，引述推戴书全文后，他大言不惭地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以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他只好当皇帝了。

袁世凯如此做戏，无非是要说明他做皇帝既是天命所归，又是人心所向。但是，没有多久，他亲自导演的这出丑剧过程中的一批密电被披露出来，这批密电共 50 余件，彻底暴露出他用尽心机使皇帝梦成真的内幕。

这些密电中有，政事堂 10 月 12 日发密电:“各电均转呈，奉大总统谕:‘国体不宜，彰明较著，智愚共见，中外同声……’，‘国体不宜，危险在后此数年中言之者众矣。予亦非有意因循，置根本大计于不顾，但欲归复故主，则中外大半反对，事有难言，欲别求贤能而理，顾海内又乏统治全局之才，熟思审处，不敢置议’，‘现经代行立法院决定议案，以国体问题决诸国民代表大会，系属泫律上正当之办法，各国亦多赞服，京外文武各

官务各保守治安，维持秩序’。”国民会议事务局于 10 月 17 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饬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况，随时详报。”上述两电，暴露了袁世凯直接指挥操纵这场“推戴”丑剧的真相。

一切准备就绪后，1915 年 12 月 13 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中庭摆设着御案御座，前来朝贺的高级文武官员和参政们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袍挂，有的穿着便衣，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袁世凯则身着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面南立于龙案左上方。百官面北而立，向他三鞠躬，高呼“万岁”。

随后，袁世凯开始滥授爵位，广布恩德。12 月 20 日，袁世凯鉴于前清时做过督抚和号称为民国元勋的一些显赫人物不愿下跪称臣的情况，发表“嵩山四友”的电令，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久负重望”，与自己为“道义之交”，各颁嵩山照片一张，均许不称臣。

21 日和 23 日，袁世凯特封公侯伯子男爵位共 128 人，另封孔子 76 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12 月 19 日，袁世凯下令设立登基大典筹备处（在此之前的 10 月间，政事堂礼制馆就已拟好皇帝登基、臣下朝贺、祭天祀礼、临朝礼仪等礼制）。22 日，袁世凯电令内廷永禁太监，改用女官。他还指定赤色为新朝的代表色，太和殿更名为承运殿．中和殿更名为体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龙袍以 80 万元之代价由瑞蚨祥服装店承制，共制两袭，一袭祭天时用，一袭登基时用。另用币 12 万元制新朝玉玺，60 万元制金印五颗。12 月 31 日，袁世凯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订皇位继承法等事务也在加紧进行。袁世凯为过皇帝瘾已是利令智昏。

袁世凯终于如愿登上了皇位，但全国的反对和讨伐之声的强烈，却是袁世凯万万没想到的。其实，当时举国上下，本已就袁世凯解散国会、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恶劣行径不满，其复辟称帝的企图更是激起了全国的极大愤慨。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就在海外开始积极从事反袁活动。1915 年夏，孙中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不断派遣党员潜往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湖南、辽宁、陕西等地，联络军队，先后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甚至，原来支持袁世凯的梁启超，如今也因不满其行径，而走上了反袁道路。1915 年 9 月，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古德诺、杨度等人的谬论，反对帝制。

蔡锷等人，更是秘密前往日本，再转赴云南。直接于 12 月 25 日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的“护国军”。1916 年元旦，即袁世凯登基之日，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浩浩荡荡的“护国战争”开始了，很快，各省相继宣布起义。这一次，袁世凯没有被幸运眷顾。前线战事屡屡失败，后院则众叛亲离。内外夹击下，袁世凯知道大势已去了。

这时，老友徐世昌来信劝他说：“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莫理逊也给他送来一个便笺，说：“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这一切，使袁世凯感到唯有取消帝制，才能摆脱危局。

3 月 21 日，袁世凯召集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参政、肃政厅肃政史、平政院院长等参加的会议，讨论撤销帝制的问题。会议做出五条决

议：(1)撤销承认帝制，取消洪宪年号；(2)召开参政院会议，撤销帝制决议案；(3)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解除陆征祥国务卿之职，回任外交总长；(4)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5)由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主持南北和谈。22日，袁世凯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由徐世昌副署发表，又恢复黎元洪的副总统职务。23日，袁世凯免去冯国璋的参谋总长兼职，任俞段祺瑞为参谋总长；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袁世凯从改元“洪宪”到废止“洪宪”年号，前后共计83天。他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登基大典，甚至还没有戴皇冠、穿龙袍，就被全国人民从皇帝的宝座上赶了下来。

取消帝制后，袁世凯妄图继续当中华民国总统，享受无限的权力。1916年3月28日，袁世凯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3月30日，统率办事处亦致电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和刘显世说：“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他苦苦哀求：“务望诸君罢兵息民。”

但此时起义各省，均不承认袁世凯还有继续做总统的资格。舆论愤怒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蔡锷等通电表示必令袁世凯退位，“本着悲天悯人的怀抱，从事洁身引退的计划，国人轸念从前的勋劳，感怀袁公的德义，以馨香崇奉，岂有涯量？”梁启超以大总统的职位为诱饵，策动冯国璋公开迫袁世凯退位。冯国璋果然于4月16日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随后，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抚国军军务院。公推唐

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实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的局面。5 月 9 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并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但此时的袁世凯暗中仍在摆天门阵，对退位问题一再拖延，他还没有放弃对南方独立省份进行新的军事攻势的幻想。

历史弄人，当时的袁世凯，已经患上了尿毒症。到了 5 月下旬，在得知四川将军陈宧、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两员大将背叛自己宣布“独立”的消息后，袁世凯暴怒不已，其病情也因此恶化。6 月 6 日，袁世凯在绝望与病痛交加之中撒手人寰，一场闹剧也就此收场。

◎袁世凯复辟

3.城头变换大王旗——北洋军阀的黑暗年代

1916 年 6 月袁世凯去世后，按照《临时约法》规定，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身份继任大总统。然而黎元洪本人向来平庸，没有足够资历、声望与能力统摄各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于是纷纷开始寻找自己在华的利益代言人。这样，原本帮派特征鲜明的北洋军阀在列强的支持下进一步分裂为许多派系。

这些派系之中势力最大的是皖系、直系和奉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控制着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等地，背后有日本扶植；直系以冯国璋为首．控制着长江中下游及直隶等地，以英、美为靠山；奉系以张作

霖为首，原本控制着奉天一带，后来张作霖在护国战争期间趁机扩大地盘，把势力扩充到了东三省，背后扶植他的国家也是日本。在这三个势力最大的派系之外还有盘踞山西的阎锡山的晋系，屯兵徐州的张勋，在南方还有占据云贵两省的唐继尧的滇系，占据两广的陆荣廷的桂系等。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实际权力落到了段祺瑞手里。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安徽的简称是“皖”，所以，以段祺瑞为首的派系被称为皖系。段祺瑞在 1896 年协助袁世凯编练新军，是袁世凯的心腹。1899 年，他镇压过山东义和团运动，南北议和时，他一方面协助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军，另一方面领导北洋将领通电主张共和，逼迫清帝退位，帮袁世凯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上任后，任命段祺瑞为北洋政府陆军总长。1916 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把持了北洋政权。

于是，虽然当时黎元洪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但由于段祺瑞掌握着实权，很多事情并不配合黎元洪。以黎元洪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总统府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在政治主张、官员人选上分歧诸多，互不相让，都希望自己的权力可以更大一些。就这样，“府院之争”在后袁世凯时期上演了。

沸沸扬扬的“府院之争”在 1917 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高潮。1914 年爆发的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 1917 年时临近尾声。此时的日本出于种种考量，积极拉拢中国对德宣战，以图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故日本政府积极支持段祺瑞方面的参战主张。而段祺瑞则试图借机勾结日

◎段祺瑞

本，借款编练“参战军”，名正言顺地扩充北洋势力，于是对日本方面言听计从。黎元洪这边则对美国素有好感，希望在外交问题上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因而按照美国旨意行事，对德主和。两派之间，你争我夺各不相让。

3 月初，段祺瑞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的咨文，并拟好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令其通知日本政府，中国即与德绝交，俟与协约国商定中国参战条件后，即加入协约行列。然而，总统黎元洪却拒绝在咨文上盖印、签发电稿。段祺瑞眼见计划受阻，便以辞职离京相威胁，最终迫使黎元洪妥协。

4 月，美国方面改变态度，对德宣战，段祺瑞乘势加速推行其宣战政策，力图变各省军阀由参战阻力为助力。在段祺瑞的唆使之下，以安徽督军倪嗣冲为首，鲁、闽、吉等省督军私闯国务会议厅，疾言厉色，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参战案。

为进一步施加压力，当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段祺瑞搜罗流氓、乞丐、无业游民数千余人，号称“公民请愿团”，在国会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并对议员大打出手，气势猖獗，强行要求通过参战案，致使议员多人受伤，国会被迫休会。不巧段祺瑞这次弄巧成拙，当“公民请愿团”事件的真相被曝光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内阁成员迫于舆论压力，纷纷辞职，只有总理段祺瑞一人置若罔闻，仍到国务院“办公”。内阁陷于僵持，众议院也以内阁仅剩总理一人为由拒绝讨论宣战案。此时又传出了段祺瑞与日本秘密签署高达一亿元的军事借款的消息，这使得段祺瑞非常被动。

一向看似好欺负的黎元洪，看到段祺瑞陷入政治危机，趁机落井下石——他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院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任命伍廷芳为代总理，陆军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王士珍为京津一带总司令，并通电全国。

段祺瑞闻此消息后大怒，当天即乘车离京赴津，临行前，段祺瑞发表致各省电，对黎元洪总统的命令不予承认，电报仍署名“国务总理段祺瑞”。

免去段祺瑞职务后，黎元洪又恳请徐世昌、王士珍出台组阁，但徐世昌、王士珍二人迟迟不肯应允。此时，段祺瑞开始了反击。在他和心腹徐树铮的策划下，安徽、河南、浙江、由东、福建等北洋系各督军先后脱离中央宣告独立，甚至扬言“北伐”。一时间，北方局势动荡不安，面临着“九省督军皆反，连兵请解散国会”的局面。黎元洪一筹莫展，只好向通电拥护总统的前清重臣张勋伸出求援之手。不料，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导致一出复辟丑剧。

张勋(1854-1923)，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对清朝忠心耿耿，曾被慈禧太后看中，提拔他当江南提督。在清朝即将灭亡之前，他还得到了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一系列职位。后来清帝宣布退位，进入了民国时期，张勋也做了民国的官，但是他依旧以“旧臣”自居，不肯剪头发、换装束，而且，他还命令他的上万名士兵和他一样。所以大家戏称他的部队为“辫子军”。

当时的清朝皇室和德国有不少瓜葛。清帝退位后，很多皇亲国戚来到德国势力影响下的青岛生活。在德国的保护下，不少主张复辟的人士更是积极活动。黎元洪认为，张勋本来是找德国人做靠山的，他肯定反对段祺

瑞的势力；可段祺瑞想，张勋向来是赞成帝制反对共和的，如把他拉拢过来，黎元洪这个共和国总统无论如何也当不成。于是，两人同时给张勋发电，要求他率军进京，调解府院之争。

1917 年 6 月 6 日，张勋率领他的 6000 名辫子军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途中，张勋经过天津，还假惺惺地去拜访段祺瑞。

黎元洪派人去天津迎接张勋，张勋提出以解散国会为“调停”条件，这让黎元洪傻了眼。最后在张勋的武力胁迫下，黎元洪权衡利弊， 任命冯国璋为副总统，又厚着脸皮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命令他讨伐张勋，自己则一头钻进了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

引狼入室的黎元洪，确实已经无法阻止辫子军的脚步了。

7 月 1 日，张勋正式宣布复辟，扶持已经退位的溥仪当皇帝，一场闹剧拉开了帷幕。据溥仪的外籍老师庄士敦后来回忆，当时北京城的场面十分热闹。很多北京城里的遗老遗少穿着早就被人当作装殓尸体的朝冠朝靴、花衣蟒袍，在大街上互相拱手作揖。

不过，总的来看，张勋的倒行逆施还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段祺瑞看时机已到，就任命自己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京郊马厂誓师后，率部队包围了北京城。段祺瑞的军队，甚至还动用了轰炸机飞抵紫禁城。这也是轰炸机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战场上。

张勋在北京的部队只有 3000 人，驻扎在徐州的部队因为在途中受到阻隔没法北调，致使辫子军不堪一击，最终狼狈逃窜。张勋本人也逃人荷兰公使倌。此时的段祺瑞，则摇身一变，成了“再造共和” 的功臣，重新掌握了北京政权。

黎元洪下台后，副总统冯国璋成为临时总统。冯国璋是直系的首领，掌握着实权，他上台后，新的“府院之争”开始了。段祺瑞一直希望统一全国，主张对西南用兵。因为对西南用兵既扩大了皖系的势力，又消灭南方异己，还打击了直系势力。自己的利益受损害，冯国璋当然坚决不同意。直系军队消极怠战，武力统一施行不下去，段祺瑞被迫辞职。后来段祺瑞使用手腕逼迫冯国璋做出让步，自己又重新掌握军事指挥大权，并以这个名义向日本借款，扩充自己的实力。皖、直两军阀的矛盾就这样一步步地升级了。

◎张勋

由于直皖两系力量不相上下，在互相倾轧中两败俱伤，在对西南的和战问题上暂时告一段落。在直皖两系对西南用兵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成了名副其实割据东北三省的“关东王”。这样，奉系成了在皖、直两系之外最大的军阀割据势力。

1919 年 12 月，冯国璋在北京病逝后，曹锟与吴佩孚成了直系的新首领。曹锟与吴佩孚都不甘心被段祺瑞骑在头上，尤其是实力更强的吴佩孚。于是他们开始想办法扳倒段祺瑞，直皖战争爆发。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以皖系战败而结束，段祺瑞下野。直皖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两派掌管北京政府，他们之间也因为争权夺利而矛盾重重。最后矛盾激化，两派先后爆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第一次直胜奉败，第二次直败奉胜，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令人目不暇接。中国社会，就这样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混乱不堪。

三、反对北洋军阀，维护革命成果

孙中山等人不甘心革命成果就这样落入反动势力手中，开始了积极的斗争。宋教仁改组成立了国民党，并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却遭到了袁世凯的顾忌。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发动二次革命，举起讨袁大旗；失败后，又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力求以更有力的组织形式推动革命进程；针对袁世凯的复辟闹剧和后袁世凯时代段祺瑞等军阀对民国政治制度的肆意践踏，孙中山又相继发动了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力求捍卫民主与共和。这些努力最终虽然以失败而告终，却对军阀、封建势力造成了沉重打击，也使民主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1.国父悼亡起遗甲——宋教仁遇刺与二次革命

孙中山在把临时大总统职权交给袁世凯后，曾一度下定决心，转身投向实业救国。于是，其革命战友宋教仁接替他擎起了同盟会的大旗。

宋教仁，字逐初（一作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 年，他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当年 11 月，曾策划发动反清起义，但因事泄未遂，流亡日本。1905 年，宋教仁参加了同盟会，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1907 年曾回到东北策动革命，并创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1911 年，宋教仁到上海组级反清运动，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得知消息的宋教仁，于 10 月 28 日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1912 年 1 月 1 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出任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参与南北议和。5 月又到北京，出任袁世凯政府农林总长，不过几个月后，宋教仁就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而辞去了这一职务。

为了使中华民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实行政党政治，宋教仁主张扩大同盟会组织。1912 年 8 月，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后，宋教仁在北京把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与同盟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8 月 25 日下午，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孙中山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同盟会素主张者有三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民族民权已达目的，唯民生问题尚待解决。”

这次大会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芝祥等 9 人为理事。因为孙中山专心搞铁路建设，黄兴意欲隐退，国民党即由宋教仁代行总理职务。

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在此法颁布 10 个月内，需根据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选举。宋教仁决心努力通过选举，使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为此，宋教仁遍历湖北、湖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演说、宣传，拉来不少选票，湖南更是以百分之百票数选他为参议员。1912 年 12 月到 1913 年 1 月的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议席占多数。宋教仁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

选举结果使得袁世凯大为震惊。惊异之余，袁世凯曾想用 50 万元收买宋教仁，但遭到了宋教仁的拒绝。于是，袁世凯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找来

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商讨“解决”宋教仁的方案。

1913 年 3 月 20 日，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北站，准备在这里登车北返。10 点 40 分，当宋教仁走到检票处时，却突然被一黑衣男子连击三枪，宋教仁应声倒地，凶手趁乱逃脱。当晚，宋教仁被送往医院急救，两日以后，经抢救无效去世。

◎宋教仁在医院

宋教仁遇刺的事件，至今仍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但是，关于其幕后凶手，当时的所有证据几乎都指向了袁世凯。宋教仁遇刺几天后，凶手应桂馨、武桂英被捉拿归案。在二人住处，调查人员发现了凶手与赵秉钧、洪述祖的往来信件。而赵秉钧、洪述祖两人，正是袁世凯的手下。

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哗然。正在日本长崎考察实业的孙中山，闻讯后立即回国。宋教仁之死使孙中山悲愤交加，为其题词：“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当晚，革命党成员聚集于黄兴寓所商讨对策。国民党内有两派：一派主张法律倒袁，另一派主张武力讨袁。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还准备亲自赴日本寻求日本政府的援助。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也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他先是向五国银行团签订了 2500 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还通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的“辫帅”张勋，令其整军待命。

同时袁世凯于 6 月 9 日、14 日、30 日先后撤免国民党党员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又派特工人员炸毁湖南军械库，使谭延闿无力反

抗。袁世凯还在报上公开发表专电，传语国民党人“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兴兵伐之”。与此同时，袁世凯详细拟定了三路进攻南方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军事计划。

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提出借款后，引起舆论不满，孙中山也借此机会，令胡汉民、陈其美分别在广东和上海发难，只是胡汉民、陈其美二人，对孙中山的主张并没有做积极回应。黄兴也不愿意促成南京独立，他们还是认为，应该利用国会进行合法斗争。国民党中，最坚决配合孙中山计划的是江西都督李烈钧，他在湖口组织了讨袁军，于 7 月 12 日发表讨袁通电，拉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这让饱受挫折的孙中山+分振奋，还准备亲自到南京主持讨袁。

黄兴见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已箭在弦上，再次谨慎判断了局势，决定亲自到南京组织讨袁军务，孙中山则留在上海协助陈其美：7 月 14 日，黄兴乔装到达南京，当晚召开军事会议，组织布防。

7 月 15 日，黄兴会晤江苏都督程德全，促其响应讨袁。程德全囿于形势考虑，被迫宣布独立，黄兴担任讨袁军总司令，江苏所属徐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淞江、靖江等地相继独立。7 月 17 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担任讨袁军总司令。18 日，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为讨袁军总司令。与此同时，广东也宣布独立，陈炯明为讨袁军总司令。19 日，许崇智逼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独立，许崇智为讨袁军总司令。25 日，湖南宣布独立。8 月 4 日，四川宣布独立。一时间，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坐镇上海的孙中山于 7 月 22 日致电袁世凯，劝其辞职，电文说：“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反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反对君主

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但是，由于北洋军的军事实力，在其全面进攻下，二次革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先是上海吃紧。讨袁军曾一度占领吴淞炮台，但在敌军炮火猛烈攻击下进退维谷，敌军坚守制造局，讨袁军多次进攻不下。不久，讨袁军退守闸北，遭遇英军，战斗至 8 月 13 日，上海讨袁军以失败而告终。江苏讨袁军因相互协调不力，致使孤军奋战，遭敌猛攻，损失惨重。与此同时，陈其美等率军进攻上海七昼夜不下，南京讨袁军三面受敌，形势危急，黄兴无力再战，于 7 月 29 日乘轮船离开南京，直赴日本。黄兴离开后，江苏都督程德全立刻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迅速派何海鸣去接替，8 月 11 日，何海鸣再次宣布江苏独立。但袁世凯随即派张勋向南京大举进攻，南京卫戍军与城内的讨袁军坚守至 9 月 1 日，终因弹尽援绝而失败。

在军事上，各省讨袁军都不是北洋军的对手，且讨袁军之间缺乏统一指挥，而帝国主义又出兵支持袁世凯，在敌人的猖狂进攻下，各地讨袁行动相继失败。从 8 月初开始，先前独立的各省相继取消独立。经过两个月的鏖战，二次革命最终失败。

经过如此一役，国民党元气大伤。而袁世凯则借机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2.临危改制铸新魂——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悬赏 10 万大洋追杀孙中山，孙中山不得不再次逃亡。他偕陈其美等人，于 1913 午 8 月初离开上海到达广州，经由友人

帮忙再经台湾基隆转赴日本。

在日本，孙中山一方面与革命党人继续策划讨袁，一方面开始总结以往历次失利的经验教训，着手改组国民党。孙中山认为，以前所建立的民主政党如同盟会，没有严格地服从领袖的纪律约束，成员自由散漫、独自行事，甚至敢于攻击领袖。这些导致了其长期的内部不协调，在革命中各行其是，不服从命令而导致革命失败。对此，孙中山在后来致友人邓泽如的信函中做了说明。这封信中，孙中山对以往革命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他认为革命之所以一路遭遇挫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号令不动党人，许多正确意见不能被理解和接受，委屈烦恼之情充溢于言辞之间。此时的孙中山已下定决心，重建新党，准备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以“服从党魁”的原则来约束全党。

1913 年 9 月 27 日，孙中山亲自拟定了中华革命党的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并接受遵约履行手续的王统等人为新党首批党员。

在创立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国民党的另一重要领袖黄兴与孙中山的意见截然相反。他之前就不认同立即发动武装斗争讨伐袁世凯。黄兴认为，革命活动接连遭受沉重打击，已在国人中失去威信，自身也无力立即进行有效的抵抗，如今更认为创立中华革命党以重新着手武装革命的计划会进一步引起党内分歧，因此还是应该“计划久远”。同时，黄兴对党员加入中华革命党要宣誓效忠于孙中山个人，并加盖指模的办法极为反感，认为这种形式等于犯罪的人写供状一样，违背了孙中山所提倡的平等自由主义。

虽然黄兴的意见很大，但孙中山这次抱定了“要做一个真党魁”的决

心，对这些反对声音不以为然。1914 年 5 月 29 日，孙中山致函黄兴，历数二人之间意见不合的历史，明确表示这一次自己决心亲临战场，以快平生之志。如不能成功，则自己退居二线，让黄兴出面领导革命。

当年 5 月，谭人凤、柏文蔚、胡汉民等人于东京召集有关人士，谋求统一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事。居正、胡汉民等响应孙中山的劝告，同意加入中华革命党，廖仲恺等 30 余人也加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力量得到壮大。

7 月 8 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职，并参考了之前党内的意见，将誓文中“服从孙先生”改为“统率同志再举革命”，“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同日，颁布《中华革命党党章》，共 39 条，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目的是“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

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党章》将革命的进行秩序分为三个时期：(1)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2)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3)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这个总章已体现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和政治纲领。

《中华革命党党章》还以入党时间为标准，将党员分成三种。这三种党员的地位不同，所享受的权利也不同。第一种是“首义党员”，主要指革命军未起义之前入党的党员，革命成功后，他们将成为“元勋公民”，享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第二种是“协助党员”，主要指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党的党员，这些人在革命成功后将成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及被选举的权利；第三种是“普通党员”，主要指在革命政府成立之

后入党的党员，这一部分人在革命成功后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有公民资格，只有在宪法颁布后才能获得。

孙中山的这种做法虽然是出于激励革命同志的目的，但是实质上却是在党内党外划分等级，使党员之间不平等，党与非党更不平等，这也招致了不少人的非议。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使中国民主革命又跨入一个新时期。与此同时，袁世凯加紧了其倒行逆施的步伐。1914 年 5 月，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袁记“新约法”，总揽一切大权，把自己变成终身大总统。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暴露后，激起了各方革命派的强烈反对，反袁的武装运动也风起云涌，孙中山也带领他的中华革命党投入新的反袁斗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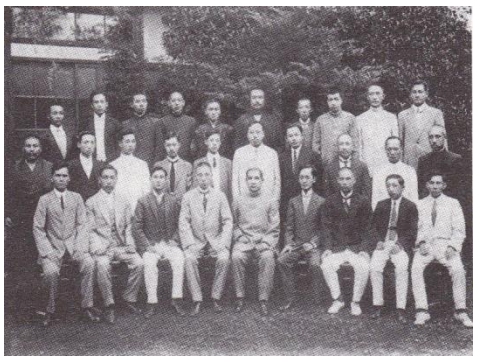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也正是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期间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为之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本是陈其美的部下。1912 年年初，曾在陈其美的授意下，组织并直接参与了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行动。陶成章所领导的光复会虽与同盟会抱持着同样的反清目标，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与孙中山、陈其美等人长期不睦。辛亥革命后，浙江军政府成立，陶成章被选为省参议会议员。1912 年 1 月，浙江革命党人众议拥戴陶成章出任浙江督军，一向视江浙为自己势力范围的陈其美，自然对陶成章更为愤恨，故欲除之而后快；

刺杀陶成章事成之后，蒋介石前往日本躲避风头长达整整一年。1912 年年底，蒋介石回到中国，不久又和陈其美投入到二次革命的大业中，声讨袁世凯。讨袁之役失败后，陈其美、蒋介石不得不潜入地下，后来他们意识到在中国无法立足，只好再次逃到日本避难。

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筹划建立中华革命党，陈其美是他为数不多的心腹之一。经陈其美的引荐，孙中山会晤了蒋介石。

这天，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同陈其美一道前往孙中山住处。陈其美走在前面，蒋介石紧跟其后，一同进到总理住处，孙中山只见蒋介石着士官学校制服，意气风发，心中已有几分好感，欣然问候道：“这就是蒋介石吗？见到你是我的荣幸。”然后三人落座，纵论天下之事，蒋介石早有准备，言谈颇有见地。孙中山极为欣赏，谈论良久，夜深而不忍别离。临走之际，孙中山说蒋介石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这正是革命最需要的，还说蒋介石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民族之英雄，如此种种。蒋介石被召见后，情绪激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15 年 7 月 8 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

之后，蒋介石跟随陈其美东征西战，为革命事业奋勇不顾。1914 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再次在上海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但后来因军事行动败露而失败。1915 年，蒋介石在上海参与了制定刺杀袁世凯心腹郑汝成的计划。11 月 10 日，是日本大正天皇加冕之日，郑汝成前往恭贺之时，在白渡桥北墩被陈其美的人袭击，当场毙命。

郑汝成被诛，上海敌人群龙无首而陷入混乱，这正是起兵的绝好时机，陈其美、蒋介石等马上策划上海起义，蒋介石的主要职责就是制定进攻计划。在蒋介石精心酝酿谋划之下，最后出台《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提出首要目标是夺取肇和、应瑞、通济军舰，然后夺取江南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控制整个上海。但后来因为应瑞、通济两舰被当局收买，阵前

倒戈，使得肇和之役以失败而告终。肇和之役虽然失败，但在全国反袁斗争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孙中山评价道：“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

◎孙中山为募集资金而发行的中华革命党债券

3.壮士断腕再呼号——护国与护法运动

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期间，中国国内政局又有了新变化，袁世凯先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甘愿充当日本附庸。后来为了做皇帝，更是上演了一幕幕复辟丑剧。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后，激起了各方革命派的强烈反对，新的反袁斗争在暗中酝酿。

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孙中山凭借这支力量更加积极地准备武力讨袁，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总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工作。他令陈其美赴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部；令居正赴青岛，成立东北军部；令胡汉民赴广州，成立西南军部；令于右任赴陕西，成立西北军部；令夏重民、胡汉民去加拿大，组织华侨讨袁敢死队。

这些革命党人在国内一些城市先后举行了暴动、暗杀或策动兵变等。特别是1915年11月，陈其美组织人在上海暗杀了袁世凯的心腹于将郑汝成，给袁世凯很大震动。紧接着陈其美、蒋介石又在上海策动防守上海的肇和、应瑞、通济三舰起义，这次起义最终虽未获成功，但进一步壮大了反袁的声势。

当年12月，袁世凯复辟闹剧达到高潮，国内的反对声浪也此起彼伏。孙中山认为时机已到，公开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的种种罪行："今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即寓共和即称民贼"，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爱国之豪杰共图之"。

◎蔡锷

12月17日，李烈钧会同熊克武、方声涛等奉孙中山的命令，潜抵昆明策动起兵反袁。此前，孙中山已派李华英从东京前往北京与蔡锷联系，动员蔡锷南下反袁。

蔡锷曾在清末时任云南都督，在职期间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人，在昆明领导新军积极响应，蔡锷被推举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不久之后，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任军政府都督。1913年10月，袁世凯为了笼络与监视，调蔡锷赴京就职，任全国经界办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还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不过，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蔡锷

的主张并不重视。加之后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蔡锷极为愤慨，故萌生回云南武装讨袁。1915 年 11 月 11 日，蔡锷乔装离京赴东京会晤孙中山，后从东京经香港、河内顺利到达昆明，会同李烈钧、唐继尧发动反袁起义。由于唐继尧此时仍然奉孙中山为精神领袖，并自言秉承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的教导与启迪而举义反袁。所以护国之役的首发，亦未脱离开孙中山的领导。

1916 年 1 月 1 日，袁世凯称帝当日，云南护国军成立护国军政府，列举袁世凯罪状二十条，传檄讨袁。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为蔡锷，出四川入武汉；第二军总司令为李烈钧，经广西、广东，取道湖南、江西至武汉；第三军总司令为唐继尧，担任留守，负责后勤。

1 月 4 日，袁世凯沿袭康熙平定三藩的战略，派军三面进攻云南。川省为一路，湘省为一路，桂边为一路，以曹锟为总司令，督率前进。蔡锷第一军分三路人川，川军张敬尧也以三路抵抗。1 月 18 日护国第一军在叙州燕于坡、横江地区与川军交战，护国军连战连捷，于 20 日占领宜宾和屏山县。

袁世凯和日本签订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却并未得到日本支持他称帝的允诺，于是又派周自齐赴日提出帝制交换条件 6 项，不惜以卖国割地为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持。但日本认为袁世凯在国内已成众矢之的，行将失败，拒绝了袁世凯的这张空头支票。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将此 6 项条款于 1916 年 2 月初通告国内外，并呼吁筹饷。此时欧洲各国的态度虽然不支持袁世凯称帝，但仍然帮助袁世凯迫害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孙中山于 1 月 18 日致函康德黎夫人，请其夫妇促请英国政府改变对

革命党人的态度，勿要再做袁世凯的帮凶。

但欧美一些自称民主的国家，向来不真正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而俄、德等封建诸国，更是奉行对中国革命不遗余力的破坏政策。

为了推翻袁世凯集团的统治，建立民主的中国，孙中山详细拟出了军事计划，即“云、贵独立以后，鄂、赣、苏、杭等处，均准备行动，其中虽稍有泄破，然势力仍在，元气未伤。刻下，决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下，与云南打成一片，南方局势已是自治，沿江各省，自然动摇。至于北方经营，现亦大有头绪。陕西革命军，断难扑灭。南方军械补足，即图大拳北发”。这个军事计划在此次反袁斗争中未曾用上，但在后来的护法战争和北伐中陆续得到实现。

袁世凯一面寻求列强的支持，一面调兵遣将向革命军猛烈反扑。1 月 28 日，袁军反攻，双方激战四个昼夜，袁军第一次夺取叙州府的企图被粉碎。袁世凯不甘心受挫，又连续三次进攻叙州府。但在护国军的奋勇斗争下，袁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东路蔡锷率护国军第二梯团到达贵州毕节后北进，在四川与袁军展开激战，给张敬尧以沉重打击。一时间，护国军的节节胜利使敌人闻风丧胆。

护国军进军的同时，革命党人在其他地方也广泛开展武装反袁斗争。1 月 6 日，广东陈炯明在惠州起义，占领平山。2 月 8 日，居正、许崇智在山东起义，一周内连克 6 座县城。2 月 9 日，朱执信进攻广州。18 日，蔡济民等在武昌南湖策动起义。2 月 21 日，杨王鹏率部于长沙进袭将军府和警察署，反袁斗争迅猛地扩展。

袁世凯妄想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连

他身边的亲信也开始弃他而去。1915 年 9 月，黎元洪请求辞去副总统职务，不再到政府议事。10 月，徐世昌请辞国务卿职。12 月，一度亲袁的梁启超离京赴沪。接着，汤化龙、熊希龄等纷纷请假离京。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出现了一股政府官员弃职离京的风潮。在护国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期间，1916 年 1 月 27 曰，贵州首先宣布独立，广西于 3 月 15 日也宣布独立。接着，广东、浙江、陕西纷纷独立。一度热衷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宣布独立。

迫于内外压力，袁世凯于 1916 年 3 月 22 日发表声明，宣布取消帝制。但在撤销申令中，袁世凯的口气依然强硬，仍以大总统自居，声称：“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袁世凯下令废止洪宪帝号，却想保住大总统之位。在看到袁世凯的退位诏书后，孙中山于 3 月 23 日又电告汉口的同志要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

4 月中旬，滇、黔、桂护国军针对袁世凯所提的停战议和条款提出六项条件：

(1)　袁世凯不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

(2)　依云南起义时之要求，诛戮附逆之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3)　关于帝制之筹备费及此次军费，约六千万元，应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赔偿。

(4)　袁世凯之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5)　袁世凯退位后，即按约法，以黎副总统元洪继任。

(6) 文武官吏，除国务院外，一律仍旧供职。但军队驻扎地点须听凭护国军都督之指命。

但袁世凯坚持不退位，讨袁之役仍在进行中。由于革命党人力量相对薄弱，孙中山于 3 月 28 日致电各地，要求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上海。电谓：“款难分拨，此时务注全力于沪，以求万全。”但上海迟迟不能有所动作。孙中山又转而把目光投向山东，让居正“以全副精神对之，期以必中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

孙中山感觉到军事人才的急缺，故请邓泽如于南洋物色得力助手，出资派他们到日本，加以军事训练，“用备他日中下级军官之选”。另外也请邓泽如物色军旅以外之敢死队，“对待毒蛇猛兽，须兼用直截了当功夫”。孙中山还提到购买两架飞机的事，表现了其军事现代化的设想。在紧张的革命形势中，孙中山也不忘筹备、建立中国的空军，派周应时与日本人坂本寿一订救援飞机的契约书。

与此同时，陈其美在上海继续苦心策动反袁斗争。他曾约定海陆军于 4 月 12 日午夜同时发难，但因当日大雨，号炮无法点燃而延至次日凌晨。由于事先未及通知，海陆军未能响应。上海讨袁失败后，陈其美又派蒋介石等进攻江阴要塞。蒋介石一度占领要塞，终因内部分袂而失败。

为直接参加反袁斗争，孙中山偕廖仲恺、戴季陶、张继等于 1916 年 4 月 27 日由日本启程回国，5 月 1 日抵达上海。孙中山抵达上海后，于 9 日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强调保护约法，除恶务尽，对袁世凯不能迁就。孙中山还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电文直言：“公知大势已去，始下令取消帝政，不得为皇帝，尤冀为总统，公子厚颜无耻，毋乃太甚！”

孙中山还改变中华革命军独立进行反袁战争的策略，致电南方独立五省当局，声明要和他们共同行动，将讨袁之役进行到底。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孙中山还把中华革命党的青天白日旗暂收，改用通用的五色旗。在全国一片倒袁声中，袁世凯众叛亲离，病情加重，于 1916 年 6 月 6 日死亡。至此，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战争结束。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中山立即给他打电报，提出恢复《临时约法》的问题：“中邦专制，历数千年，共和方新，忽被摧挫，去乱图治，愿力反前人所为。有如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在舆论压力下，1916 年 6 月 29 日，黎元洪发布命令，遵行《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不久，国会复会，民主与法治初显曙光。然而好景不长，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最终导致了张勋复辟的闹剧。段祺瑞乘机打出反复辟旗号，组织讨逆军，进军北京，赶走张勋，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出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复出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废弃共和政体，实行武人专制。

自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即举起护法大旗。孙中山一贯坚持的护法主张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而且也博得不满于段祺瑞独裁统治的西南军阀、海军官兵和原北京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响应。于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召开了非常国会，于 1917 年 8 月 31 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决定组织护法军政府，其任务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根据《大纲》的规定，军政府采用元帅制，在《临时约法》。恢复前，大元帅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9 月 1 日，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被选为元帅。接着，孙中山宣布段

祺瑞为民国叛逆，下令讨段，出师北伐，由此爆发了护法战争。

就护法战争而言，它在几个月内使烽火燃及十余省，打击了段祺瑞的统治，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成效。但是，之后西南军阀公开与孙中山分裂，导致护法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这也是护法运动最终失败的重要元凶：1918年1月，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在广州擅自组织“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与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分庭抗礼。接着，西南军阀又操纵非常国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从而控制了护法军政府，使孙中山被迫愤然辞职，表明护法运动已基本失败。

孙中山发起和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是捍卫民主和共和的两次重要斗争。它作为辛亥革命的继续，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揭露了北洋军阀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面目。然而，这几次运动的失败，也暴露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存在的许多不足。这些沉痛的经验教训，使孙中山更深刻地意识到，如何选择革命的同盟军至关重要。他不再相信军阀势力，开始积极探索新的盟友。从此，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这一思想，是与孙中山认真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种种经验教训密切相关的。

第二章

十月革命和中国民众的觉醒

一、新文化运动下的中国

清王朝的统治虽然已被推翻，但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旧思想、旧道德仍在中国根深蒂固。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抱着对民族的深深同情之心，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整个思想面貌。新文化运动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展开了。陈独秀是这场运动的旗手和总司令，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了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的大本营。他们从改造中国的文化入手，大力提倡科学和民主，白话文和新文学，新道德和新风俗。《新青年》杂志社迁到北京之后，新思想也开始滋润着中国北方。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北大校园成了当时社会的一股清流，新文化运动也开始通过在这里的酝酿，进入了新的阶段。

1. 革故鼎新师德赛——陈独秀与《新青年》

袁世凯为了复辟称帝，在社会上极力推崇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不仅本人“身体力行”，大搞祭天祀孔，还带动了清朝的一些遗老遗少上行下效。这些人似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重新穿起了前朝的长衫马褂，留起了长长的辫子，极力叫嚷“发扬国粹，维护国俗”，甚至还主张“定孔教为国教”。还大肆诋毁辛亥革命是“贱民造反”，诋毁民主共和制度是“犯上作乱”，鼓吹君主复辟。一时间，社会上还涌现出了“孔教会”、“经学会”等一批尊孔社会团体，形成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尽管袁世凯的复辟闹剧为时不久便草草收场，但其背后所反映的封建遗毒却让人不寒而栗。中华民国已诞生数年，但是中国社会却没能走向真正的民主共和，相反，还有太多的中国人没有跳脱出封建思想，这也是导致中国社会仍处于混乱与黑暗之中的重要原因。

惨痛的教训促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思考和反省。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真正推翻封建帝制，防止封建复辟，必须在人们的头脑中先树立民主的理念，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

陈独秀就是其中一位。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个小户人家。

陈独秀两岁时，生父病故，他被过继给叔父陈昔凡。这陈昔凡是清朝的举人，做到过知县、知府。不过，小时候的陈独秀受祖父的影响更多。祖父也是个读书人，甚熟四书五经，时常要求陈独秀跟着摇头晃脑地学习这些东西。陈独秀当时很是顽皮，时常违抗祖父的意愿，祖父对他又是毒打又是厉骂，陈独秀愣是一声不吭，以沉默相抗，这可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要命。祖父常常捋着胡子，不无担忧地说：“这小东西长大后，不成龙，就是蛇。”

陈独秀从心理上反感四书五经，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孝子，母亲当然是希望儿子能够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了敷衍母亲，1896年，陈独秀17岁的时候，去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秀才。第二年，陈独秀又去参加南京的乡试，但是这一次却名落孙山，不过这正好也让母亲断了这个念想。陈独秀注定有他独特的生命轨迹。

1897 年，陈独秀进入了杭州求是书院学习。在这里他对封建制度的腐朽落败和列强的侍强凌弱更是耳濡目染。1895 年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公车上书事件，1897 年山东德州湾被德国霸占。美、法、日、俄也一拥而上，在中国强占港湾，划分势力范围。在学校里，陈独秀不断地接受着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于是他的思想也慢慢发生变化，逐渐成长为一名反封建的革命斗士。这个充满血性的青年，看到国家满目疮痍，激情澎湃地写下《扬子江形势论略》，希望为国献策，但并未受到重视。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了，陈独秀也颇感心灰意冷。

1899 年，20 岁的陈独秀对于清廷腐朽的统治早已是深恶痛绝，时不时发表反清言论，遭到书院开除。即便离开了书院，陈独秀也没被吓倒，他依然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后终于惹怒了清政府，遭到通缉。

眼见国内没法立足，陈独秀决定出国，当时很多人都漂洋过海到日本留学，他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1901 年，陈独秀从安庆逃往日本，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他在日本十分活跃，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社，同时又接触到了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尔等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第二年，陈独秀回到安庆，组织了藏书楼演说会，集结了一帮人探讨救国方略，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陈独秀又不得不回到日本，组织了青年会。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对日的严正交涉，陈独秀又被迫回国。

1904 年，陈独秀与友人合办了《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每顿只能喝稀饭，住的房间潮湿，被子发了霉，甚至生了跳蚤，但这些苦对陈独秀来说都算不

了什么。20 岁出头的陈独秀脑子里充满了想法，浑身都是干劲，这个报共出版了 22 期，陈独秀在上面发表了 50 多篇文章。陈独秀先后办报刊数十种，他曾经跟人说：“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此种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第二年，陈独秀在芜湖与好友一起创办了一个秘密的反清军事团体，号称岳王会，陈独秀被推选为会长。1908 年，岳王会发动武装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受株连者达到 300 多人。这件事对于陈独秀的打击很大，此后的几年，他一直沉默寡言，很少发表政见，也没再参加大的政治活动。

辛亥革命的枪声又激起了陈独秀内心的苦闷和沉寂，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的革命之火，他又踊跃发表文章，讨伐清王朝。革命胜利后，他还当上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篡权后，陈独秀毅然辞职。

1914 年，章士钊在日本办了《甲寅》杂志，特邀陈独秀协办。陈独秀办杂志积累了不少经验，当时又正受到袁世凯政府的通缉，便立刻答应赴日。也正是在这一年，陈独秀结识了李大钊，谁也未曾料到日后这两人共同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15 年初夏，他又启程回国了，他已经在酝酿着自己创办一份杂志，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也许他自己也未曾想过，这本杂志也注定了他一生的生命轨迹。9 月 15 日，16 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了，陈独秀发表了创刊宣言《警告青年》，号召青年奋起智能，力排陈腐朽败。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陈独秀在中国第一次擎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第二年 9 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继续为新文化运动摇旗

呐喊。《新青年》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旗手。

要破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就必须提倡民主。作为《新青年》的主帅，陈独秀一心希望拯救中国于苦难深渊，他为中国的前途而悲叹，他为寻找能救治中国的良方而奔走呼号。面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他在不断的奋斗和求索中终于发现只有提倡民主才能救治中国百姓心灵的愚昧和麻木。

陈独秀时常夜不能寐，在苦苦思索当时中国民主的现状，他常常这样问自己：“中国有民主吗？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到了近代又被列强入侵，统治阶层成了洋人的朝廷！可悲啊!”他又回答自己：“这样的国家的人民，就像瞎子一样，出生以来就不知道光明为何物，他们从生出来就不知民主是什么东西啊！只知道见了老爷要磕头。”

“这该怎么办呢？”陈独秀思索着，“康有为、梁启超向日本学习，希望建立君主立宪的政府，结果失败了；孙中山向美国学习，希望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果被袁世凯赶出了中国。那么我们究竟该向谁学习呢？”陈独秀此时把目光投向了法兰西。

他像找到了丢失的孩子一样，异常兴奋，在《新青年》这块自己开辟的阵地上战斗，先后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人权宣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来宣传这种民主思想。

他常常不顾夜已深沉，披衣而起，奋笔疾书。“要拯救中国只有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

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都是他深夜思索的结晶。

面对陈独秀的呐喊，也有一些封建卫道士拼命反抗。1917 年 10 月的一天，十里洋场的上海依然热闹如常，在一个洋人开设的高级酒店里，一群留着辫子，蓄着山羊须，头戴瓜皮帽的老头们端坐一堂。只见他们义愤填膺，不停地咒骂着什么，有的人甚至气得手都有点哆嗦，要不是身边的人扶着，恐怕就倒下了。

“诸位！诸位！大家静一静！”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登上前台向大家挥手致意，顿时场上静了下来。

“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共贺‘圣德坛’的开坛以及‘上海灵学会’的成立。”下面响起了一片掌声。

老者接着不无遗憾地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如今皇帝没了，孔圣人也不被尊敬了，经书也没人读了。我辈都年纪一大把了，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后人堕落到畜生的地步啊！”

老者说到这里环视了一圈下面的人，接着清了下嗓子说：“是故我们今天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立‘圣德坛’，把先圣的思想发扬光大！”“灵学者，是百科之首，可以通天人、养精神、增道德。《易经》曾说过：‘知鬼神之情状，其唯圣人乎。’灵学就是圣学啊！”

老者显得有些激动：“因此我们今天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设立灵学会。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

“这真是胡说八道的鬼话。”陈独秀看着报纸上的报道，感到又好气又好笑。

“就让我来捉弄这些妄称鬼神，实则害人的老混蛋们一下!”陈独秀嘴角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

陈独秀挥笔写下了《有鬼论质疑》:“如果人死以后有鬼，有灵魂存在，那么以此类推，一切生灵皆有鬼魂。例如牛、羊等动物死后也应该有鬼存在。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只看到人的鬼，不见犬马之鬼呢？”陈独秀在这篇六百多字的短文中，一口气提出了 8 个使这些妄称有鬼论的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人看到这篇文章后倍感丧气。

一天，陈独秀的同事、北京大学心理系的教授陈大齐来找陈独秀，闲谈中说到了古人扶乩的事情，陈独秀就问陈大齐此事的真伪。

陈大齐一听哈哈大笑:“独秀兄，你这回可算问对人了！我对这个东西可是进行过研究的。我还写了一本《辟灵学》专门驳斥这些王八蛋，回头送你一本。”

“那再好不过了!”陈独秀显得十分高兴，因为专业人士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不谋而合。

“独秀兄，这个很明白的．这些扶乩所得的文字并非‘圣贤仙佛’所为，完全是扶乩人自己在那里胡说罢了。有时候说得比较圆满，有时候可谓是漏洞百出啊!”

“愿闻其详。”陈独秀认真听着。

“你看，有的乩文上说‘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能作大草’，周代并没有七绝诗，草书也是东晋以后才出现的，这不就很明显了吗？所谓周末诸子和孟轲不都是扶乩者在说谎吗？”

“哈哈哈……”厅堂里传来了两位智者的笑声。

这些封建遗老遗少们为了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还大肆提倡封建礼教。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连续发文，对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们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除了陈独秀以外，当时还有一批斗士投入了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之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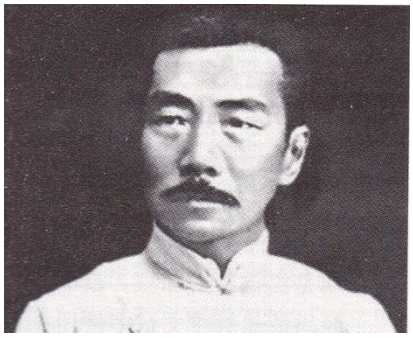
出生在没落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鲁迅，对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无情有着切身的感受。

“还要让这种害人的东西维持下去吗？已经害了老百姓几千年了，还要害下去？害得女人缠起个小脚，不能正常地走路！害得年轻守寡的女子抱憾终生，却不能享受正常的幸福生活！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害得女子在出嫁之前是父母家庭的附属品，让嫁给谁就嫁给谁。甚至有昧了良心的父母为了自己能多得到一些钱财，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出嫁之后就是丈夫的附属品，丈夫死了以后就只能指望自己的孩子，孩子孝顺的还好，不孝顺的话只能盼着自己早死以求得解脱了！害得孩子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手脚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父亲是个混蛋的自己也要去学，去做混蛋，永远超越不了自己的父亲，甚至不如自己的父亲。这些礼教害得臣子在君王面前只知道愚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变态的、畸形的臣子才叫好臣子……这算什么一个社会啊！”鲁迅不敢再想下去，他不敢设想按照这种逻辑和主张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他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

◎创办《新青年》杂志时期的陈独秀

鲁迅用自己如投枪、匕首般的文字，以一个所谓的“狂人”之口写下

了警醒世人、流传千古的文章：



◎鲁迅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吃自己。”“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鲁迅一气呵成，然后将文章寄给了陈独秀。这就是有名的《狂人日记》。

看到文章的陈独秀拍案叫绝，连呼：“好文！好文！这简直是一份控诉书，是一把匕首，直插像康有为那样的卫道士们的心脏！礼教是会吃人的啊！”他决定在当期的《新青年》刊登。正是在陈独秀、鲁迅这些人的坚持下，《新青年》成了当时传播新思想、反对旧纲常的阵地，中国的思想界，迎来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2.文坛新风别旧韵——胡适与提倡白话文运动

《新青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对旧的纲常名教的批判，在推动文学革命方面，《新青年》同样功不可没。

《新青年》创办初期，来稿多是用艰涩难懂的文言文书写而成，不仅束缚了新思想本身的表达，也使得《新青年》的发行范围有限，对于广大

老百姓，更是难以起到启蒙的作用。陈独秀经常为此事而发愁。

有感于《新青年》杂志的文字和文风带来的种种不便，陈独秀决定寻找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和他一起来扛起这面大旗，来改良杂志。毕竟他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他自己的呼声太微弱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身边好友。其老友、安徽同乡、时任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听到陈独秀的倾诉后，立即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胡适。汪孟邹称赞胡适是聪明绝顶．文章落笔千言，新意迭出，石破天惊。陈独秀欣然答应，高兴地说："老汪，只要你能请到胡适为本杂志写文章，我请你到上海最好的酒楼去大醉三天。"

胡适在 1910 年即留学美国，先是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当时的胡适，一心要为将来做中国第一流的哲学家打好基础。与此同时，胡适也是当时支持中国文学改良的活跃分子。1914 年夏天，康奈尔大学中以任叔永（鸿隽）为首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一开始集资筹办《科学》杂志。创刊于 1915 年 1 月的《科学》杂志，从一开始就使用西文标点符号，这在中文报刊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要知道中国传统文章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当时国内的一个学生在文章中仅仅写了一个句号，就被老师骂得狗血淋头："这种鬼画符的东西也能入文吗？有辱斯文啊!"用鲁迅的话说，那时"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而胡适却对在文章中使用标点符号大为赞扬，在该杂志上发表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文章，毫无保留地宣传自己的这一主张。

1915 年 10 月，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给胡适寄去了第一封信，但是长

久不见回音。陈独秀却把这件事牢牢记在心头，以后每次见汪孟邹就追问此事，说：“汪兄，时间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见你说的那个胡大才子的回信呢？”搞得汪孟邹像欠了陈独秀的债务似的。

汪孟邹无奈之下，只好在 1915 年 12 月再次给胡适写信：“陈君（独秀）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我将穷于应付也。”

陈独秀急切地盼望着胡适的来信，如同小孩子盼望着父母出门带回的点心。终于，在次年 2 月，他收到了胡适的来信。胡适在信中建议：“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人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并随信附上一篇俄国文学译作。胡适在信中答应，会在新年时寄回自己的稿子，以慰陈独秀焦急的心情。

当时的胡适，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学之后，也正在反思中国文学当时的种种境遇。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经常把文言文和白话文相比较，试图分析二者的差异与优劣。“文言文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文字，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许多事物用文言文来表达，已经远远不能完整表达出其应有的意思了，可以说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啊！而白话文来源于人们的日常口语，通俗易懂，和文言文相比，是一种活的文字啊！再说近代以来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一类小说不都是因为用当时的白话文写就的缘故才能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吗？白话文一定能产生中国一流之文学！”

胡适在苦苦思索之后，终于找到了着力点，开始登上了新文化运动的

历史舞台，并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一天下午，胡适按照自己日常的生活习惯正准备午休，但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老友汪孟邹几次三番来信催文，又想起陈独秀前几天致信自己时，信中的一段话：“希望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登之下期《青年》。”正当陈独秀的请求在脑海中萦绕之时，胡适突然想道：“这不就是自己已经思考很久的从白话文人手改良文学的问题吗？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想到这里，胡适从床上一跃而起，顾不得洗漱，就开始奋笔疾书。“文学改良，要从以下八事人手：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日，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日，务去滥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认为，对文学的改良，要基于“历史化”的文学观。他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胡适一挥而就，仅用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此文，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就这样诞生了。写完文章后，胡适没有耽搁。他整理好文稿后立刻跑到邮局，把文章寄给了在国内的陈独秀。

收到信件的陈独秀，看到文章后喜出望外。陈独秀毕竟是识货之人，他注意到在当时还十分守旧的情况下，胡适敢在文章中批评章太炎“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是相当尖锐和大胆的。陈独秀如获至宝，立即把胡适的文章登载在 1917 年元旦的《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上。文章一经发表，

便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他的这八条主张，为中国文学解开了文言的桎梏，使得中国文学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看到《文学改良刍议》引起的巨大反响，陈独秀的心情久久不能乎静。一方面，他为中国有这样的青年人而感到兴奋，但与此同时，也觉得有些遗憾：“为什么要用‘文学改良刍议’这样的名字呢？这种死板的、半死不活的旧文字难道还不该全部改革吗？”陈独秀越想越觉得不过瘾。“我要声援胡适!”他回到屋里，铺开宣纸，笔走龙蛇。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他振臂疾呼，愿意身先士卒，为文学革命冲锋陷阵：

“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赫、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声的大炮，为之前驱。”

最后，给自己的文章加上了一个气势恢宏、态度鲜明的名字——“文学革命论”，继胡适的文章之后登在了下一期的《新青年》上。

这样一来，经过陈独秀的力挺，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在国内声名鹊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次年，胡适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宗旨，倡导在中国建立一种有生命、有价值的新文学。这篇文章以“建设活文学”的角度，与《文学改良刍议》中“废除死文学”的主题相呼应，将倡导白话文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白话文也成为传播新文化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

曾有史料记载过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当白话文开始通行的时候，学

校的墙壁上，匿名揭帖忽然增加。因为以前的人们，或用打油诗骂人，或用其他韵文论事，总之要有相当深厚的古文根底才行，不然就会被人骂为不通而失其效用。白话文则不然，“无论阿猫阿狗都会写上几句”。由此也可见白话文对推动信息传播、思想解放的贡献之巨大。

◎胡适

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后来曾这样高度评价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

3.兼收并蓄向自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新青年》杂志最早在上海创刊出版。这本杂志传达出的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虽然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但还没有发展成为声势壮大、影响深远的全国性运动。当时，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专家学者还没有参与进来，陈独秀等人发展新文化的呼声，也还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新文化运动真正形成规模，是在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社由上海迁往北京之后才发生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一个有名的进步教育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蔡元培，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顾，后改号孑民。曾用名有蔡振、

周子余、锷青、会稽山人等。1868 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其父亲曾是当地一家钱庄的老板。

蔡元培六岁时就进入私塾读书，少年时饱读经史，曾先后中秀才、举人、进士。28 岁时即受职翰林院编修。此时的蔡元培，已经成为一个才华出众、“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士大夫了。

然而，1894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中日马关条约》。蔡元培对此感到悲愤不已，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涉猎翻译西方书籍，思想眼界逐渐开阔，渐渐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意识到遵循祖宗成法，不能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蔡元培在当时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他认为“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这种认识虽然肤浅，却是迈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第一步。

1898 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对蔡元培触动很大。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同年 9 月，他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6—1916 年间，他几度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1912 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值得一提的是，1916 年蔡元培在法国从事学术研究时，曾与法国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出任中方会长。华法教育会是当时中法文化交流的总部，当时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国内招收大批华工，并为他们开办华工学校；二是发展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旳方式到法国留学。后面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赴法勤工俭学者达千人。其中，许多人在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和优秀干部。

1917 年年初，蔡元培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敦请下，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乘坐马车赴任那天，北大的校工们在学校门口列队欢迎，向这位新校长毕恭毕敬地行礼。这是北大的老规矩，以往的历任校长对此都习以为常，并不会对这些人予以理会，蔡元培却边走边脱帽向校工们致敬：“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说罢，这位将近 50 岁的新校长还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在传统封建纲常尚未破除的民国初年，官场上还保留着很多陋习。蔡元培礼让庶人的行为在当时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校工们在惊讶之余，十分感动地说：“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北大校风不正，不仅学校里很多纨绔子弟不学无术，连很多教工也对工作不负责任。蔡元培对此十分不满，开始雷厉风行的改革，整顿了教师队伍，裁掉了不少不合格的中外教员。同时又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此外，他还主持调整了北京大学的科系和课程谩置，扩充了文理两科。

1917 年 1 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主持聘用仪式，正式聘用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辜鸿铭为北京大学英文教授。这个头戴瓜皮帽、脑袋后面留着辫子的小老头一瘸一拐拄着拐棍上了台，那条滑稽的辫子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陈独秀看着辜鸿铭，低声对李大钊问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学界耆宿？怎么这么身打扮？”只见辜鸿铭右手轻轻一抬，便有一个身穿绅士服的英国白人从台下快步跑了上来，恭恭敬敬从辜鸿铭手中接过了雪茄及拐

杖。

辜鸿铭手持聘书，冷冽的目光扫向台下的师生，全场鸦雀无声。师生们默然看着这个古怪的英语教授。

“可笑吗？我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人，辫子长在心头，”辜鸿铭淡然说道，“老夫的辫子是有形的，诸君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说罢，辜鸿铭转身背向大家，将那条长长的辫子展现在众人面前：“请大家尽情欣赏！”

台下笑声一片。

就这样，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氛围。在这里，思想激进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较为西化的胡适和章士钊与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辜鸿铭能够和睦共事。各种不同派别的文人学者聚集一堂，课程设置也丰富多样，进入北大的年轻人们在这里接受着名师大家的熏陶。同对，也正是北大开放自由的学术风气和蔡元培全新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了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新文化运动也通过在这里的酝酿，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中国大地上浩浩荡荡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补课，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落后的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次激烈交锋。在这次激烈的交锋中，资产阶级新文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封建阶级旧文化的衰败，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兴起，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促使了中国的老百

◎蔡元培

姓，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促使人们更迫切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但同时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也有本身的局限。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思想武器仍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其目的仍然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有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列强的实力对比，颠覆了世界局势，也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作为参战国的俄国深受战争拖累，社会矛盾激化。在这一背景下，俄国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的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也由此建立，社会主义从理想成为现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重视并探索俄国的革命事业和其背后的理论指引。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李大钊站在时代前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认识到了这一学说背后蕴含的重大价值，豪迈地感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一夜春雷百蛰空——撼动世界的十月革命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经历了袁世凯窃权，继而又接受着北洋军阀的统治。然而，作为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虽诞生多年，却仍未将古老的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中解脱出来。而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列强，却已凭借对殖民地的掠夺渐渐实现了资本积累，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其中实力增长尤其明显的是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可谓是资本主义国家

之中的后起之秀，他们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自己，实力迅速超过了英、法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俄、日、意、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也明显增强，其中，尤其以日本和俄国的经济发展尤为迅速。

正如列宁所言：“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生命线。”随着这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他们需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由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这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来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随着列强矛盾的积累和不可调和，他们之间终于在 1914 年爆发了冲突。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日本、美国随后加入）和以德、奥、意（后退出）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之间，展开了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了。“一战”的最后结果是德、奥两国惨败，无奈投降，作为战胜国的英国、法国和后来退出战争的俄国也因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实力大减，而只有投机取巧的日本和美国从战争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这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同样改变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格局。西方列强忙着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而日本则利用这一时机，夺取了德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并由此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掠夺。

1915 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旨在控制中国。袁世凯死后，日本又继续选择段祺瑞作为其在华利益的代理人。1917—1918 年期间，段祺瑞政府向日本政府或公开，或秘密地举借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借款。这一系列借款史称“西原借款”，极大地方便了日本在华攫取特殊权益。不仅如此，1918 年 5 月，段祺瑞政府还和

日本政府先后签订了旨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两份协定规定，日军可以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大批开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并可以指挥有关的中国军队。在这段时期，段祺瑞政府还聘请了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并由日本派专门军官来训练中国的军队。北洋政府的这种种举措，使得日本在华侵略势力迅速膨胀。这样一来，日本的膨胀就打破了“一战”前期，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加深了日本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而国内军阀因为充当着各列强的在华代理人，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激化。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混战，中国的平民百姓在这内外夹击下苦不堪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暴露无遗。战场上血肉横飞，战后物资奇缺，老百姓生活困苦，人们精神空虚，出现了种种社会弊病，资本主义优越的神话被活生生的现实击得粉碎。然而战争的残酷，也唤起了各国民众的觉醒。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处焦灼态势，彼时的俄国作为“一战”的参战国，受战争影响，社会矛盾重重，经济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时年 3 月（俄国旧历二月），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工人因对当时的局势不满，举行罢工示威，工人们在街头高呼着“反对饥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的口号，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沙皇政府担心情况失控，遂对工人们的示威采取了武力镇压的手段。他们没有想到，这种残暴的行为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工人们的奋起反抗。罢工由此升级为武装起义，斗争之火也由彼得格勒蔓延至全国。

3 月 15 日，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无奈之下宣布退位。其弟弟、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大公拒绝继承皇位，这也意味着统治俄国 300 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宣布终结。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之后，俄国同时出现了两个政权，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然而，俄国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因沙皇被推翻而有所好转。新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依旧坚持参与“一战”，在国内则将枪口对准了苏维埃和反战的民众，俄国社会依旧被无奈、痛苦和愤怒笼罩着。

同年，见到俄国局势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人物列宁，也结束了在芬兰的流亡生活，回到自己的祖国。当年 4 月，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彼得格勒的塔夫利达宫正式召开，列宁在会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后来著名的《四月提纲》。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体上已完成，此时应该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得以实现；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形式不应该是议会制共和国，而应该是苏维埃共和国；他提出了两个口号——“绝不支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享有全部政权”。在经济上，列宁认为应该把地主的土地统统没收，实现土地和银行国有化，应由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总的来看，《四月提纲》对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做了规定，指引着俄国革命向前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临时政府对当时俄国民众的两项主要需求——和平和土地的忽视，是这一政权仅维持几个月就被推翻的最重要原因。当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彼得格勒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率先发动了武装起义。

起义军商定，以涅瓦河上停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信号发出后，起义军开始进攻冬宫，深夜时分，起义军攻破冬官，将临时政府成员逮捕，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逃跑，存在了几个月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宣告垮台。是夜，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官召开，会议宣布了临时政府垮台的消息，并决定由苏维埃掌握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次日，列宁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大会还宣布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列宁担任主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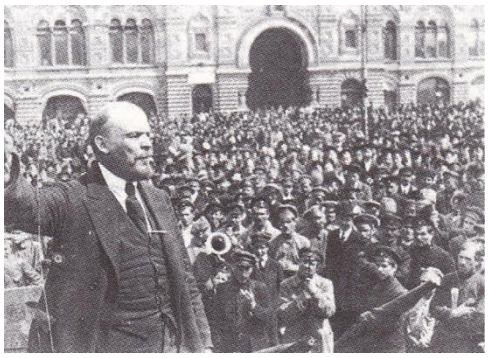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可不要小看十月革命，这场伟大的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了现实，也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一场革命风暴在欧洲掀起。从 1917 年 11 月开始，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波兰等国家的工人，都纷纷效仿俄国，相继发动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斗争，有的还建立起一批地方性的工人苏维埃政权。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也受到十月革命的激励，他们的意识进一步觉醒，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罢工运动也蓬勃展开。仅在 1918 年这一年，美国就发生了 1500 多次罢工事件，日本工人进行了 400 多次罢工斗争。同年，由于米价暴涨，日本还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自发斗争——

“米骚动”，持续时间多达 50 多天。

十月革命引发的革命浪潮，同样席卷了亚洲的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走向高潮。1919 年 3 月 1 日，朝鲜汉城几十万群众，利用参加国王葬礼的机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斗争。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地也先后爆发了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伊拉克等国家，都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在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下，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斗争获得了成功，赶走了外国侵略者，废黜了国王，并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不要小看土耳其革命——这次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敢于斗争、以弱胜强的榜样，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列宁与十月革命

2.必是红旗现环球——十月革命对中国人的启迪

十月革命所点燃的世界性革命浪潮，同样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来，资本主义文明和价值的虚伪，战争的残酷和无情，使那些在黑暗的中国苦苦探索前进道路的先进的中国人，一时失去了目标。

然而，正当先进的中国人苦闷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当时的中国社会，与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景有着很多相

似之处。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在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消息之后渐渐意识到，俄国的劳动大众能战胜帝国主义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呢？这一胜利给长期苦苦抗争，屡屡失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斗争的勇气，给正在苦苦探寻新的救国之路的先进的中国人指明了道路。

1918 年年初的某一天，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声，一辆火车载着满车的客人驶向哈尔滨车站，车站外面站满了翘首期待的人们。自从“一战”结束以来，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会在车站上演。火车上载的不是别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俄国做华工的中国工人。1915 年俄国政府因劳动力严重短缺，决定开放华工人境。几年来，累积有近 50 万华工通过中东铁路抵达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一部分华工响应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提议，组成了一支两千多人的华工队伍。经过短暂培训后，这支队伍被编进了红军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二二五团。这支英勇的“中国团”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得到了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肯定。

此外，还有大批华工在“一战”结束后就选择回到了中国。那些不顾寒风的凛冽站在车站上翘首期盼的正是他们的亲人。

时间过去快四年了，分离的痛苦时时折磨着这些华工在国内的亲人，不仅是距离的遥远，更是他们早就听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传说中那些革命者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他们没有理由不为远方的亲人担心。

火车刚一停下，站台上的人们就围了上去，和亲人们紧紧抱在了一起，无尽的相思化作了两行热泪。回到家里，他们顾不上别的，互诉几年离别

之苦。

“你一去几年，我和你爸真是替你担心啊！都说沙皇俄国革命了，那些革命党人杀人不眨眼，可把我们吓坏了，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这可把你给盼回来了。”一个母亲拉着儿子的手说。

“妈！你想错了！”儿子急忙解释，唯恐母亲担心，“沙皇俄国是革命了，但是革命了比不革命要好多了！我们到莫斯科做工人的时候，那些雇主对我们的态度可差了，吃的也不好，做活的时候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的。革命以后就好多了，因为是工人阶级，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当家做主了！”

“是吗？你是说现在的俄国是工人说了算？”母亲惊讶地问。

“是啊！现在的俄国是咱们穷兄弟，是咱们工人同胞说了算的，是这些人在当家做主。他们非常为我们自己人考虑，改善了工人们的待遇，工人们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因为政府的人说了，‘是工人阶级而不是资本家创造了这个世界’。现在的俄国，人人都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呢！大家走在路上都是昂首挺胸的。”

母亲听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想：“如果我们的国家也能这样该多好啊！”

从俄国陆陆续续回来的 4 万名华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国内的亲人讲述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变化，使广大的老百姓对这个穷人当家做主的国度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走俄国人的路！”这道出了当时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1918 年 2 月的一天，北京街头的报童用异乎寻常兴奋的声音喊着：“大家快来看旧闻啊！天大的好消息啊！”

也许是报童这种奇怪的话语吸引了路人，大家纷纷停下来买一份报纸来看，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旧闻”让报童如此卖力地叫喊。

“怪不得说是旧闻呢？原来是俄国在去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国外攫取的全部特权。这真是正义的政府！真是穷人坐天下的国家！”一个路人看着报纸激动地对自己的同伴说。由于当时的信息传递不便捷，这个俄国十月革命第二天就发布的消息，直到几个月后在中国才流传开来。但是这一“旧闻”还是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什么样的政府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由此对“俄国式的革命”有了更生动的理解。

要知道，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就不断进行积极的探索。洪秀全在金田村燃起了起义的烽火，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十几年之久的太平天国，但是最后依然没有摆脱历代农民起义的命运；清王朝的维护者们，开展洋务运动，他们设立工厂、编练新军，企图忍辱负重，重振大清朝的国威，但是甲午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他们的迷梦，“庚子赔款”的条文击碎了他们的幻想；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们在黄花岗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而洒下了热血，他们最终赶走了清朝的皇帝，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是革命的果实不久便被袁世凯篡夺了，之后在中国甚至上演了复辟帝制的闹剧……一次次的探索都以失败而告终，先进的中国人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惊醒了迷茫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俄国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纷纷开始注意起俄国革命和通过革命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便是其中一位。

李大钊，字守常，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

李大钊 1889 年 10 月 29 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8 岁那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于 1913 年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当时的日本已实行了“明治维新”，各类新思潮也得以在日本传播。李大钊在日本期间，也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据早稻田大学的史料记载，李大钊在日本学习的三年期间，发表数篇思索中国命运的文章，并积极参与包括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在内的爱国运动。1916 年春，国内袁世凯复辟闹剧正盛，护国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李大钊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遂毅然退学，回到了中国。

1916 年夏天，李大钊应章士钊的邀请，担任《晨钟报》的编辑，自此，他也开始融人新文化运动中来。8 月 15 日，李大钊发表了《晨钟报》的发刊词《“晨钟”之使命》，号召人们尤其是青年人“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进前而勿顾后，被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还在《晨钟报》上发表多篇文章，积极介绍培根、托尔斯泰等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倡导民主、科学，批判官僚、军阀、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不思革新。

之后，李大钊还在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日刊担任主笔。李大钊思路敏捷，通晓日文和英文，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文笔功底深厚，尤为擅长

政论性文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写下的这副对联，可以说是对自己一生的生动写照。

1916 年 9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青春》一文，号召广大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不要受陈腐学说的束缚。《青春》表现了李大钊对于改造中国的信心和希望，对于中国光明前途的大胆设想。它是向旧势力的宣战书，也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宣言书，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1918 年 1 月，28 岁的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近五年，后两年兼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由于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和极好的人品，使他在先进知识分子的阵营中享有很高威望。

十月革命爆发时，李大钊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任上，安静的书斋、稳定的工资、老老实实做一个教书先生却并不是这个看似文静的知识分子的最终理想，平静的外表掩盖着他并不平静的内心，他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李大钊着实为此兴奋了一阵，但是作为大学教授的他却想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了，工人阶级在俄国当家做主了，这不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梦想吗？但是是什么力量指引着俄国的工人阶级这样做呢？这种神奇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啊？”

李大钊在不断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神奇的东西赋予了俄国最底层的工人阶级以神奇的力量，使他们最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度。

“俄罗斯的革命必定是20世纪历史上一件伟大的事情，必定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像当年的法国大革命预示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一样，俄国的革命必定预示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这个革命就是世界文明的新曙光！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革命!”李大钊对当年法国的大革命和俄国的革命进行了仔细的比较。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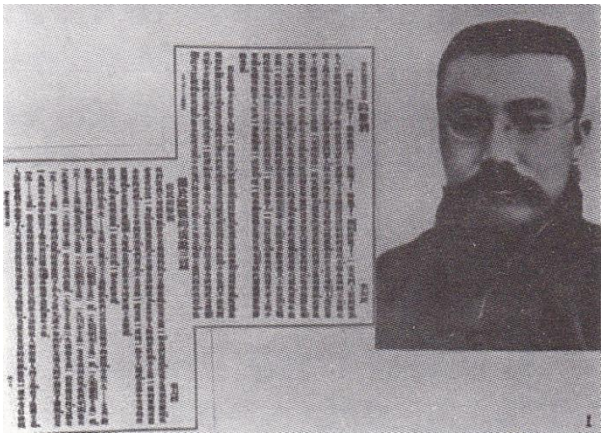
李大钊为自己心中的想法激动不已，他提起笔，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分享给全国的人民，殷切地盼望他们能遵循着马克思指引的道路，遵循着俄国人的道路勇往直前。

于是，李大钊自1918年下半年起，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欢呼十月革命的到来。

在李大钊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投向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自1918年以后，中国的各种报纸杂志上，开始大量出现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学者曾经做过统计，1918～1922年，全国的报刊总共约为280种，而发表过含有社会主义文字的报刊资料就达到220种，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面貌。只不过，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属于反对俄国革命的一方，对当时的俄国革命采取信息管制，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俄国

革命的情况并不充分。中国人真正了解并认同马克思主义，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发生，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它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给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了解放的道路。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十分相似的中国，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启迪，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这一千古未有的大事变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评价的那样：“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暗夜中闪现着黎明前的光亮，中国大地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



◎李大钊及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部分文章

三、五四运动滚动春雷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人先是为“公理战胜强权”感到欣喜。然而不久之后，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又使中国人陷入了痛彻心扉的悲凉，北京大学的学生首先行动了起来，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冲破军警的阻挠，勇敢地走上了街头，带动了整个民族的觉醒。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广大爱国群众积极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的狂潮。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迈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五四运动中，民众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也伴随着新思潮的传播而愈发深入人心，它与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1.漫卷诗书喜欲狂——中国成了战胜国

持续近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战争结果是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德国宣布投降。中国因为在战争后期参加了协约国集团，也成了胜利国家之一。“一战”结束的消息传回中国，举国欢腾。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当时的北京政府从1918年11月28日到30日举行了3日大庆，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典礼，大总统徐世昌率领一干

◎北京政府因“一战”胜利而举行的阅兵式

大员对部队进行了检阅。

老百姓们也为这一胜利而欢欣鼓舞。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北京的各个学校便从 11 月 14 日到 16 日连续放假三天。学生们拥到天安门和东交民巷一带，手里举着标语，口里喊着口号，激进的学生还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大会。三天的欢庆过后，学生们感到意犹未尽，纷纷要求学校将假期延长，学校当局迫于民意，于当月 28 日到 30 日又放假三天。这些欢腾的学生们把自己青春的激情充分展示了出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北大校长蔡元培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负责主持演讲。在现场，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

“今天我想讲一讲我们的劳工是多么的神圣!”

台下的学生静静地听着，“我知道我们的有些学生是看不起劳工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做体力活的，是下等人；而自己是不用做苦力的，是高等人。据我所知有的学生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来北京大学上学是做官当老爷的”。

蔡元培的声音高了起来，显得有些激动，他停了一下接着说：“这些学生甚至懒惰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上学都要带着个小跟班的，早上的早餐都要让自己的跟班送到自己的床前，洗脸水都要让别人替自己打好！甚至上学前还在嬉闹，要自己的跟班喊着：‘老爷，该上课了。’他才懒洋洋地向学堂挪去。”

台下的学生听到这里就喊了起来：“打倒这样的老爷学生！打倒这样的蛀虫学生！劳工神圣!”

“对！劳工是神圣的！不劳而获才是可耻的！同学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吃的、穿的、用的、住的，所有的所有，不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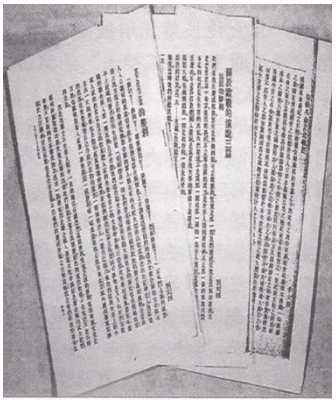
吗？”蔡元培接过学生的话继续讲。

“劳工神圣!”“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上学不是为了做官当老爷!”这些话迅速在同学们中流传开来。蔡元培的这个演讲后来就以《劳工神圣》为名登在了《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上。

李大钊这几天也走出了自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办公室，来到了学生中间。因为他这几天在办公室里听说学生把这次胜利全部归结到北洋政府头上，全部归结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头上，甚至有的学生说什么“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美国万岁!”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向学生说明这个胜利是老百姓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中国其实是没有派出一兵一卒的，只是派出了些华工到欧洲去。北京政府这时耀武扬威，其实是自欺欺人，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向学生们说明这个真相。

他登上了演讲台，深情地望着台子下面的青年学生们，他仿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等文章

“同学们，这几天你们放假了，老百姓也上街了，街上很热闹，大家都在庆祝大战的胜利。可是我们究竟是凭借什么取得战争胜利的呢？我们在庆祝，可是究竟是在为谁庆祝呢？”李大钊上来就是一连串的发问。

台下的学生一下子被问懵了，这个问题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只知道大家在庆祝大战的胜利，至于凭什么战胜了敌人，为谁而庆祝的问题，他们没有深究过。

有的学生在悄悄议论：“我们难道不是凭借长枪大炮来战胜了同盟国、战胜了德意志帝国吗？我们不是在为政府而庆祝吗？”但是大部分同学都在沉默着，台下一下子变得静悄悄的，学生们翘首望着李大钊，等着他的回答。

李大钊接着说：“我要老老实实告诉大家，这次我们之所以战胜，不是靠的武力，不是靠的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我们靠的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靠的是全世界的庶民。因此，我们今天的庆祝，不是在为哪一国或者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在庆祝，而是为了全世界的庶民在庆祝。不是为了打败德意志帝国而庆祝，而是为了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而庆祝。”

台下的学生一下子愣住了，他们迷惑了。李大钊似乎洞察了学生的心思，明白了学生心中的疑惑。

他接着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这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当中，俄国、德国等国的劳动人民，他们看到了帝国主义的野心，他们在本国政府发动大战的时候，发起了革命，阻止了本国资本家政府所发动的战争的继续扩大。这次大战，有两大胜利，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是政治的。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的胜利！政治的结果就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同学们为李大钊的深刻和睿智而欢呼。李大钊的这次演讲后来就以《庶民的胜利》为题，刊登在了《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上。

2.九州飘摇学子怒——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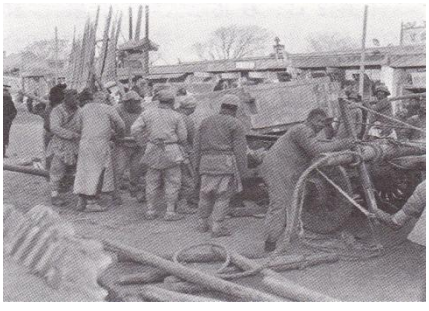
“一战”的胜利，让无数中国人为之一振。饱受屈辱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在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的机会。

中国人的这种心情，从北京东单街头一块叫做克林德碑的牌坊的命运就能体现出来。

克林德碑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清政府有一段时间想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帝国主义列强，于是便发布通告，鼓励捕捉洋人：“果能生擒洋人一名，男则赏银五十两，女则赏银四十两，幼则三十两。”恰巧德国公使克林德坐轿前去上班，经过东单北边，被企图领赏银的满清兵丁枪杀，这一事件给了企图扩大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一个很好的借口。

后来清政府彻底战败，与列强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其中一条就是为克林德被杀赔礼道歉，按照中国的习俗在克林德被杀的东单为其树立牌坊。这个牌坊当时修建得十分高大，主体用汉白玉修建，用蓝色的琉璃瓦做顶，上面还雕刻着飞禽走兽，远远看去威风凛凛。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的德国成了战败国，欢呼的人们趁机把克林德的牌坊搬到了紫禁城边的中央公园内，园内并改名为“公理战胜以彰显洗脱屈辱的自豪心情。



◎“一战”结束后，中国民众移走克林德碑

但是欢呼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不久他们“公理占权”的梦想就被铁一般的事实击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 1919 年 1 月开始，战胜国代表聚集法国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着手安排战后事宜。中国作为战胜国也参加了会议。当时中国社会对这次会议抱着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这次和平会议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

当时北京政府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代表出席了和会。他们提出了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驻扎的军队和，警、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等正义、合理要求。

当时中国留欧的热血青年也卿会给予了密切关注，他们派出代表，结成团队，要士中国代表必须向和会提出废除中日之间签订的《二十一条》及其换文。北京政府的代表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又增加了这项提案。但是当提案被提交到和会时，竟遭到了否决。和会的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在给中国代表团的答复中，竟列举出了极其荒谬的理由，表示“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

剩下的唯一布望就是山东问题了。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指出，应把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和利益直接归还中国。这时日本却横插一杠，提出无理要求，认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权，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更加荒谬的是，美、英、法三国在 4 月 29 日至 30 日，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竟然完全接受了日本的提议。更令人气愤的是，北京政府的代表们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竟然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中国人民密切关注着和会的进程，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

到中国国内时，激愤的人民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悲愤，纷纷行动了起来。

5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里，蔡元培用悲愤的声调告诉自己的学生许德珩：“我们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了！”

“校长，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一段流传的消息是真的吗？”

蔡元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转过身去，长久望着窗外。

许德珩冲出了办公室，一口气跑到了北京大学的西斋饭厅，他一下子跳上了桌子，大家纷纷回头看着这个奇怪的学生。但是谁也没有说话，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学生的眼睛在冒火，胸膛也因为激动的原因而一起一伏。

“同学们！同胞们！晴天霹雳啊！我刚从蔡校长那里证实了这一段社会上流传的消息，我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正义要求均遭到了否决，中国的外交失败了！山东就要沦为日本的山东了！”

许德珩的话一下在学生中间炸开了锅，愤怒的学生们再也无心吃饭了，决定就地召开一个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办法。同学们商讨的结果是决定于 5 月 3 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代表大会，并约集北京其他 13 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

夜幕降临，北京的春天本来就显得有些燥热，此时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人头攒动，群情激愤。北京大学的全体学生都来了，其他十几个兄弟院校的学生也派来了学生代表。

此时一个年轻人走上了主席台，向大家挥了挥手，大声对大家说：“承蒙各位同学的厚爱，推举我为今晚会议的临时主席。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次集会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有的同学对当局的卑劣行径还不是很清楚，我们今晚十分有幸请到了我们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也是著名的报人和

记者邵飘萍先生，下面请邵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目前的形势。”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邵飘萍以他那特有的激情和语言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帝国主义在和会上背着中国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目前的紧急形势。台下的学生再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悲愤。邵飘萍的话音刚落，一个学生就跳上讲台，向大家喊道：“同学们，这世间还有什么公理可言啊！根本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是我们决不能像麻木的牛羊一样甘愿被宰割！我们要奋起抗争，否则我们就要眼睁睁看着山东的父老乡亲沦为奴隶了！还我山东！还我青岛!”

他呼喊着口号，台下的学生也跟着他高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

“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大好河山！我甘愿洒热血！达样的人才叫中国人!”

谢绍敏说着，咬破自己的中指，撕下自己洁白的长衫，大书“还我青岛”四字。

台下的学生一时惊呆了，接着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同学们有的哭喊着，有的振臂高呼着。会场一时既显得悲凉，又显得壮烈。

与会学生们决定，在第二天发动游行，表达自己的诉求。为保证游行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同学们在主席的号召下，进行了当场募捐。有钱的同学捐出了银圆、钞票，没钱的同学把自己好一点的衣服、帽子都捐了，甚至有的女同学把自己心上人送自己的戒指、首饰也捐了出来。会场的气氛达到了沸点。当会场的人群散去时已经是深夜 11 点钟。

集会结束后，北京大学的同学又为制作标语忙碌到了半夜，他们甚至

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拿了出来，在上面写上“收回山东主权”、“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句子。

这些学生当时不会想到，他们第二天举行的游行，改变了 20 世纪的中国，让中国的革命事业踏上了一个全新的征程。

3.学工联动开天地——改变中国的五四运动

1919 年 5 月 4 日下午 1 时多，北京十几个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从四面八方会集到天安门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拉开了大幕。

此时的天安门前旌旗招展，齐集在天安门前的学生们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等等。有的标语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有的旗子上画着漫画，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边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卖国求荣，早知曹瞞遗种碑无字；下联是：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5 月 3 日晚上，在北京大学集会时，血书的“还我青岛”的条幅也悬挂在这里，很是激动人心。

4 日上午，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各高校学生，无视北洋政府的劝阻，纷纷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在这里，学生们组织了一个短暂的集会。台子上临时的大会主席向大家宣布：“我们先向公使馆进发，再去总统府请愿，要总统坚决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大家觉得如何？”

台下传来阵阵的欢呼和响应，学生队伍即刻浩浩荡荡向使馆区进发了。

他们冲破了警察的阻挠，直奔东交民巷而去。东交民巷原名叫东江米巷，是一条竟敞的巷子，街道两边矗立着各式各样的外国房子，有房顶高耸人云的德国哥特式建筑，有精致矮小的日式建筑，还有富丽堂皇的法国式建筑。东交民巷可谓当时的“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各国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在使馆四周筑起了高墙，在墙上设立了巡逻岗和炮台，墙内驻扎了各国的兵营。不但普通的老百姓不能进入墙内一步，就是当时的政府官员和军警轻易也不能进入使馆区内。

当学生队伍游行到东交民巷西口时，即被铁栅栏阻住了去路。原来警察听闻学生游行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害怕，早早地做好了准备。

这时使馆区的巡捕早已闻讯赶来，一个貌似总捕头模样的人假惺惺地站出来说：“你们要进入使馆区游行不是不可以，但是这得征得大总统的允许！”

年轻的学生们还是缺乏斗争的经验，看他这样说就督促他和大总统联系。这个家伙就一头扎进使馆区内，再也没有出来，只是不断地派人出来传口信。一会儿说什么电话暂时无法接通；一会儿说大总统的随从说大总统这会儿在开会，没法接电话；一会儿说什么大总统在会见重要客人，暂时没时间处理这件事情……总之就是始终没有和大总统谈这件事情。5月的北京，天气渐趋炎热，而天真的学生们，在炎炎烈日下整整等了两个小时，才明白自己上当了。

有个学生喊了起来：“同学们！同胞们！我们的国家尚未灭亡！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却不能自由穿行，这是何等的耻辱啊！我们在烈日之下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巡捕房一个电话还没有接通，大家还不明白是怎么

回事吗？这明显就是警察局和巡捕房串通好的！”

诚实的学生们这时才恍然大悟，大家纷纷喊了起来：“大家到外交部去，大家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去！”在呐喊声中，学生队伍迅速向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宅邸进发。学生们沿途又散发了很多传单，许多市民也受到了感染，纷纷表示对学生的支持，许多外国人也纷纷表示支持，甚至有些巡警也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此时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在于什么呢？原来，当日中午徐世昌大总统在自己的府邸宴请了这三个人。当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已经派人告诉徐世昌学生游行的情况，徐世昌轻描淡写地说：“这等小事，不必大惊小怪，让吴总监派人妥速解散游行队伍。”这三人看大总统这样说，也就没有把游行的学生太当回事，照样喝酒聚会。

下午 3 点多钟，曹汝霖和章宗祥才结伴回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府邸，吴炳湘这时又派了两百多军警前来保护曹宅。曹汝霖和章宗祥更觉得没有必要担心，于是便倒头大睡。当他们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忽听院子外面喊声大作，一时慌了手脚。

此时大门之外，学生和护宅的警察正处于对峙状态。学生们一面向警察宣传爱国的道理，一面使劲拍打着曹宅的大门，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

这时大门却忽然打开了。原来是几个机灵的学生趁学生大部队在门口和警察对峙的空隙，从别的地方翻墙进了曹宅，曹宅内的护院士兵看英勇的学生好像从天而降的神兵，一时也傻了眼，这几个学生趁机打开了大门，曹宅外面聚集的大批愤怒的学生，霎时像潮水一样涌人了曹宅。

此时的曹汝霖吓得像只老鼠一样赶快躲进了一间暗室，这间暗室一面可以直通他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一面可以直通他夫人的卧室。曹汝霖就躲在这个狭小如箱子般的暗室里浑身止不住打战。

学生们在房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曹汝霖，就把房里的玻璃砸了，把花瓶摔了以泄愤。

学生们随即转到他两个女儿的卧室，看房间里没人，就转到曹汝霖夫人的房间去，可他夫人却把房门反锁了。愤怒的学生踹开了房门，质问她："曹汝霖到哪里去了？"

这个妇人假惺惺地说："他中午被总统邀去吃饭，现在还没有回来。"

曹汝霖在暗室里吓得浑身筛糠一般，因为学生们如果再前进一步，就有可能把他给揪出来。但是学生们毕竟还是缺乏斗争的经验，听信了她的话没有继续搜查下去。过了很久，曹汝霖听屋子里没有了学生的声音，才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与曹汝霖相比，章宗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先是躲了起来，可是后来看学生冲了进来，始终惊魂不定，就想找机会跑出去。他刚一出来，就被一个学生发现了。这个愤怒的学生顺手拿起旗杆，朝着他头上来了一下，章宗祥又惊又痛，倒在地上装死。这个学生身处曹宅，以为打死的就是曹汝霖，就向大家喊："快过来看啊！卖国贼曹汝霖被我打死了！"

据当时亲历五四运动的学生回忆，他们中一些胆怯的同学，以为闯了大祸，跑回了学校，周围一些胆子大的学生纷纷跑了过来，却不见了倒地者的踪影，大家才明白刚刚那个人是在装死。

此时的章宗祥，趁乱跑到了外面的一间皮蛋店，躲在了皮蛋店一间小

黑屋的床上。不过，有几个同学很快便发现了章宗祥的踪迹，他们拉着这家伙的双脚，像拖死猪一样把他从屋子里拖了出来。

“说，你到底是谁？”

章宗祥本来以为学生已经认出他是谁了，正准备开口求饶，此刻学生的问话才让他知道学生们并没有识破自己的身份。

章宗祥心里想：“我就装聋作哑到底吧！要是让这帮兔崽子知道我就是当年的驻日公使还不把我打死？”

因此学生们一再问他，他就是闭口不说话。愤怒的学生不住地用旗杆之类的东西往他身上招呼，还有好多女学生拿皮蛋往他头上打去，直打得他满口、满耳、满眼、满鼻的皮蛋，狼狈万状。

学生们怕闹出了人命，当时还有一个日本人拼命护卫他，再加上他一句话也不说，学生们还以为他是日本人就放过了他。从第二天的报纸才知道被痛打的就是章宗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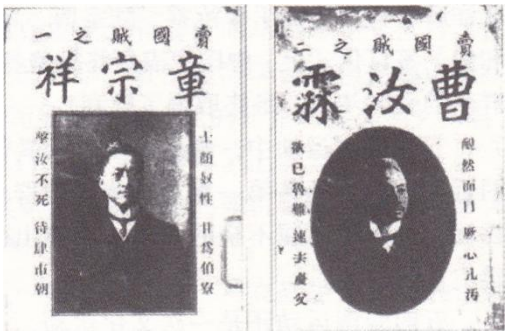
寻曹汝霖不见，此时气愤的学生实在咽不下心中的这口气。一个学生站出来说：“我们的爱国集会无端受阻，被巡捕骗得在烈日下站了整整两个多小时，现在又不见这帮卖国贼的踪影，不如我们就烧了他的老巢！”

学生们群起响应，冲到汽车房里。当年的中国老百姓平日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曹汝霖家里竟然有专门的汽车和车库，这本身就让学生们觉得气愤万分。他们找了桶汽油，跑到了屋里，把汽油浇在了地毯和方桌上。一根小小的火柴扔下去，霎时浓烟滚滚！

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学生们一张张充满青春气息的脸。“燃烧吧！这万恶的旧世界！这燃烧的火焰毁灭的只会是一个旧世界，必将烧出一个新世界！”

大火烧了半个小时左右，警察总监吴炳湘才带大批军警赶到了现场，此时已经是下午 6 点左右，学生们因为十分疲惫，游行的队伍已经渐渐散去。这个吴总监只好抓那些正在徒步回校的学生泄愤，北京大学有 20 人、高等师范有 8 人、工业学校 2 人、中国大学 1 人、汇文大学 1 人，共 32 人被抓。

第二天，北京各大中等专科学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5 月 6 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北京政府虽然迫于舆论的压力，在两天后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并且逼走了同情学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甚至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学生们听到消息后更加愤怒了。5 月 19 日，学生们再次宣布总罢课。



◎五四运动时同学们散发的传单

6 月 1 日这天，北京政府接连下了两道荒谬的命令：一道命令“表彰”被全国人民唾弃的卖国贼章宗祥、陆宗舆和曹汝霖，一道是取缔学生的爱国运动。爱国有罪，卖国有功，两道命令对照之下，使学生们更感荒谬、气愤。从 6 月 3 日这天开始，大批学生重新走上了街头，当时的北京政府竟然丧心病狂地出动军警，逮捕了 700 多名学生。学生们顽强不屈，第三天上街演讲的人数达到了 5000 多人。

此时全国人民在学生爱国热情的感染下，也逐渐觉醒了起来。上海的工人从 6 月 5 日自动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日资棉纱厂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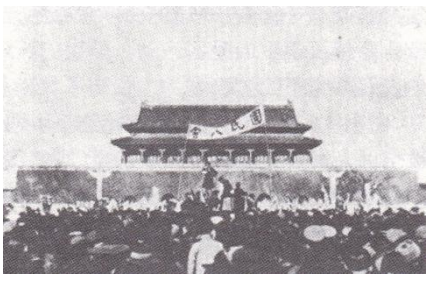
人带头，上海诸多行业的工人纷纷参加罢工运动；上海的商人也纷纷罢市。随着北京政府对学生抗议的镇压和上海游行示威的高涨，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工商业界的行动推动了全国的罢工和罢市风潮；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全国各地的学生更不必多说，纷纷罢课响应北京、上海同学们的罢课运动。

自此，五四爱国运动从北京这个小范围内、学生参加的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工人、商人、学生广泛参加的运动。突破了原来狭小的范围和阶层后，五四运动的星星之火已经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正在熊熊烈火中燃烧，一个民族正在觉醒。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给北洋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出于形势考虑，北洋政府宣布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6 月 28 日，《凡尔赛和约》签订仪式上，中国代表最终拒绝签字。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沸腾——群众的爱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广泛地参与了进来，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爱国群众为了实现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目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精神。

五四爱国运动还是一次文化运动，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在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哺育了一代杰出的人才。



◎学生会集于天安门前

五四运动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正是无产阶级这个新的阶级力量的加入，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4. 日出江花红胜火——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

巴黎和会打破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再加上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一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如“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这些思潮虽然复杂，但其中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马克思主义。

如前文所叙，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其革命性和先进性吸引了大批的先进分子，这一先进的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身在北京的李大钊兴奋不已。他为中国人的觉醒而高兴，却也意识到，近来如此多的新思潮一下子涌进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何况这些新思潮中，还夹杂了很多良莠不齐的内容，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用正确的、可行的思想、主义去引导这些激进的青年们。

李大钊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开始闭门谢客，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仔细的比较，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把文章写好后，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名，

分两期连续刊登在 1919 年 10 月和 11 月的《新青年》上。

广大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此如获至宝，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李大钊的文章，并且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和讨论。

像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要经过一些波折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胡适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实用主义的坚定信奉者。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宣传白话文也是宣传我的实用主义的。”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胡适感到十分的不安。“看来现在不能不谈政治了，这实在让人看不过去，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是实用主义的信徒，我要谈谈我自己的政治理想，要他们知道只谈主义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北京的夏天酷热难耐，以胡适的身份，他本可以到颐和园避暑，但此时他的心情，却比北京的夏天还燥热。他闭门谢客，把自己关进房内，反复思索着自己该如何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在做学问的时候，一切主义都应该摆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现在的人只不过是把这些一知半解的主义做口头禅罢了！最近安福系的政客王揖唐不是发表了一篇文章，宣传主张民生主义，其实还不是骗人的把戏？那些高谈主义的人，虽然并不都是王揖唐之类的骗子，但是也至少是畏难求易、比较懒惰的人。因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想到这里，停了下来，喝了口茶。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当然是多研究些实际的问题！整天高谈这个主义如何新奇，那个主义如何奥妙，这些统统是没有用处的！高谈主义能

解决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吗？高谈主义能解决妇女卖淫的问题吗？高谈主义能解决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吗？高谈主义能解决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吗？不能，一个也不能解决，高谈主义无助于这些火烧眉毛的问题的解决。不研究这些具体的问题，而去空谈主义，这是中国人思想贫乏，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写了下来，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发表在 1919 年 7 月《每周评论》第 31 号上。

当时的李大钊正在河北昌黎消暑，他读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当然不认同胡适的观点。

“这个留洋的博士怎么把‘问题’和‘主义’对立起来了呢？要知道‘问题’和‘主义’是不可分离的啊！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乡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首先要使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问题啊！要想使一个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问题，那就必须使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的趋向的理想和主义，这怎么能说解决问题就不需要主义呢？”

每週評論
The Weekly Review
31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李大钊想到这里，望了望远方，稍许放松后又继续对文章进行研读。“要搞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些问题，但是当然也要宣传些主义，这是并

行不悖的，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

“说什么‘主义’危险？”

李大钊看着胡适文章中的词句，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恐怕是这个留洋的博士自己太绝对化了吧！大凡一个主义都有实用和理想的两面。就像民主主义的理想，基本的理论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就不一样了，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也是这样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要把自己的主义付诸实践，就必须要研究社会的具体环境，这个留洋博士所谓的主义很危险，只怕不是主义本身带来的，而是空谈主义的人带给它的吧！”

继续往下看去，李大钊觉得胡适的观点更加不值得一驳了。

“就是日常生活中，一旦一个东西流行了起来，势必有一些投机分子、骗子进行伪装，鱼目混珠，混淆视听，何况是一个新近流行起来的主义呢？就像日常生活中王麻子的剪刀得到了群众的赞扬，就有旺麻子等来冒充他的招牌；王大正的茶叶最近卖得很好，大家很照顾他的生意，就有汪大正来冒充他的招牌。就像今天社会主义在社会上很流行，就有安福系的社会主义出现，这就是典型的冒牌货。”

“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宣传我们自己的主义了，那岂不因噎废食？”李大钊自言自语地说。

“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也来卖剪刀，就把自己的剪刀铺子关掉吧！王大正不能因为汪大正来冒充自己的牌子，就不卖茶叶了吧！就像一个农民开了一块荒地，有些杂草和毒草夹杂在庄稼之间长了出来。这开荒的农

民总不能为了除掉杂草就把庄稼也一起锄掉吧！我们不能因为安福系的人也来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就停止我们的宣传吧！相反正是有了这种冒牌货，我们反而应该加紧宣传自己的主义，免得那些阿狗、阿猫、留声机和鹦鹉来骗大家。”

李大钊感觉自己思考得比较成熟了，就一挥而就，写下了《再论问题和主义》一文，寄给了《每周评论》。

胡适毕竟还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看到李大钊针对自己的批判，并没有生气，而是把这篇文章登载在 1919 年 8 月 17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 35 号上。

胡适当然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甘拜下风，他在当年 8 月 24 日和 8 月 31 日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一再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是许多道理是不辩自明的，李大钊的文章已经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明白和透彻，胡适说得再多也只是自说自话而已。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产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纷纷著文，对这些实质上是在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的人进行了批判，后者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纷纷败下阵去。另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当时在中国影响很大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批驳，结果，除少数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都抛弃了这种错误的思想，转变了立场，成了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马克思主义因为自身的先进性、科学性、革命性，在时代的大潮中以其自身的魅力战胜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

论战中，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拿起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一步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在斗争中，这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主义”和信仰．同时也坚定了自己人生的目标，积极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当中去。这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和把无产阶级政党建成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自此在神州大地焕发出其从未有过的光彩，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章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一、上海的早期党组织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历来在各类新思潮中涤荡。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发轫，五四运动在上海纵深发展，工人运动也不断推进。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为主要阵地进行战斗，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迅速传播。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第一任总书记。党的创始人在上海除陈独秀外，还有李汉俊和李达等。李汉俊早年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点拨，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被马林称为“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李达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和人民出版社的主编，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鲁迅”。在他们的努力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1．风雨欲来上海滩——上海的革命形势

上海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1853 年起，外商陆续在上海开设船厂、丝厂、纱厂、烟厂和电灯、自来水等企业，我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由此产生。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

1862 年以后，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了制炮局、江南制造总局、机器织布局和轮船招商局。随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首先在上海兴办，上海成为我国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十里洋场”的繁华热闹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谋生。这也让上海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不过，上海工人当时的生活并不轻松。“从早到晚苦一天，所得不过两角钱。买得柴来难买米，可怜怎样度常年。”这首在上海广为流传的《劳动歌》生动再现了辛亥革命后上海工人的悲苦生活状况。在中外企业中，工人遭受打骂以致被开除是常见的事。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一般都在 12 小时以上，有的长达 16 小时，工厂实行抄身制、包工制等，肆意侵犯工人的人身权利。工人劳动和生活的状况非常悲惨，他们所受的压迫与剥削，在各国工人中是罕见的。

那么，谁才是上海当时真正的主宰呢？

在当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大权都握在西方人手里。但在社会底层，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上海的黑帮势力之大，是不难想象又是不可想象的上海没有任何团体比黑帮的组织大，黑帮老大的命令比政府部门的政策更具有效力。

◎上海商界罢市

用陈独秀的话说，当时的上海有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在外国资本势力下讨生活的奸商；有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彩票的欺诈取财者；有淫业妇人；有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有流氓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会；有做冒牌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有

控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的封建帮会势力，但是劳动者却大多是贫苦卖力毫无知识的，还有一部分有志的青年学生。

陈独秀曾在文章直呼上海为“龌龊社会”，并禁不住悲呼：“上海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他做舆论和文化的中心，那么中国的舆论和文化可真糟透了。”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腐朽与进步同在、黑暗与希望并存的城市。一方面，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在这里横行，整个社会纸醉金迷，龌龊不堪。另一方面，也有希望的力量，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具有爱国正义感，要求争民主、争生存、争主权，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面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们并没有忍气吞声、甘受压榨，中外企业的工人先后进行过无数次自发的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千人。在这一时期，上海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1918 年 4 月至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上海纱厂工人多次举行罢工，每次罢工人数平均在三四千人以上。五四运动中，6 月 5 日，上海纱厂 5000 多男女工人首先罢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罢工迅速波及各行各业的工人。数日间，全市六七万人投入政治大罢工，形成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的洪流，工人阶级开始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到 1920 年，中国产业工人发展到 200 万人左右，其中上海不下 50 万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

上海作为当时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全中国范围内也是最容易接受新思潮的地方之一，因此，当袁世凯在北京掀起尊孔复古的

逆流时，身处上海的诸多知识分子对此十分愤慨。他们意识到，必须要掀起一次思想革命的风暴，涤荡旧思想与文化的污垢，而后才能真正救中国。上海也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并在后来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5 年 9 月 15 日，刚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并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即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他在文中阐释了办刊的宗旨，即弘扬“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大主张，并大胆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在中国擎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青年杂志》开始创办时比较艰难，刚开始发行时，也不过 1000 册左右。但是陈独秀对《青年杂志》的前途很有信心，已经预见到这本杂志所蕴含理念的重要意义和远大前景。

在《青年杂志》的感召下，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集结在这场运动的舞台上，共同宣传新文化。

正如陈独秀所料，《青年杂志》影响迅速扩大开来。1916 年 9 月 20 日，康有为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纳入宪法”。这种主张显然与《新青年》所主张的革新思想格格不入。陈独秀针锋相对，于 10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 2 卷第 2 号上，提出了学习西洋文明的主张，认为“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从而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文学革命风潮。此后，《新青年》的影响继续扩大，在国内的发行处达到 74 处，国外甚至发行到了新加坡。

1917 年，陈独秀赴京就职，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从上海搬到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虽然北上，但此时上海的思想界，已经在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下，充分接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涤荡。

陈独秀始终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活跃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最前沿。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和报道运动的情况，并撰写评论文章，指导爱国运动向深入发展。

五四运动期间，北洋政府为控制局面，一度大批逮捕爱国学生，这种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新的斗争。从 6 月 5 日起，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等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给北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6 月 5 日当天，上海要举行全体罢市的消息在大街小巷流传，临近中午的时候，曹家渡日本人开的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全体罢工。不到两小时，陆家湾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男女工人也相继罢工，总计有两万多人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声援远在北京的学生爱国浪潮。上海工人的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6 月 11 日，上海学联发出了继续斗争的传单，指出：“我们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中华国民的呼声已经举世所共闻了。卖国贼三人已被罢免。我们可以恢复原有的行业了。……然而斗争仅仅是开始。山东还未收回；亚洲尚有黩武主义要请我们去推翻……中华爱国儿女必须准备对付更剧烈的斗争，方能使中国成为民治的国家。”

上海工人的斗争，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同时也将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

并且迅速扩展到全国 150 多个城市，成为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1919 年 6 月，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遭到逮捕，在监狱中关押了 98 天才被释放。这期间，陈独秀受李大钊的影响，思想慢慢发生转变，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20 年年初，陈独秀由北京回到上海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沪。《新青年》月刊是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的陈独秀，同在商务印书馆、《民国日报》社、《星期评论》社工作的沈雁冰、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密切联系，共同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潮。这三份刊物，成为上海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介，集结了一大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1919 年 6 月 8 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另一重要刊物《星期评论》诞生了，它一出场就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将宣传重点放在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方面，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8 月中旬以后，它开始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等创刊者的共同努力下，《星期评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重要传播平台，并在其周围逐渐团结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比如俞秀松在《星期评论》工作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很快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久之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俞秀松担任了第一任书记。可见《星期评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影响力。

同样是 1919 年 6 月，在《星期评论》创刊后不久，上海《民国日报》

在第 8 版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副刊《觉悟》，主编是邵力子。《觉悟》发行的第三天，就赫然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6 月 18 日，李达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第二天，李达接着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深入剖析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并比较了社会主义与著名的法兰西革命之间的不同。邵力子在 1920 年 1 月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评论，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个大政党”。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李汉俊在 1919 年 10 月撰写评论工潮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得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1920 年 4 月 1 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同年 5 月，陈独秀编辑出版《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以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材料，译载苏俄劳动法典，宣传劳动运动。沈玄庐与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也编辑了“劳动纪念号”，配合《新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如此一来，上海在阶级基础、思想意识等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在这里的诞生，已经指日可待了。

2.黄浦江畔汇群英——上海早期党组织的缔造者

要了解上海的早期共产主义活动，不得不谈到上海的早期党员。以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为代表的早期党员，为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如前文所述，陈独秀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一度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被社会各方营救出狱之后，陈独秀便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来到上海。回到上海之后，陈独秀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研究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从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热烈拥护者。

1920年初春，陈独秀受李汉俊的邀请到武汉大学讲学。在武汉，陈独秀梳理了自己出狱后的一些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悟，做了题为“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的演讲。在演讲中，陈独秀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三种方法：一是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是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是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可见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

陈独秀的演讲受到了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武汉当局却十分惊恐，下令陈独秀停止讲演，陈独秀愤然回京。而此时，北京政府和警察署正布下天罗地网，等陈独秀一抵京就立即逮捕。于是，李大钊帮助陈独秀化装逃离北京，经天津乘船前往上海。两人趁夜雇了一辆骡车赶往天津。在空旷的雪地里，两人情绪渐好，彻夜长谈，商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

党之事，拉开了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帷幕。

1920 年 2 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2 号的寓所里。据许德珩回忆：“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杂志，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投入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正是这时节，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经过北京来到上海，并联系到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先是于 1920 年 5 月份办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经过酝酿，于同年 8 月建立起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

上海党组织成立以后，陈独秀等人又物色各地积极分子，帮助和指导了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这样一来，党组织在多个城市都有了据点，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把各地分散的党组织统一起来已经成为革命的迫切需要。在上海党组织的统筹下，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召开，各地代表齐聚上海，共商大事。但是，创办党组织功勋卓著的陈独秀，在当时却忙于其他事项未能出席会议。

尽管如此，由于其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积累的名望以及在建党过程中卓越的贡献，陈独秀仍被推选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领导着中国共产党投入新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毕竟势单力薄，经验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是刚成立不久尚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已经初具规模颇有威望但组织涣散的国民党，都

无法以一己之力对抗势力强大的北洋军阀。两党联合起来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陈独秀作为当时共产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在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革命理念的差异，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面对着“左”派和右派的冲突。与此同时，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思想发生变化，渐渐右倾，以致逐渐丧失了对革命力量的领导权，国民党右派逐步篡夺了大革命的领导权。

1926 年，蒋介石接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国共关系趋于紧张。陈独秀却长期误判形势，到了 1927 年 4 月初，还与当时尚以国民党“左”派出现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冀图借此“消除国共间的误会”，导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很多同志因警惕性不足而被捕、遇害，致使党蒙受了巨大损失。

◎陈独秀

中共六大上，党中央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也没有当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陈独秀没有再被分配工作，只是保留了党籍，后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之后，他又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抗战爆发后被释放，来到四川江津，直至去世。

尽管陈独秀后期犯了错误，但他的历史贡献不可忽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给予陈独秀相当高的评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他仍然算是居功至伟，彪炳史册。

除陈独秀外，李汉俊、李达也都为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号汉俊。他出生在湖北潜江一个教书先生家里，从小受诗书熏陶。

12 岁那年，李汉俊受朋友资助，东渡日本求学，几年后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按父意，其兄李书城学习军事，李汉俊学习工商业，各自成为专门人才以供国家富国强兵之用。但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李汉俊逐渐意识到，工商业是不能富国强兵的，打破重重包围着的黑暗环境才是首要之举。

在帝国大学读书时，李汉俊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并期望以之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李汉俊是较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曾挹马克思主义形象地比为“选择方向时候的指南针”，认为只要有了这个指南针，就可以随时施设，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盲撞了。

1918 年年底，李汉俊学成回国。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他结合马尔西写的《经济漫谈》，将马克思深奥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化抽象为具体，翻译成《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此外，他还协助陈望道、李达等人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文献。在阅读和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他有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和感悟。据不完全统计，在 1919 年至 1921 年的这段时间里，他在《星期评论》、《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上发表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90 多篇。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是出类拔萃的。

李汉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对当时许多有志有为的青年人影响很深。1919 年李汉俊与董必武结识，两人是湖北老乡，十分谈得来。他曾向董必武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将日本的新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介绍给武汉的革命青年。后来，李汉俊还负责帮助董必武等人，在武汉等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并担任联络工作。

据杨之华回忆，早在 1919 年，李汉俊就已经与日本、朝鲜方面的共产党有了联系。1920 年年初，李汉俊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经过与来到上海的维经斯基等人多次接触交谈，他和陈独秀、李达等人认识到了俄国道路的重要借鉴意义。同年 5 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他和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负总责，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8 月，他和陈独秀等人，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组织发起之后，李汉俊就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早尝试。

1920 年 12 月，陈炯明要求陈独秀到广州去办教育，陈独秀起身前，上海的工作就交给了李汉俊等人。李汉俊代理书记一职，负责全面领导工作，还和陈望道接受了《新青年》的主编工作。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而会议的地点——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就是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李汉俊本人也作为上海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大会。7 月 25 日、26 日休会，由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李汉

俊和董必武还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

◎李汉俊

1921 年 7 月 30 日晚，代表们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就受到暗探和法国巡捕的突然搜查。代表们迅速撤离会场后，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从容对付敌人盘问，化险为夷，用智慧和胆识保卫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安全，为会议的圆满结束做出了突出贡献。

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在“集权制”等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于 1922 年离开了中共中央，参加武汉地区的党团工作。1927 年 4 月，四一二政变后，李汉俊旗帜鲜明地主张讨伐蒋介石，以合法身份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掩护、营救了数百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遗憾的是，李汉俊本人最后却没能逃出敌人的魔爪。当年 12 月 17 日，他在其住所中，被武汉卫戍司令、反动军阀胡宗铎以“湖北共产党首领”的罪名逮捕杀害。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在党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后虽脱党，但仍积极投入国民革命。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如此评论：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再来了解上海党组织中的另一位早期党员——李达。

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曾用笔名江春、李特，出生在湖南零陵县（今永州）一个农民家庭。李达天资聪颖，19 岁那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习。他起初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后来又受孙中山的影

响，转变为“实业救国”的信奉者。

1913 年，李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南公费留日学生的资格，在日本学习理工科。他十分刻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学会了日语、英语和德语。

李达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与李汉俊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曾经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却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直到十月革命轰然而行，让他有了新的方向。

1918 年 5 月，李达与李汉俊等人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影响遍及京津沪等地，但最终斗争的失败给了他们巨大的打击。他们发现，其一直信奉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想法行不通。“只有由人民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

6 月，回到东京的李达开始一门心思地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的著作。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通晓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他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1919 年 6 月，陈独秀被捕入狱，李达立刻写下了《陈独秀和新思想》，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关注。接下来他又向国内刊物《觉悟》副刊投稿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热情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20 年夏天，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作为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李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列宁建党学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创刊，李达担任主编。《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旗帜，吼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时社会条件十分险恶，刊物随时面临着被查抄的危险，李达在这种条件下，为办好这个刊物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12 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李汉俊暂时代理书记职务。不久之后，李汉俊和陈独秀二人却因党组织是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时产生分歧。一边是党的主要发起人，一边是昔日好友，李达出于大局考虑，全力周旋于两者之间，竭力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后来，李汉俊怒气难消，愤然辞去代理书记一职，把党的名册和文件统统交给李达，要李达做代理书记。李达从这时起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一直主持党的发起组工作，全面主持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与李达、李汉俊晤谈，李达报告了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情况。经讨论认为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达又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担负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具体部署召开大会的各项事务。

◎李达

7 月，李达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并被选为宣传主任。在大会期间，他除参加起草文件外，还负责处理大会事务、一大会址的选定和转移以及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

李达担任中央的宣传主任后，主持党的宣传工作。1921 年 9 月，中央局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李达担任主编，其寓所就是社址，同时也是中央宣传部的办事处。短短一年内，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成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

后来，李达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他不满后者的“蛮横家长作风”，萌发了脱党的决心。1923 年秋天，李达正式脱离了党组织，这也是他一生之中政治上最大的失误。但此后，李达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成果斐然。

1949 年 12 月，党中央根据李达的申请和他几十年的表现，由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做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介绍人，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主要从事党的教育工作。1949 年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1950—1952 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1966 年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一边推进大学建设和教育工作，一边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李达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

3.万里奔波党初成——维经斯基帮助建党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在开展了工人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是在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的筹划下，经过上海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而成立的。

五四运动震惊了世界，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非常关注五四后中国的革命形势。中俄交通打开后，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出代表维经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等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联系到了陈独秀。

维经斯基(1893-1953)，亦译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名查尔欣，中国名字吴廷康，笔名魏琴。生于俄国一个林业职员家庭，当过印刷工。1913 年去美国谋生，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 年回到苏俄，加入俄共（布）。国内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捕流放。1920 年 1 月起，这个 27 岁的年轻人开始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同年 3 月，俄共（布）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俄共（布）远东局，负责领导远东地区各国革命者的工作。

在维经斯基来中国前，远东局曾经接到过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数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其来中国考察。维经斯基一行来中国有着十分明确的任务：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研究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同领导五四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各界人士接触：宣传俄国革命和俄共经验；条件成熟的话，研讨中国建党问题等。

维经斯基等人先是于1920年4月抵达北京，受到了李大钊的热情接见：后又经其引荐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在上海，陈独秀会见了维经斯基一行。

翻译杨明斋将一封李大钊的亲笔信交给了陈独秀，信中介绍说，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的目的是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了解到维经斯基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陈独秀欣赏不已："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合适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于是，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便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戴季陶、张东荪等人。

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的名字，也自此被共产国际所熟知。

1920年4月4日，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及将帝俄政府以掠夺手段向中国取得的各项权利一律无偿地交还给中国。这让备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中国人万分惊喜：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竟然变成了这样的国家？4月11号，《星期评论》在第45号上立即做出回应，对于苏俄的举动大发溢美之词，认为这是"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中国人对苏俄的情感距离，一时间变得更近了。

在这种背景下，1920 年 5 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经常联系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由浙江来上海的陈望道与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以及在《星期评论》的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仲九等人，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

随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的开展，大家倾向于建立一个更严密的以建党为宗旨的筹备性质的组织。

7 月中旬，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人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人会议”，准备组织各革命团体，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李达于 1920 年 8 月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他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 8 个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8 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据此，1920 年 8 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于法租界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

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等人。

1920 年 12 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写信给张申府，并要他告诉李大钊。张申府和李大钊一起研究过后，李大钊的意思是叫共产党。陈独秀同意了李大钊的意见，就用“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不再使用“社会党”的提法了。

上海党组织于 1920 年 11 月创办《共产党》月刊和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了“共产党”的名称，陈独秀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中，也指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政治改造的希望”，并直言道：“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使人相信啊！”

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维经斯基多次参加会议，与上海党组织一起讨论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为了帮助我国劳动者了解俄式革命，启发他们奋起革命，他还曾用吴廷康署名，为《劳动界》周刊撰文《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刊登在《劳动界》第 13 期上。维经斯基在中国帮助筹办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到 1921 年初春才回国。

◎维经斯基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和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外，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921 年 7 月，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时，对各地小组建党工作起了推动作用的上海小组，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二、北京的早期党组织

新文化运动为北京地区新思想的洪流打开了闸门。李大钊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与胡适就问题还是主义展开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的洪流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组织社团、调查研究、深入工人、研究主义，以图救国救民，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在北京党组织创立初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1920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诞生。

1.晨钟惊醒紫禁城——北京的革命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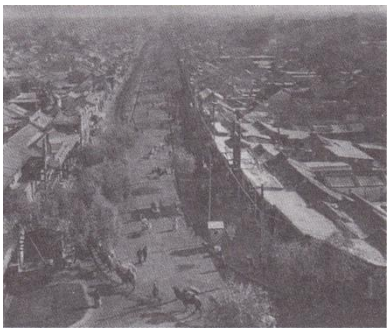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一直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的漩涡中心。军阀政府穷兵黩武，一方面想方设法压榨老百姓，另一方面又以国家主权作为抵押向列强大借外债。军阀政府禁止群众的集会、结社和自由言论的权利，残暴压制人民的一切反抗斗争。在苛捐杂税、内战频繁的情况下，北京城内老百姓苦不堪言，城内工商业发展也十分艰难。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北京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外国商品物美价廉，它们一打进北京市场，就几乎摧毁了北京的手工业生产。帝国主义并未满足于单纯的商品输出，19 地纪末他们又开始在北

京开设银行、铁路和厂矿，加强了对北京的资本输出。这样一来，北京的民族工业既要同帝国主义经济竞争，又要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本支持，只能在夹缝之中挣扎前进。

但是，北京的民族资本主义毕竟在缓慢发展。1879 年，中国商人段益三在门头沟创办了通兴煤矿。几年后，又创办了神机营机器局。20 世纪初的几年，外国资本家先后在京汉、京绥铁路沿线创办了一些企业，如长辛店机车修配厂、南口铁路工厂等。1905 年，民族资本家创办了北京唯一的火柴厂即丹凤火柴公司。北京京华印书局、京师华电灯公司也在这一年创办。1906 年，清政府在南口设立了铁路工厂。第二年，清政府陆军部在清河镇创办了薄利呢革公司，专制军毯和军呢。1908 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我国第一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印钞厂。同年，京师自来水公司创办起来。1910 年，和记面粉厂在西便门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北京的民族工业发展带来了机遇，欧洲各国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地区的近代工业企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轻工业的面粉、造纸、织布以及地毯等行业的新厂，不断出现。1915 年中国人建立起了第一家自己的啤酒厂——双和盛啤酒厂。但是“一战”一结束，帝国主义就卷土重来，北京地区的民族工业又遭挫折。



◎20 世纪 20 年代的北京街景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北京的产业工人也在增长。1919 年五四运动前，北京产业工人约有 2 万人左右，人数虽少，但是比较集中，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此外，还有建筑工人、人力车夫、水夫、手工业工人等，

约十几万人。北京产业工人多来自农村，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北京产业工人同全国产业工人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资本家的三重压迫，富于反抗性和革命性。由于北京社会世世代代承袭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因而北京地区的工人受封建压迫和剥削尤其突出。包身工、养成工在矿山、工厂中生活在最底层，苦不堪言。因此，反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北京产业工人的一大艰巨任务。

北京近代工业起步发展的过程中也往往伴随着工人同外国资本家、封建政府的官吏的斗争。薄利呢革公司营运不久，工人们为了争取增加工资先后爆发了两次罢工斗争，都取得了成功。虽然罢工的结果对工人的生产生活改观不大，但是对工人们来说印象深刻，他们已经看到了团结起来斗争显示的力量。后来，罢工就渐渐成了工人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一种重要手段。

1916 年，北京财政部印刷局的工人们要求按照承诺加薪和分“花红”，经过呈文要求、械斗等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罢工不总是成功的，1913 年北京邮政工人反对强行增加投递版次而罢工，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结果是罢工发起人一个自杀一个远走了。尽管罢工的风险很大，工人们还是坚持斗争，五四运动前，长辛店机车厂的工人们进行了多次自发的经济斗争。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城内的学生们加强了与长辛店的工人们的联系，启发工人们在斗争中逐渐觉悟。

先进的工人们已经日益觉悟到：要当家做主，只能起而斗争，这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北京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

“一一扣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正如《晨钟报》上一条警语所言，李大钊在北京的文化思想界上空敲响了“晨钟”。

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仍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仍受着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从这一点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那么失败的原因又在哪里呢？这是有识之士们在革命后不断思索的问题。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来，原因就在于没有一次彻底的文化思想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需要进行一次思想文化上的补课。

1917 年，《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后，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提倡民主主义；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文化、主张新文化。北京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也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民主等观念。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北京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每周评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常常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国人自强。由于对孔教心存好感的文化保守顽固势力在北京一直大量存在，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展开了对于孔教的批驳。杂志批孔的文章，发扬了民主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17 年，章士钊、李大钊等人一起办《甲寅》日刊。李大钊在《甲寅》做编辑期间，不断发表文章探索真理，评论国内、国际形势，评介外国思

想文化，热情介绍和称颂俄国革命，探讨社会主义理论。

为了及时分析政治形势，配合当时政治斗争，揭露封建军阀的罪行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18 年 12 月 22 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他们不断地对重大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使得这个刊物一开始便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性。每星期出版一期。李大钊常常亲自到报馆去，耐心地逐字逐句地进行校对。

正是由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每周评论》不断揭露反动统治者的真面目，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也得到了大大地提高。概言之，五四运动前，《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互相呼应，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的战斗号角作用。

五四运动之前，以北京古都为中心，以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两面旗帜，维护民主共和政体，反对复辟封建帝制；宣传科学知识，猛烈抨击封建宗法思想、封建迷信和传统礼教；要求改造封建教育制度，发展民主和科学的教育。这一切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势力，开始唤醒了一代有为青年，掀起了一个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青春校园荡新风——北京早期党组织的缔造者

在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等人都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1918 年 1 月，李大钊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又兼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由于其热情的革命思想和忠厚的人品，李大钊在北大青年学生中声望很高。在青年学生的心目中，李大钊是他们的良师益友。这位图书馆主任兼教授，知识丰富、待人谦和、思想清新，而且热心助人。他每月 120 元薪水，常常拿出一多半接济贫寒学生，以至于校长蔡元培不得不让会计每月先把李大钊家庭日用钱扣下，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正是李大钊具有这种思想和人格的力量，许多青年学生尊敬他，信服他，愿意接近他。对于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社团，李大钊给予热情支持，并且在实际上起着导航的作用。这些学生社团中的许多成员以及其他与李大钊接近的青年进步学生，如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邓中夏、谭平山、刘仁静、罗章龙、张申府、张国焘等，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著名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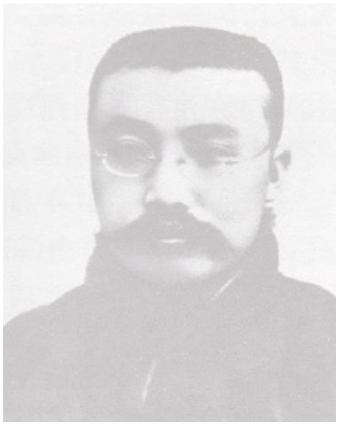
李大钊以其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感情，探求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让李大钊受到了极大的激励。他决心借着革命的浪潮，让更多人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1919 年 9 月和 11 月，李大钊接连在两期《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也是李大钊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

李大钊直言，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他在文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李大钊还在文中指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就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结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就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李大钊较多地引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的基本观点，分析经济构造与精神构造、生产力与社会组织的密切关系，还以一定的篇幅介绍马克思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论”）和“资本集中说”等。他公开申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强调马克思学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而“不可拿这一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和较为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标志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自己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我要尽一切力量广泛宣传自己的这一发现，因为我感觉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李大钊在办公室时常琢磨这个问题。

因为在图书馆工作的缘故，李大钊经常和那些在图书馆埋头苦读的年

轻人接触。一天一个名叫张国焘的学生拿着报纸上刊登的李大钊的文章向李大钊请教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李大钊突然灵光一闪：“这些年轻人是多么好的宣传对象啊！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他们是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啊！我为什么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呢？”

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内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从此以后，在办公室里，在自己的书房里，李大钊经常被一群青年围着，他为他们热情地讲解，解答着他们心中点点滴滴的疑惑。

李大钊与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两人性格迥异：李大钊谦和、宽厚，陈独秀倔强、固执，但他们是相互信任的并肩战友，有着很深的友谊。1920 年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发起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 年 10 月，他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1 月，又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还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 年到 1924 年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 年 1 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李大钊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党工作不遗余力，且自奉俭约，非常刻苦。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指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开展。1926 年春，北方政治形势恶化，皖系、奉系军阀开始对革命运动进行猖狂镇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三一八惨案”。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也正是由于这些革命活动，李大钊被下令通缉。1927 年 4 月 6 日，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出动军警 300 多人，突然包围苏联使馆，并进院搜查。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两个女儿和滞留在这里的国共两党的工作人员共 60 余人被捕。

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 月 28 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 20 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 38 岁。

张申府、张国焘和刘仁静，也是北京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

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嵩年，字申甫，河北献县人。1913 午，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先后在文科哲学系和理科数学系学习。1917 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校工作，并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曾几次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代主任，是时任北大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张申府当时在《每周评论》做编辑，还同时担任了《新青年》的编委，又是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在当时，张申府曾向国人大力介绍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他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研究罗素主义，在 25 岁时就已成为研究罗素的专家。罗素也很肯定张申府，他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 年 8 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要。

1920 年 10 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共同建立了北京早期党组织，成为共产党最早创始人之一。

张申府不仅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在当时还是“南陈北李”间的奔走串联者，为中共建党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1920 年冬，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而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张申府应聘前往教逻辑。知道他要去法国，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

建立党的组织。

在法国安定下来之后，张申府于1921年年初发展了同行的刘清扬入党，不久后又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后来又吸纳了周恩来加入。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由于张申府当时的“老大哥”身份，他没有出席成立大会。此外，张申府还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这引起很多同志的不满。1923年，少年共产党宣布开除张申府。

◎张申府

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和教学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他还负责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1925年，张申府因个人理念等原因，退出了中国共产党。退党之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主要研究方向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与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并称“四大金刚”。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担任游行总指挥。1936年2月，张申府和刘清扬被同时逮捕，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清华大学囿于当局压力解聘了张申府。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

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与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创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

1948 年，国民党在解放军面前节节败退之际，张申府却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不合时宜”，为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 月 15 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文“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10 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至此，张申府身败名裂、众叛亲离。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主要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一直生活到 1986 年。

纵观张申府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罗素研究的第一人、黄埔军校教官中的中共第一人、中国第一个推介爱因斯坦的人、一二九运动的幕后总指挥、民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曾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上司，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家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他在中共建党的历史过程中，不应被忽视。

张国焘也是北京早期党组织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

1916 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他深受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办学宗旨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风格的影响，在北京大学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

随着对社会现实了解的深入，账国焘对国弱民穷和内忧外患的时局现状深感不满，内心中激荡着爱国热情。在北京大学两年半的时间里，张国焘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渐渐成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之一。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张国焘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在此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如同所有的爱国青年一样，张国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

5 月 6 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张国焘负责学联的讲演工作。5 月 19 日，北京全体学生总罢课，学生运动开始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6 月 2 日，张国焘和讲演团的团员以售卖国货为名，走上街头讲演。结果，他与一起的北京大学学生同时被捕。

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全社会大规模的“三罢”斗争。6 月 8 日，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将张国焘等被捕学生用汽车“礼送”回学校。

张国焘出狱后，在北京和上海几次奔波。他被推选为北京学联总干事，并曾在上海与陈独秀交流。1920 年 4 月北京形势稍有好转后，他回到了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并向他介绍了陈独秀在上海的情况，以及上海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在李大钊的建议下，张国焘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籍。

7 月初，北京的局势再次紧张起来。李大钊要张国焘再赴上海，并同陈独秀详谈进一步的计划。张国焘到达上海后，受到陈独秀的热情接待，并同他就当前的局势、共产主义运动、党的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这一切都使张国焘受益匪浅。

回到北京后，张国焘向李大钊汇报了陈独秀在上海着手筹建共产党的情况。李大钊表示非常赞同，认为建党的条件已初步具备，北京等地也应一致进行。10 月，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李大钊、张国焘和张申府三人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以北京小组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并被推举为会议主持人。在会议最后选举产生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因反对国共合作，未当选中央委员。心灰意冷的他回到北京，与杨子烈结婚。在北京，他和妻子曾一度被捕入狱，并在狱中交代了很多党内情况，这些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后人发现。中共四大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张国焘又回到中央。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张国焘却执行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三大事件中，他都对国民党做了让步。

1926 年年底，张国焘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当他的意见被否决后，他同意起义，而且自始至终参加了起义的全过程。

◎张国焘

1928 年，张国焘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 年 4 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使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1935 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反对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犯下了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

后来，张国焘在川康地区陷入绝境，回到陕北。1937 年 3 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中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下，张国焘写出了书面检讨《我的错误》。尽管如此，张国焘仍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 年 4 月 5 日，国共两党在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联合祭扫黄帝陵，以此向国人昭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决心。出人意料的是，张国焘在结束了祭祀活动后，竟然直接登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投向国民党阵营。后来周恩来等人虽百般劝阻，张国焘却无意回头，选择脱党。后来，他还一度参加了戴笠组织的反共活动，但成效甚微。蒋介石也并不信任这个叛逃者，明确对他采取“尊而不敬，用而又防”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国焘偕全家前往台湾，后来又先后隐居香港、加拿大等地。1979 年 12 月 3 日，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客死在多伦多的养老院。

张国焘，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也是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却另立“中央”，

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活动，最后冻病交加，魂丧异国。

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还有刘仁静。刘仁静(1902-1987)，字养初，又名亦宇、敬云，1902 年 3 月 4 日，出生于湖北应城。

少年时的刘仁静，先后曾在武昌的博文书院和私立中华大学中学部就读。在求学的过程中，他曾阅读了《新青年》、《甲寅》、《学生杂志》、《科学》等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就在刘仁静的思想意识逐渐产生变化的时候，他结识了比自己大 7 岁、在中华大学大学部工作的恽代英。

1917 年 10 月，恽代英和几个中华大学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互助社。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都是中学生，刘仁静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并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活动。时代的发展为互助社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活力，互助社的成员们承担起宣传新文化的任务，组织了一些爱国活动，如上街调查国货，要人们不忘国耻。正是在互助社参加的这些实践活动，为刘仁静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8 年 7 月，刘仁静中学毕业。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互助社的好友们，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先盾在物理系、英语系和哲学系就读。

在此期间，刘仁静拜识了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以及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考虑到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为他提供机会，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在北京大学的日子，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参加了北大讲演团，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刘仁静被

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并转入哲学系学习。

那时候，北京大学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教室听课，也可以选择自己学习。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自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刘仁静阅读了相当多的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在马克思主义和五四新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0 年春，刘仁静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 10 月，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中共一大代表，与张国焘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当时刘仁静只有 19 岁，是所有代表中年纪最小的。既懂英语又懂俄语的刘仁静，还担任了此次大会的翻译。

北京小组为什么选刘仁静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呢？刘仁静在后来接受党史研究者的访问时，回忆道：“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时，最初是张国焘和邓中夏，可是邓中夏当时在保定师范学校教书，又要兼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有事去不了。罗章龙在铁路工会工作也很忙，我当时没有职务，结果补选我去上海出席一大。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大会有这么重要。”而当时北京早期党组织的核心人物李大钊，因为要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加上公务繁忙，实在无法脱身，所以没有去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之后，刘仁静作为李达的主要助手，参与制订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和共产主义丛书等的出版计划，为党的早期宣传事业做

了重要贡献。

1922 年 11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与此同时，少共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团中央派出刘仁静出席。故两人同时从北京动身，前往苏俄。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安排了发言环节，由于陈独秀不懂英语，刘仁静便代其在大会上发了言。此次俄国之行让刘仁静大有收获，不但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还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对刘仁静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23 年 7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后来，由于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1926 年 9 月，刘仁静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即国际高级党校学习。期间，刘仁静曾列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1929 年 4 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他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作任何请示，而是自作主张，在绕道欧洲回国时，特意登上土耳其的太子岛，专门去拜见了托洛茨基。刘仁静在岛上住了十几天，常常与托洛茨基促膝长谈，这也成为刘仁静后来赖以自傲的资本。临别时，托洛茨基将自己起草的一份《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提纲，交给刘仁静带回中国。此后几年，刘仁静一直与托洛茨基

保持密切联系，并以托洛茨基的代言人自居。

1929 年 8 月 16 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还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的官僚化，被党组织除名。

◎刘仁静

1929 年年底，刘仁静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活动的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刘仁静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但不为其他人所容。

刘仁静既被开除了党籍，又不被托派接纳，就这样，他倒向了国民党，倒向了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他先后在几家国民党机构供职。但是，刘仁静坚持了一个原则，即只抗日不反共。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同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

1987 年 8 月 5 日，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这位中共一大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3. 亢慕义斋谱新篇——北京大学图书馆建党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力量看方生，勋勤垂后代。寿与人民齐，春风永不改。”这首诗，再现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众多热血青年的革命友谊，也展现了北京早期党组织的成立和之后“星

火燎大原”的发展。

五四运动中，青年们逐步锻炼成长。在李大钊周围，团结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除了前文介绍的几人之外，还包括高君宇、邓中夏等人。青年毛泽东也在这一时期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从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后来回忆：“我在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由于客观斗争的需要，产生了建立新型政党的要求和愿望，并开始了酝酿和筹备工作。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

当时尚在北大任职的陈独秀，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于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被捕。陈独秀出狱后，为避免敌人的继续迫害，决定前往上海，1920 年 2 月，李大钊亲自伴送陈独秀到天津，路上，二人商讨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

之后，陈独秀乘船南下，李大钊在天津旧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相互交谈了对中国目前形势和革命的看法。李大钊回京后，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经过多次商量和讨论，于 1920 年 3 月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成立时保持着低调，直到 1921 年 11 月 17 日，才公开化。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声明：“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的价值，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它的同志，现在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也就是为什么组织起来进行研究的理由：其一，

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两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其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务。”研究会的宗旨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

研究会的成员，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例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朱务善、王有德、吴汝铭、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正是这些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十分支持研究会的活动，他应邀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大会，还作了简明扼要的讲话。研究会成立以后没有活动场所，蔡元培就让学校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室，两间房子，一间用来办公，一间做图书室。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把图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Communism”的音译，也就是共产主义小屋，还表达出了“亢奋地仰慕共产主义”的含义。起完名字，大家还觉得差点什么，后来大家就凑了一副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出实验室”的意思就是搞科学的思想，“入监狱”的意思是搞革命准备坐牢。“南方兼有北方强”是李大钊概括的，他说南方人“行”，现在南北的同志济济一堂，南北之强加起来，就是五湖四海的团结。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化之后，其组织性明显增强，按照会员们不同的兴趣分成了十个读书小组，分别作专题研究。第一组唯物史观，第二组

阶级斗争，第三组剩余价值，第四组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第五组社会主义史，第六组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第七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第八组俄国革命及其建设，第九组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第十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学会还定期聘请名人学者来开展讲演会，如李大钊、陈启修、顾孟余、高一涵等人。除了定期的讲演会外，会员们还经常聚在一起举行讨论会和辩论会。通过各种形式，会员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北京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不忘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工作。他们经常来到群众中举行演讲，向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这一强调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学说。

同时，李大钊等人还积极联络北京、天津等地的先进分子，努力促成进步团体的联合。他与北京、天津的许多社团都保持着密切联系。

1919 年 9 月 16 日，天津觉悟社成立。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提议请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来天津作一个讲演。9 月 21 日，李大钊果真如约来到天津讲演。

1920 年 8 月 16 日，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天津觉悟社的代表 20 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周恩来和邓颖超首先发言，介绍了觉悟社近一年来的活动情况，说明了邀请大家来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各个团体的代表也接着发言，他们都表示赞同觉悟社的建议。最后，李大钊指出各团体有表明本会主义的必要。他指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对外尤不足以与其他组织

进行联合的行动。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合成“改造联盟”，并制定联盟的宣言和约章，促进各进步团体的协调和统一。

北京的社团为政党的形成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在指导思想上，社团做了许多引进、研究和宣传工作；在组织制度方面，社团提供了许多种方式可供比较；在社团组成方面，已经改变了过去个人、分散的局面，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力量；在干部方面，社团锻炼出了一批骨干。在一定意义土说，这些社团是后来北京党组织成立的准备或雏形。

正当北京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1920 年 4 月，维经斯基连同秘书马马耶夫及翻译杨明斋到达北京。此时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已经在国际上积累了一些革命声望，加之北京在中国主要城市中，离苏俄相对较近，于是成了维经斯基访华的首站。经过北京大学俄国教授柏列维的介绍，维经斯基认识了李大钊。见到了共产国际的使者，李大钊十分高兴，和维经斯基见面畅谈了一番。之后，维经斯基要求李大钊帮忙引荐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包括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李大钊通过各种群众团体特别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欢迎会、讲演会，邀请苏俄友人演说，介绍俄国革命后的现状。

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后，维经斯基对北京的革命形势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里，李大钊和维经斯基再次讨论了建党的问题。维经斯基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和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党的条件。李大钊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为了尽快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为了进一步

商洽在中国的组党工作，李大钊把共产国际代表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维经斯基等去上海后，秘书马马耶夫留在北京，帮助李大钊开展建党工作。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 1920 年 10 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北京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

不久，张申府去了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国内就剩下李大钊和张国焘了，他们便分头接洽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国焘找了罗章龙和刘仁静，他们都是同学，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研究。李大钊发展了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柏根、华林、王竟林 6 个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小组。当时北京大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活跃，他们一度对无产阶级革命持赞成态度，因此也愿意加入。

小组成立后，李大钊又发展了一些人加入。11 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北京党组织内的各项工作是繁杂的，于是进行了分工。李大钊负总责，并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国焘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黄凌霜、陈德荣编辑并发行《劳动音》周刊；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然而，好景不长，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越来越大：首先，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全国或地方性的领导以及各种职务和纪律，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严明的组织纪律的。其次，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少调和的余

地。志不同则道不合，终于在 11 月间，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二者短暂的合作尝试之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无政府主义者走后，北京的早期党组织就只剩下了几个人，势单力薄。因此，又陆续发展了一些成员，包括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吴汝铭等人，队伍又壮大起来了。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各项活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 12 月，由李大钊出面，在北京大学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宗旨是“集合信仰或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还开展工人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各地开展工作，建立党团组织。

北京党组织的工作步入正轨，此时距离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又进了一步。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合影

三、京沪两地早期党组织的活动

上海和北京的早期党组织建立起来后，立刻开始了行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发起了一次次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他们意识到了工人阶级中蕴含的伟大力量，走到工人群众中间，对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这些早期的工人逐渐觉悟了起来，而这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些运动也逐渐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此外，这些党组织的缔造者也十分重视在青年当中开展工作，各地为了培养和教育广大的青年，纷纷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上种种努力，都为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 震荡九州传心声——宣传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求救国的道路向西方社会如饥似渴地寻求着真理，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各种学会纷纷成立，各种思潮和各派学说都有人研究。当时人们把这些西方的思潮统称为新思潮。这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平民教育等其他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后面这些思潮中，虽有很多都标榜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或是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受任何约束，或是具有

相当浓厚的空想色彩……这些学说看似美好，也在当时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和支持，但是却与中国的实际脱钩，注定无法完成拯救中国的使命，所以也很难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其他思想流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和反对，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一些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主张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者主要是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分子；二是主张取消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实行“无政府”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者包括黄凌霜、区声白等人。北京的李大钊和上海的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作为当时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曾多次在思想战线与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激烈论战。

这几场论战声势浩大、旷日持久，其实质是要不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论战，这些思潮的本质弄清楚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也就明了了。原来许多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原来混在共产主义队伍中的错误思潮信奉者也被清除出去。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传播，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有重要意义。

除了针对非马思潮的论战外，北京、上海等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缔造者还以其他各种方式积极投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之中。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

中文版《其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也是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批党员之一。陈望道 1891 年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1915 年年初东渡日本留学，曾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在日本期间，陈望道接受了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熏陶和启发，开始阅读马克思学说相关著作，盼望中国也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19 年 5 月，陈望道学成回国，来到浙江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员。他和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但不久，他因为大张旗鼓宣传新文化、反对旧道德，被扣上了“非孝，废孔，共妻，共产”的罪名，不得已离开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陈望道怀着满腔的愤怒，离开了他所深爱的学校与学生，回到了他的家乡——浙江义乌。这件事也引起了他深刻的思索，使他意识到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这样的中国才有希望。

1920 年 3 月的一天，陈望道收到了李汉俊、戴季陶等人负责的《星期评论》杂志社的来信，随信还附上了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原来，戴季陶之前在日本时，购得了这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并认识到了这篇文章所蕴含的重大价值，因此想找人翻译出来，以便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发表。熟悉马克思主义、精通日语且文字水平极高的陈望道，成了他们寻求帮助的对象。

早年学贯中西、留学日本的陈望道只把书匆匆翻看了几页，便察觉到了这本书的分量。

“现在的中国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书籍啊!”陈望道下定决心要尽快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从此，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小茅屋，就成了陈望道的办

公室和休息室，他经常在昏黄的油灯下忙到半夜。可怜天下父母心，陈母见儿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分昼夜地进行翻译工作，一个月了连头发也没有理一理，人明显地瘦了一圈，经常是衣衫不整，眼里布满了血丝，虽然她不明白儿子在翻译什么，但是她明白这对儿子肯定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陈老太太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日特意做了糯米粽子，并配上一碟红糖，给儿子送了进去，说：“快趁热吃吧！糖不够的话娘再给你加啊！”

陈望道抬起头，看着母亲关切的眼神，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说：“娘，您不用操心了！”陈老太太看着儿子书桌上堆满了书籍，生怕耽误儿子工作，就赶快出去了。

陈望道一边吃着母亲送来的香甜可口的粽子，一边琢磨着书中的几个字句该怎么翻译。陈老太太在屋外徘徊着，担心儿子的红糖不够吃，但是又担心自己进去打搅儿子的工作，只好在屋外喊：“红糖不够我再给你加啊！”陈望道头也没抬，随口应道：“娘！不用加糖了，够甜了！”该到吃晚饭的时间了，陈老太太进屋来收拾东西，一见到儿子忍不住老泪纵横，只见儿子满嘴的墨汁，旁边碟子里的红糖一点也没有动。

这个蘸墨汁吃粽子的小故事，至今仍在分水塘村的乡间传颂。

陈望道加班加点，终于在 1920 年 4 月末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的翻译，寄给了在上海的李汉俊，陈独秀与李汉俊二人又经过了认真的校阅，于当年 8 月便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 1000 本，迅速售罄，当即再版，仍然售空。到了 1926 年 5 月，这本书已经重印了 17 版之多。许多青年在看到这本书时，都如获至宝，一些希望买到这本书的甚至多方打听出版社的地址。

其实早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之前的 1905 年，朱执信就在《民

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综合简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主要内容。除了介绍这些基本的知识，朱执信也尝试翻译《共产党宣言》。虽然这次尝试只是在参考日文译本的前提下，翻译了一些片段，但也是一次可贵的尝试。

◎陈望道及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而当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在中国流传时，无疑是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 1936 年，斯诺到延安时，毛泽东对他说：“有一本书我印象特别深，这本书使我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翻译的，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鲁迅也称赞陈望道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流传至今，影响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对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实在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但在欣喜的同时，他们又意识到，仅仅一部

《共产党宣言》是不能满足先进人士的需要的，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必须借助日文或者其他的文字。要改变这个现象，必须大量翻译这些著作。也正因如此，李达、李汉俊等众多共产党组织的早期缔造者着手开始翻译工作，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版在之后的一两年内迅速出版。这些书籍给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带来的惊喜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许多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他们的这些译作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翻译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李达、李汉俊等人也在继续深入地学习着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热血的爱国青年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转变。

2.红旗一举千里明——组织工人运动

经过五四大潮的洗礼，特别是上海工人大罢工中，工人阶级表现出的伟大力量和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蕴含在中国工人阶级中的伟大力量，开始认识到团结工人进行战斗的必要，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吴玉章曾经回忆说：“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上层军官、政客、议员……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对比之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是真正的、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上海和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们更加重视对工人群体的宣传和引导，纷纷脱下自己的长衫马褂，走到工人中开展工作。

1920 年年初，上海码头工人要发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陈独秀感觉到，这是一个在工人群体中进行宣传的绝佳机会。经过多方的联系，陈独秀于 4 月 2 日这天出席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

4 月的上海正是春末夏初时节，黄浦江两岸的柳树已经冒出了新芽，陈独秀这天特意没有穿自己平时所穿的长衫到现场。该他演讲了，他快步登上台子，台下的工人们猜测着，不知道这个白面书生要说些什么。

“兄弟们！姐妹佃！有的人说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人是贵人，是人上人。但是我觉得你们才是世界上最贵重的、最有用的人！”

陈独秀的话在工人中引起了一阵骚动，有的工人在下面提出了疑问：“你说我们工人是最贵重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整天要辛苦劳动还不能养家糊口呢？而那些当老板的整天什么也不干却吃香喝辣呢？”这个工人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陈独秀不慌不忙地启发大家说：“你们不劳动，那些当老板的能整天吃香喝辣吗？你们不劳动他们能住上洋房吗？所以说你们是最贵重的人，最有用的人。但是你们为什么受苦受穷呢？”

陈独秀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下面的人群静悄悄的，都在凝神静听他的讲话。陈独秀接着说：“那是因为他们在剥削你们，压榨你们的劳动血汗。你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境遇，就要团结起来进行抗争！”陈独秀饱含热情的讲话受到了工人们热烈的欢迎，这个讲话就是有名的《劳动者的觉悟》。

陈独秀当然明白，仅仅对工人们进行启发和教育是不够的，他还同时思考着如何把工人们联合组织起来。1920 年 4 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上海工

界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 7 个团体，发起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当时在工界很有影响的一些工人纷纷来到筹备会上，为即将在 5 月 1 日召开的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积极出谋划策。筹备会上，陈独秀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陈独秀凭着自己在工界团体中的崇高威望被推举为筹备会顾问。

陈独秀非常重视这次的纪念大会，在其精心指导下，上海各界工人 5000 多人在 5 月 1 日这天举行了集会，会上工人们热情高涨，喊出了“劳工万岁”的口号。

身在北京的李大钊，也十分重视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早在五四运动前，在北大工作的李大钊，就指导了学生们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这个团体成立于 1919 年 3 月，起初是以“教育普及和平等”为目的的民主主义群众团体，它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五四运动以后，他们更加关注政治，演讲题目偏重于政治方面。当时，其主要活动形式是在北京街头定期演讲，只是影响十分有限。1920 年 3 月，邓中夏在团内担当了领导职务，为了扩大演讲团的影响，他提出建议注重乡村演讲、工厂演讲，团内的其他成员接受了邓中夏的建议，于是演讲团的影响越来越大。

邓中夏这个年纪轻轻的北京大学学子为什么对搞工人运动这么在行呢？其实邓中夏也是在不断的斗争中磨炼出来的，开始搞工运之初，他也是吃了不少苦头的。

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就决定去从事工人解

放运动的实践。他看到北京街头的人力车夫比较多，就决心向这些工人兄弟讲明道理，让他们团结起来进行罢工，增加待遇。邓中夏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天一早，邓中夏就走出了校门，站在大街上等着人力车夫。说来也巧，邓中夏刚站定不久，远远就看见一个人力车夫拉着车子来了，他急忙向人家招手示意。这个车夫以为一大早有人要坐车，感到非常高兴，心想："生意来了!"车夫兴冲冲地拉着车朝邓中夏跑去。

邓中夏看车夫来了，也高兴地迎了上去，一上去就拉着车夫的手说："大哥！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辛苦劳动却还受穷吗？"

这个车夫一下子就愣了，心想："这个客人是怎么了？不说到哪里，却问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他怎么知道邓中夏的目的呢？

他以为邓中夏搞错了，就问邓中夏："客人您到哪里呢？"

邓中夏也觉得这个车夫怎么这么不开窍呢？自己是在启发他觉悟起来，推翻压迫不再受苦，可他怎么老是问自己要去哪里呢？

邓中夏于是向这个车夫反复申述革命的道理，这个车夫一看这个人不坐车，拉着自己胡说八道，就生气地说："你这年轻人，又不坐车，却拉着我胡说八道，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呢，没工夫和你闲扯，你快放手！今天让我碰见你算是晦气!"

而邓中夏这个湖南的年轻人也颇有一股子倔强劲，只见他使劲拉着这个车夫，说："大哥！你应该拦下其他的和你同样受苦的车夫，你们一起拦路罢工，要求增加待遇，这样才不受压迫啊!"

他们的争吵吸引了大量的围观者，人们纷纷来看热闹。正在他们争吵

不休的时候，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警察冲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车夫的车给砸了，理由是妨碍交通。

车夫气得扯住邓中夏说：“我就知道今天碰到你这样的人要倒霉，你要赔我的车钱。”邓中夏无奈之下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钱，可是也抵不上损失，好不懊恼。

有的同学趁机讽刺他，见面就问：“工运搞得怎么样了？”

邓中夏并不气馁，他总结教训后感到：人力车夫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再加上不是那么集中，不容易组织和发动，搞工运之初，还是应该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邓中夏才建议平民演讲团突破城市的局限，到工厂和矿山中去动员真正的产业工人。

1920 年 4 月间，邓中夏率领的平民演讲团来到了长辛店。那时的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 40 里，有 3000 多工人，是一个巨大的资源。这里的工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思想觉悟比较高，在五四运动期间，很多工人都很积极，这正是邓中夏首先选择它的重要原因。虽然一个工厂的工人数量是有限的，邓中夏还是积极在工人中宣传进步思想。不出所料，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的宣传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看到这样的结果，邓中夏非常高兴，不禁感叹一句：“长时间的努力终于有回报了。”

接受新思想的工人决定在 1920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纪念大会，邓中夏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这是工人自觉要求进取的表现。为了鼓励工人们继续进步，虽然当时的他非常忙碌，仍然专程在那天赶到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参加活动。邓中夏、张太雷等四人刚来到长辛店，便受到这些工人

的热烈欢迎，工人们争相与这些年轻人握手。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邓中夏热情高涨，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称赞了工人的进步行为，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学习新知识，为了自己的权利与国家的命运而继续奋斗。

从长辛店回来，邓中夏被工人的热情所深深感动。工人们在这次大会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力量令他进一步坚信自己现在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夜深人静，年轻的邓中夏久久不能入睡，他为白天工人们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力量而兴奋不已。在床上辗转反侧，邓中夏还是不能入眠，干脆一骨碌爬了起来，记起了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长辛店的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长辛店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

◎邓中夏

长辛店工人的热情与觉悟令邓中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这里已经取得了初步咸效。"怎么样才能更进一步在他们当中开展宣传、展开工作呢？"邓中夏、李大钊、张太雷等为了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就现在的形势看，工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比较低，我们印的报刊其中好多人都不懂，我认为目前大力向工人们进行宣传的同时要集中起来对工人们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这样这些工人们更容易觉悟起来，对马克思主义这些抽象的东西也会明白得更快。"邓中夏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大钊接着说：“我完全同意中夏刚才的看法。我们应该开设这样一个专门的学校，提高这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知识。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人，我认为学校的老师在向工人们授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俗化，不要讲单纯的大道理，这样不能吸引工人们的兴趣反而会招致工人们的反感。像讲述工人们团结起来才会有力量的这样的道理时，我们可以说‘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这样工人们就容易明白多了。”李大钊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策划下，1921 年 1 月 1 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它分日夜两班，由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担任教员。晚上工人们上课，白天工人子弟们上课。教员们在讲授课程时先教工人们识字，后讲革命道理，注意把知识灌输和革命道理的宣传结合起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课后教员们还经常到工人们家里去走访，同他们谈心交朋友，教孩子们一些自己编好的儿歌，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越来越多，成立一个可以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已经迫在眉睫。工人们同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希望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们的意愿很快传到了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等人那里。经过讨论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在 1921 年 5 月 1 日这天，在长辛店成立铁路工人的工会组织，取名为长辛店工人

俱乐部。

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长辛店的工人们为了准备好这一年的纪念活动,早在 4 月初就开始了筹备活动。他们为开好这次会，印刷了上万份传单和《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等数种宣传小册子，制作了很多面七彩的旗帜。

5 月 1 日这天，长辛店工人纪念五一节大会在娘娘宫如期召开。整个会场旌旗招展，1000 多名工人代表来到了会场，连天津、保定等处也派来了工人参加会议。会场一时人头攒动，好不热闹。纪念会在隆重的歌声中开场，只听人们齐声唱：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雄壮的歌声刚落下，大会主席就走上了前台，高声对大家说：“父老兄弟们！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纪念我们工人兄弟们自己的节日，想必大家和我一样都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们今天集会的目的绝不仅限于此，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明确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经过大家连日来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有以下几点：第一，要团结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是我们工人自己的组织，是我们工人们自己的队伍，如果我们不团结，那就会受别人的欺侮，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第二，我们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待遇。兄弟们想一想，我们做了那么多工，干了那么多活，但是到头来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那些资本

家拿走了我们大部分的劳动果实，大家说这公平吗？”

台下的工人们振臂高呼：“不公平！”

大会主席接着说：“第三，我们的目标是不受工头压制。我想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不要窝里斗，就一定不会被那些工头压榨的。第四，铲除妨碍我们劳动的一切障碍。我们劳动本来已经很辛苦，但是还要设立种种的限制，对我们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要坚决铲除这些妨碍因素。”

在工人们热烈的掌声中，主席结束了讲话。接着工人代表和补习学校的学生也分别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们有的向大家讲述五一节的来由，有的控诉资本家的罪恶。

在场的记者听了忍不住说：“说得太好了！工人们的素质真不错，这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情啊！”

会后，工人们举行了示威游行，这是由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策划和领导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只见工人们手拿彩旗，高呼着革命口号：“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制！”“一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工会万岁！”“工人神圣！”“我们的仇敌就是那些不劳而获的人！”“五一节万岁！”等，他们边走边向街边的小店散发宣传册子。工人队伍从长辛店前街走过，然后经过车站，到长辛店后街停止。长辛店的街道两侧、屋顶上、墙上都站满了观看的群众，游行队伍每到一处，都有老百姓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掌声、欢呼声。当游行的队伍沿着事先规划好的路线走了一圈回到原处时，只听三声“劳动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连路过的火车的汽笛声也被掩盖住了。

在邓中夏等人的努力下，长辛店的工人们的革命觉悟逐渐形成，革命

热情日渐高涨。1922 年 8 月，针对铁路工人待遇差、生活困难的情况，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号召 3000 多人参与了大罢工，这次罢工影响极大，最终迫使当局妥协，答应改善工人待遇。罢工的胜利也激励了京奉、京绥、正太等铁路的工人，进一步推动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浪潮。

除了上海和北京外，全国其他地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在这一时期积极行动，深入当地的工人阶级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这就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3.五月风来成花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青年学生奋勇斗争的行为，充分体现出这一群体所蕴含的巨大革命潜力。1920 年 4 月，维经斯基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访问，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准备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正式党团组织。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根据维经斯基介绍的经验，把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帮助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纷纷建立了起来。

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 年 8 月，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刚一建立，就开始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上海的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创办的培养青年干部的一所学校，吸收了大量的优秀青年入学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鉴于这种优势，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最早是在这所学校的学生中开展的。陈独秀对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为此派出了自己的爱将俞秀松和张太雷，他们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由于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建团工作十分顺利，8 月 22 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当时的成员有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金凤家、袁振英、俞秀松等人，其中俞秀松担任书记，团的领导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 6 号。

当时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目的是团结和教育青年，因此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在团内部经常组织政治报告会，邀请陈独秀等党的领导来演讲，给青年们讲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激发青年们的革命精神。初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和党的早期组织的关系十分密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都是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党组织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开展，团员也经常参加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很快，成立不到一个月人数就达到了 30 人，随着团员人数的增加，设立了秘书处、组织、教育、调查、编辑等 8 个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十分重视培养党团干部，单在 1921 年的春天就派出了 20 多名外国语学社社员分三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刘少奇、罗觉、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柯庆施等人。

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作用是十分特殊的，它虽然是一个地方性的组织，但是当时为了促进其他各个地区团组织的建立，它向全国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发出了团的章程和信函，要求各地建团。各地团组织建立后，它又经常同北京、广州、武汉等地联系交流，组织各地的进步青年赴俄国

学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杰出活动受到了共产国际的称赞，被誉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

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早期党员们也积极响应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议，在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 年 4 月，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大学和李大钊会见时，也曾经和一些社团的主要成员如邓中夏、张国焘等进行了座谈，这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

1920 年 11 月初，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等 40 余名学生参加了会议。高君宇是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于是大家推选他作为团的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团的骨干成员在建团前后都已经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创办了《劳动音》和《工人周刊》等革命刊物，向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深入各地开展工人运动。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还进行了联络和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工读互助和劳动补习学校的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格林来华后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对格林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在 1921 年 3 月 16 日，召开了特别会议，向团员通报了格林来华后的活动，并选举何孟雄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草拟并通过了

致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书。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迅速，鉴于此，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开展团的工作，李大钊建议设立团的机关，以加强联系。1921 年 3 月 20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召开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李大钊、高君宇等 25 人代表全市 55 名团员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实行执行委员会制度，选举了 11 人为执行委员。张国焘、刘仁静、李大钊、高君宇分别担任书记委员、会计委员、出版委员和组织委员。因为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机关，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上海、北京的早期党组织的带动下，自 1920 年下半年以来，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早期党员们，也开始在当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散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它仿佛一块充满磁性的磁石，吸引着那些立志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热血青年。正如任弼时后来回忆的那样：“1920 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第四章

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一、长沙的早期党组织

辛亥革命后，新文化、新思潮以不可抵挡之势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毛泽东等人发行《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创立俄罗斯研究会，研究新思潮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带领下，新民学会逐渐成长为当时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中心，推动湖南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在毛泽东的筹划及各方的努力下，1920 年初冬，中国共产党的长沙早期组织以新民学会为基础悄然而生。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为长沙早期党组织的诞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 三湘大地赤焰燃——湖南的革命形势

辛亥革命后，湖南也掀起了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逐渐发展起了以商办形式为主的近代工业。这股热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为高涨，民族工业呈迅猛之势发展。但总的来说，湖南近代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脆弱的，他们依靠向银行贷款来投资矿产业、交通业，一方面须严重依赖于银行钱庄，另一方面资金周转十分缓慢、效益低下。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湖南的工人阶级队伍产生并不断壮大。1905 年至 1921 年，长沙的产业工人已有 17 万之多。长沙工人阶级队伍与全国各地的工人一样深受压迫，从产生开始便在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发展壮大。

1911 年 5 月，长沙、株洲粤汉铁路工人参加了爱国保路运动，参加者逾万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工人的自发斗争掀起了高潮，大规模的罢工近 20 余次。这个时期的工人罢工尽管此起彼伏、轰轰烈烈，但斗争目标局限于争取经济权利，还只是自发的斗争，加上缺乏正确的领导，因而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些斗争已经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与此同时，国内形势纷乱复杂，湖南的爱国志士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们无比急切地开始寻求救国救民救湖南的道路。1914 年，方维夏等主办了宏文图书社，翻译西方著作，传播西方文化，主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试图“破思想界之沉寂”，挽救民族危亡。次年 9 月，龙兼公等人又创办了湖南《大公报》，猛烈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但是这股新风却遭到了长沙守旧保守势力的封堵，他们主张复兴旧道德以救治社会，企图以封建旧文化、旧思想来对抗新文化、新思潮。

尽管守旧势力千般阻挠，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想还是破洞庭大门而入了。易白沙率先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在湖南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中，教育家杨昌济站在了最前列。他认为，只有改造国民思想，才能改造这个时代，改造国民思想则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取各自所长。因此他十分看重教育，并始终秉持着“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愿望，他期望学生们能立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杨昌济在一师任教时经常向他的学生们推介《新青年》，在他的引导下，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人都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新思想、新文化与湖湘文化的碰撞交融，滋养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为代表昀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也促使他们逐渐走到一起探索学术、

砥砺品质、救亡图存。

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经常一起游历求学、讨论时事，无论是在橘子洲头，还是岳麓山的爱晚亭、崇德寺、云麓宫，又或者是贾太傅祠、飞虎营等地，他们都要辩论交流一番。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就是这些场景的生动再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今日长沙橘子洲的青年毛泽东塑像

年轻后生们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关注并不停留于口头上的讨论，他们同样十分注重实地考察社会状况，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经过不断地讨论、辩论和考察，他们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目标，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并得出结论，那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以共同奋斗。

1918 年 4 月 14 日，新民学会应时而生，会员包括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萧三、陈绍休、邹蕴真、张昆弟、陈书农、邹彝鼎、叶兆桢、周明谛、罗章龙共 13 人。经过热烈的讨论，结合当时的实际，确定了学会的宗旨，即“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关于学会的名称，决议定名为“新民学会”，取“大学之道在新民”之字，“新民”还含有反旧制、主革新、为人民的意思。

新民学会在成立之初便有着较为明确的宗旨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是一个认真、严肃、健康向上的青年团体。学会内部充满了朝气，会员们求知识、求发展的热情十分饱满。毛泽东、蔡和森等深受杨昌济中西文化观的

影响，这使得在他们带领下的新民学会从一开始就具有开阔的视野，时刻关注世界形势。

到 1920 年，新民学会已发展了近百名会员，新民学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成立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上”和“求友互助”的学术团体，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战斗的革命团体。

根据李维汉回忆：“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舍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湖南的思想界进一步焕发出活力。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主编。这本杂志在形式上借鉴了北京的《每周评论》的做法，分为“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栏目。创刊第一期，《湘江评论》就赫然亮出了自己的宗旨，即“宣传最新思潮”，并以坚定的革命姿态，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湘江评论》成绩显著，它不仅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欢迎，也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高度评价。《湘江评论》对湖南乃至华南地区的学生运动起了较大影响，在长沙学生运动史和长沙新文化运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又从第 7 期接主编《新湖南》，这一刊物基本上继承了《湘江评论》的衣钵，面貌为之一新，继续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毫不留情面地口诛笔伐，宣扬新思想、新文化。无

奈受张敬尧打压，出刊 12 期后，《新湖南》同样被扼杀了。

《湘江评论》、《新湖南》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它们对于新思潮、新文化在湖南的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湖南青年们的思想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打开了局面。

湖南的志士们逐渐意识到，单个的报刊要想承担起传播新文化、新思潮，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确实举步维艰，难成气候。于是开始探求新的传播渠道，文化书社很快应运而生。

1920 年 7 月，毛泽东、易礼容、彭璜、易培基、姜济寰、赵运文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推销中外各种新书杂志。30 日，毛泽东发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指出：“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当时参与发起文化书社的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包括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章甫、陶毅、方维夏、罗宗翰等。文化书社是新民学会的革命精神的继续，也是《湘江评论》革命精神的继续。文化书社的创办和稳步发展，对湖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化书社创办不久，毛泽东等又创办了俄罗斯研究会。“一战”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原本大多对西方心存好感，但是“一战”彻底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而恰在此时，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劳农政府宣布废除

了帝国主义俄国时代与中国结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这无疑使得无数知识分子对苏俄产生了无比的好感。于是，1920 年 9 月 15 日，俄罗斯研究会正式成立，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俄罗斯研究会主要的工作就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到俄罗斯实地调查，联络留俄勤工俭学。姜济寰为总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办理日常事务。在俄罗斯研究会的影响和推动下，长沙许多进步青年都向往着去苏俄学习。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等一批革命青年都是由俄罗斯研究会郑重介绍，先去上海补习俄语，再转赴俄罗斯学习的。俄罗斯研究会不仅推动了湖南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的研究和关注，也促进了留俄勤工俭学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干部。

概括地讲，经过这一系列洗礼，越来越多的湖南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新民学会会员合影

在这一时期，湖南还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五四运动后期，在长沙等地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二是湖南民众不满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于

1919——1920 年掀起的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这两次运动壮大大了长沙和全省的革命力量，对全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形势也起到了鼓舞作用。

2.革命志士聚星城——长沙早期党组织的缔造者

说到湖南建党，首先不得不提到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1893 年 12 月 26 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富裕农民家庭。

毛泽东曾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1911 年春节过后，他因成绩优异，被老师推荐转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听到新军在武昌成功发动了起义的消息，极为振奋，毅然弃笔从戎加入新军。在新军中，他十分关注政治时事和社会问题，除吃饭的钱以外，毛泽东把剩下来的饷银订了报纸。除了军事训练，毛泽东就手捧着订来的报纸，翻来覆去地看，看完就跟新兵们宣传现今的形势如何如何，某个人物是如何厉害。

辛亥革命的失败，让毛泽东非常失望，他选择退出新军，继续读书，后来考入了省立高等中学校。毛泽东喜欢阅读，在这段时间涉猎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古典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一大批名著。

1913 年，毛泽东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四师范（后来并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至 1918 年 6 月毕业时，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 5 年的宝贵时光。在一师期间，毛泽东的政治观念开始形成，伦理教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如前文所述，正是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成了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杂志的最忠实读者。毛泽东热烈拥护新文化运动，赞扬个性解放，主张“改造国民性”。他为新思想所吸引，把李大钊写下的《青春》、《今》、《新的，旧的》的重要观点和佳句抄在本子上，反复诵读。

必须指出，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在他的意识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唯一确定的是，他是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

毛泽东不仅注重研究知识，而且注重实地考察，他曾经利用暑假的时间，徒步到长沙、宁乡、益阳、沅江等县的农村考察，感触良多，学到了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1918 年 4 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会员曾尝试“工读互助”、“1918 新村建设”等改良主义思想。1918 年夏天，毛泽东、蔡和森以及张昆弟一起考察了岳麓山，并想找一个地方建立新村。此后，毛泽东也多次表示想把学校、家庭、社会合而为一，建立成“人人做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从而在改造人的同时完成对社会的改造。但当时他们还只是学生，这个美好的想法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时隔两年之后，毛泽东曾在上海受邀一起尝试共产式的工读生活。坚持了一个多月后，不得不宣告试验失败。

在 1919-1920 年的驱张运动中，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仍不放弃对改良主义的期待。驱张运动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但从长期结果来看，湖南自治最后还是难脱军阀“官治”的命运。至此，毛泽东等才对改良主义死了心。

当然，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也经历了一个

过程，在此过程中，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李大钊、陈独秀两个人物对他影响深刻重大。

1918 年 8 月 15 日，为了联系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毛泽东首次到北京。抵达北京后，这个身无分文的青年找到了以前的老师——如今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请他帮忙介绍工作。毛泽东是杨昌济在一师的得意门生，杨昌济十分欣赏毛泽东的才识，便把他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于是，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不仅有机会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在新闻学会里，毛泽东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这些人日后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博览群书，使他的思想进一步接受着各类思潮的涤荡。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不过后来，随着视野的开阔，毛泽东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放弃了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追从。毛泽东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非得政权则不能够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

1919 年 12 月，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团再次来到北京。此时的他，还是平民通讯社的社长。毛泽东当时住在福佑寺里面一间狭窄的房间里，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他白天四赴奔波、集会请愿，晚上多半时间都守在油印机旁写稿件再油印出来。即便如此之忙，毛泽东还是要抽空阅读介绍马克思

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报刊，如饥似渴。毛泽东从《新青年》上读到了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深受启发。他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其中有三本书给了他特别深刻的影响，使他开始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翌年 1 月，毛泽东经过李大钊、邓中夏等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只要有时间，就去参加学会的演讲会。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了初步联系，毛泽东多次去研究会的活动室亢慕义斋拜访罗章龙、邓中夏，参观他们的活动，又和邓中夏等多次去长辛店考察工人情况。

一日，毛泽东到箭杆胡同 9 号来拜访陈独秀，请教关于驱张运动的事宜。陈独秀听说了计划后，赞扬道：“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我很赞赏你们驱张，也赞成你们打算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由于仍受警察厅监视，陈独秀不便参与很多活动，但仍然答应毛泽东，作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支持驱张运动。

第二次到北京，毛泽东感触良多，2 月份他写信给陶毅，提出了“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精进的同志团体”的想法。他认为新民学会只说了要改造社会，对于改造成什么样、用什么方法改造、方法怎样实践等问题还需要早做思考和准备。毛泽东日后回忆起第二次在北京的这段日子来，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

摇过。”

毛泽东在长沙早期党组织建立之前曾三度到上海。特别是1920年四五月那一次，他和同伴彭璜、李思安一道来到陈独秀的寓所，与陈独秀讨论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湖南自治的问题。陈独秀十分欣赏这个有热情、有学识的年轻人，很乐意和毛泽东交换意见。

在上海同陈独秀的接触，对毛泽东影响巨大，他回忆道：“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的一生中可能那个是关键性的时期，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正是在上海的这个夏天，毛泽东真正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

此后，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何叔衡是中共湖南早期党组织的另一位主要创建者。

何叔衡(1876-1935)，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

16岁那年，何叔衡考中了秀才。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一个新式学堂，

并在那时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身体力行，率先剪去辫子，并鼓动男人剪辫子、女人放小脚。

1913 年，37 岁的何叔衡，抱着“久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的目标，考入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成为一名大龄学生。正是在长沙，他的人生轨迹开始了新的方向。在一师求学期间，何叔衡与毛泽东结识，虽然毛泽东比他小 17 岁，但是二人志同道合，很快成为挚友。后来，何叔衡利用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的机会，积极传播新文化。

1918 年 8 月，何叔衡加入新民学会，担任执行委员长。由于他在新民学会中年纪最大，又留着八字胡，大家都叫他“何胡子”。毛泽东对何叔衡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何叔衡

1920 年，何叔衡又与毛泽东等发起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驱张胜利后，何叔衡被任命为通俗报社社长。他聘请谢觉哉做主编，又请来毛泽东作指导，把《通俗报》变成了长沙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因此，1921 年 6 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下令抓捕他。6 月底，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是一大代表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会后，何叔衡回到长沙，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协助毛泽东等发展湖南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先到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后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他虽已年逾五旬，仍克服困难学通了俄语。1930 年，他回到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

被捕同志。

1931 年，何叔衡到了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并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临时法庭主席。1932 年 2 月 19 日，中央政府举行第七次常会，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为最高庭主审，成为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

何叔衡虽然年事已高，但对工作从来没有怨言，深受苏区群众爱戴，然而，由于其坚决抵制王明的“左”倾路线，不赞成搞极左的肃反政策，1933 年冬，被撤销当前职务，转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但是，他仍然关心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尤其是惩治贪污腐败的工作。他与项英、谢觉哉等共同讨论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于 1933 年 12 月 15 日颁布实施。

1934 年 9 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决定，主力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央决定何叔衡、瞿秋白、项英、陈毅等人留在苏区坚持战斗。何叔衡这时已是年近花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听从了党组织的安排，留下来继续做群众工作，并无怨言。

1935 年 2 月，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途中，在长汀遭到了国民党李玉部队的围剿，后不幸被俘，惨遭杀害。

何叔衡的牺牲让他的战友们无限悲痛。董必武说：“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萧三诗赞何叔衡：“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青。”毛泽东曾评价何叔衡：“何胡子是

一头牛，是一堆感情。”

彭璜也是湖南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只是相较而言，很多人对他的经历不那么了解。

彭璜(1896-1921)，字殷柏，又称荫柏，湖南湘乡县碧溪乡人。1896 年 11 月，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年曾在长沙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读书。

五四运动发生后，彭璜开始积极投身于长沙学生爱国活动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湖南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就主要是由毛泽东和他共同领导起来的。5 月下旬，为了响应北京的五四爱国行动，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他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在彭璜领导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了长沙及各城市的罢课，掀起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高潮。之后，彭璜加入了新民学会，同毛泽东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7 月，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彭璜又被推举为联合会会长。联合会几度组织了长沙焚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触怒了湖南当局军阀，但是彭璜并没有因为困难而退缩。

在反封建、求自治的运动中，彭璜也是处处冲在前面。在驱张运动中，彭璜是“驻沪”代表，积极呼吁各方面支持驱张运动，同时也成立了湖南自治运动促进会，他担任会长。驱张运动有眉目之后，他还拜访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讨论驱张成功后湖南的出路问题。1920 年 2 月，彭璜参与创办了《天问》周刊并担任主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民众自决”，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种种罪行。9 月，他与毛泽东联合教育、新闻、工、商、政各界进步人士，发起湖南自治运动，主张实行民主政治。此后不久，彭璜又参与发起了湖南人民宪政运动，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揭露赵恒惕、谭延闿政府的假“自治”面目，遭到反动当

局镇压。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彭璜同样成绩斐然、贡献突出。8 月份，他协助毛泽东把长沙文化书社创办起来，在起初筹备书社最艰难的日子里，彭璜是主要的筹备人员之一，想尽了一切办法为书社奔忙。后来和毛泽东倡议组织留俄勤工俭学团，发起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彭璜被推举为会计干事，驻会处理一切日常事务。随后，彭璜等人发起了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得到帮助去苏俄学习的。

当时，湖南处在军阀的统治之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之为“过激主义”，社会上的普罗大众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不了解。因此彭璜在 1920 年 8 月于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热情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介绍了苏俄的国内情况和对外政策，认定中国也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时，彭璭也很早就认识到，过渡时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农政府”，他在这篇文章中说道：“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劳农的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段。”

11 月前后，彭璜参加了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 6 人发起成立的湖南共产党组织的签字活动，成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成员之一。1921 年 1 月初，他在新民学会会员与文化书社的集会上表决时坚决赞成“布尔什维主义”。

彭璜很受蔡和森的器重，蔡和森曾在 1920 年 8 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深入工厂、机关，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

彭璜与毛泽东有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对彭璜也坦诚相见。毛泽东曾在信中称赞彭璜“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但同时又严肃地指出他存在着“自视过高，看事过易”，“感情及意气用事”等缺点，特别是指出他在处理某些私交问题时“未免过当”。对此，彭璜都虚心听取规劝，注意克服缺点。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彭璜在长沙参加了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然而天妒英才，在筹备赴法勤工俭学等事宜中，彭璜因操劳过度而患精神失常症，后来失踪。新中国成立后，彭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3.湘江两岸塑新民——秘密发展的长沙党组织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的推动下，在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推动下建立的。

如前文所述，浩浩荡荡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让湖南的革命形势渐趋高涨，《湘江评论》、《新湖南》的发行促进了湖南青年们的思想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打开了局面。而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相继成立，更是为长沙的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组织上的基础。

在组党过程中，长沙的革命斗士们还得到了蔡和森的启发和帮助。

蔡和森是毛泽东的同学，也是新民学会留法学员中的先驱者。1919 年赴法后，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学说，直接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

阶级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等从法文翻译成中文。通过比较研究各种学说，便“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纪对症之方，中国亦不能外”，“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最终确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他的影响下，不少留法进步青年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如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蔡畅、向警予等，他们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经过探索研究，逐渐萌生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想法。1920 年，蔡和森曾前后几次写信与毛泽东探讨、磋商建党问题。7 月，在法国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率先提出了“组织共产党”，会议一结束，蔡和森就急切地写信向国内的毛泽东传达了这个想法。

8 月 13 日，蔡和森又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信，他认为现在世界革命运动的大趋势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情形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到 9 月中旬，蔡和森的建党思想愈发强烈了，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再一次提到建党的问题，他首先详细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入党条件上的原则区别，非常赞赏党的“铁的纪律”。蔡和森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是势在必行，“必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共产党”。

而当时毛泽东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的多次交谈，以及接触多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得出了与蔡和森一致的看法。经过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已经对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工读主义等统统失望了，认为只有步北冰洋岸边的那个俄罗斯的后尘，中国才有希望。

毛泽东复信，对蔡和森的建议，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说：“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目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同时，向蔡和森介绍说，陈独秀已在国内开始建党活动。

1920 年 8 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建立之后，陈独秀便致信毛泽东，明确请他在长沙建立与上海同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先后寄来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

1920 年冬天，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秘密诞生了。它的成立既有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心血，又有来自陈独秀的指导，还有新民学会的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其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人。

在湖南，军阀统治非常残暴，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必须采取极甚隐蔽的方式，利用群众团体或以个人名义开展各项活动。

他们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新民学会专门召开新年会议，开展了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使会员们分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为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还向湖南《大公报》大力推荐了《布尔什维克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重要文稿，使湖南《大公报》成为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长沙共产党组织成立后，还开始积极筹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彭璜等人草拟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并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使之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他们还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等人帮助湖南劳工会举办了两所工人夜校、一所平民阅览室，还设立了女子职业学校，举办了工人读书会、星期讲学会，创办了《劳工》月刊。通过这些活动，长沙各界工人的觉悟得到了提高。

◎《湘江评论》

1920 年 10 月，毛泽东等人开始在长沙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入团的有刘少奇、彭平之、张文亮等人。毛泽东曾多次叮嘱张文亮：“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宜急进。”据不完全统计，1920 年，入团者有 16 人；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入团者达到 39 人。

就这样，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开拓下，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南已经有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湘江两岸的革命火焰，已经越烧越旺了。

二、武汉、广州、济南的早期党组织

1920 年前后，武汉、广州和济南等地也建立起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地方的党组织的出现并非特例，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武汉、广州、济南都处于交通要道，发展较早，都有扎实的近代工业为基础，并形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工人阶级队伍；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武汉、广州、济南等地，有力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五四运动后期，这些地方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办学校、建社团和办各种报刊的方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思想，为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 滚滚浪潮起江城——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立

武汉位于中国中部，水路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涌人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武汉地区近代工商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都市。

伴随近代工商业的兴起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以及反抗压迫的革命运动和逐渐积蓄的革命力量。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走进了历史。

辛亥革命后，作为首义之区的武汉三镇工人阶级的队伍也迅速壮大，

到 1919 年工人总数达到 20 多万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积蓄了力量。

1915 年 9 月，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在武汉也得到了强烈响应。恽代英、黄负生、林育南等是武汉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积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武汉地区的发展。

1919 年 5 月 6 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经过媒体传到武汉。在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的号召下，武汉各界纷纷参与到爱国大潮当中，先后形成罢课、罢市、罢工的高潮，唤醒了湖北民众的觉悟和热情，培养了一批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

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类：一是出洋留学、由国外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在国外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如李汉俊；二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求索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实践中放弃了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开始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三是由中国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他们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新思潮，但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他们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董必武、恽代英等人就是这批人中的杰出代表。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畬，号璧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 年 3 月 5 日，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曾投身于辛亥革命，并曾加入过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积极从事反袁活动，曾两度被捕入狱。尽管

知此，董必武的革命救国的信念仍未动摇，出狱后，他仍坚定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然而，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却未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的大地上仍是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恣意欺凌。1919 年，湖北接连发生两起护法军内部残杀辛亥革命元勋的事件（蔡济民、高固群两人先后被同党的护国军枪杀），董必武经多方辗转到达上海，想请孙中山主持公道。此时已经被桂系军阀陆荣廷排挤出护法军政府的孙中山，虽表示愤慨，却也有心无力。这使董必武开始对孙中山只依靠旧军人进行革命的方法产生了怀疑。

此时的董必武，还有另一项工作：主持湖北善后公会。1918 年，各省区国民党活动人士来到上海，成立旅沪善后公会，致力于促成南方的军政府和北京的北洋政府和谈，讨论“一战”结束后的“善后问题”。董必武和同乡张国恩被公会一致推举，主持会务工作。公会的会所兼董、张二人寓所位于上海法租界渔阳里。同为湖北人的李汉俊、詹大悲的住处刚好与其隔街相望，又因为董必武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经与詹大悲相识，由此又认识了李汉俊。他们几个同乡便天天聚在寓所里，讨论时政，探寻新的救国之路。

具有深厚理论功底的李汉俊，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便向董必武、张国恩等人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荐给他们，帮助他们进行学习。这段时间的学习对董必武等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带着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反复探讨了各种思潮，经过对比研究，“彼此都认

为中国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观念、道德、方法都改变了”。

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及上海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都显示出了民众力量的伟大，也说明了发动民众力量的重要性。董必武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人深刻地认识到：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方法迥然不同”，孙中山总是依靠军阀的“路子不对头”，讳言革命“代表社会上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而“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估计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但是，旧的革命方法行不通，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因而，董必武等得出结论：中国革命“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阶级革命”. 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此后，董必武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一真理带回荆楚大地，并在那里传播给更多的进步青年。为此，董必武和张国恩、詹大悲着手商议如何发动群众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于是决定从较容易的报纸办起。1919 年 8 月，董必武带着孙中山给的 100 元路费回到武汉，开始拿出 40 元尝试办《江汉日报》，后因资金没有着落而搁浅。于是他们转向办一所私立中学，即武汉中学。

这时，来自武汉的学生运动领袖陈潭秋，也表示愿意一起办学。

陈潭秋(1896-1943)，原名陈澄，字潭秋，1896 年 1 月 4 日，出生于湖北黄冈县陈宅楼一个书香之家。陈潭秋 16 岁时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来到武昌。1914 年，他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 年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院英语部。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潭秋作为武汉学联的代表，

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在上海，陈潭秋经同乡倪则天的介绍，结识了主持湖北善后公会的董必武，从此与董必武并肩战斗在荆楚大地上。

由于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均没有正式职业和收入来源，甚至连穿衣吃饭都有困难，因此创办武汉中学的经费成了问题。正巧，董必武一位同学雷大同，这时从广州大元帅府回家，路过武昌得知董必武筹办中学，主动表示愿做创办人，拿出 120 元做开办经费，并推荐同乡刘觉民一起参加创办。他们商议，办武汉中学，教师是义务的，除雷大同外，每个参办人还要捐 20 元开办经费。董必武找到在陕西军队的表弟帮忙，又在数九寒天当了一件皮袄，才凑足了自己的那份钱。经商定，学校名称为私立武汉中学，推当时在中华大学任教的刘觉民为校长。为了通过省教育厅立案，学校创办人推举湖北省议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郭肇明担任董事长。另外，倪季端任教学兼监学，江文波任总务兼监学。各董事分担一门课程，董必武负责教国文课，其余课程聘陈潭秋等担任。

武汉中学的校训是“朴诚勇毅”，即教导学生朴素、诚实、勇敢、坚毅。董必武等兴办武汉中学，目的是通过办一所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培育新人。为此，董必武通过各种渠道引导学生学习进步知识和理论。一方面，他在课堂上注意对学生进行反帝爱国的革命教育，另一方面，他还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等渠道，购置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供学校师生传阅。此外，他还指导学生会主办《武汉中学月刊》，编写《政治问答》读本，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议论时事政治，发表爱国、进步的文章。此后，陈潭秋又利用教外语的有利条件，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宣传十月革命，讲解马克思主义昀基本原理，

并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是聋子瞎子，找不到路。”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武汉中学成为广泛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培养新式人才和革命力量的基地。

◎武汉中学旧址

新文化运动后期，各地进步青年组织的爱国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九省通衢的武汉地区也不例外。经过了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洗礼，许多社团逐渐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一转变也给武汉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华大学大学部的青年学生恽代英和林育南、李书渠等于 1920 年 2 月创办了利群书社，成为湖北地区乃至长江中上游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恽代英(1895-1931)，字子毅，笔名代英、英、但一、天逸、FM 等，祖籍江苏武进，1895 年 8 月 12 日，生于湖北武昌。

武昌起义爆发，在年轻的恽代英心中投下了爱国主义的火种。1913 年，恽代英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1915 年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同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擎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恽代英大受影响，他称《新青年》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斗士。

1917 年 10 月，恽代英等人创建了一个爱国进步社团——互助社。这个团体开始时只有恽代英、冼伯言、梁绍文、李嘉齐（飞生）、陈文洪、陈传炳 6 名会员。不久，林育南、刘仁静等人陆续加入。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是当时武汉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

在恽代英等人的努力下，互助社逐渐成长为一个学习和宣传新思想的团体。而利群书社是在互助社书报贩卖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是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恽代英等人创办书社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介绍新文化、新思想，开始主要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期刊。1920 年 8 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速度。其下属的出版部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以及其他 15 种小册子和一些传单，并从 8 月 22 日起定期出版中文《劳动界》周刊。这些出版物后来都被引进到利群书社，为追求进步的湖北青年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共同目标下，利群书社与新青年社以及长沙的文化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正是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推动了革命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1920 年 4 月，少年中国学会委托恽代英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恽代英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列在所要研究的 26 个书目的首位。与此同时，他先后发表了《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金钱与工作》、《再

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等文章，宣传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私产制度是社会不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因等基本观点。10 月，恽代英翻译了这篇名著的部分内容，以《英哲尔斯论家庭起源》为题，在《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19 期上发表。

接着，他又译出了陈独秀来汉讲学时亲自委托他翻译的考茨基《阶级争斗》一书。这本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由新青年社于 1921 年年初出版。该书不仅教育了包括恽代英在内的利群书社的大多数成员，使他们第一次懂得了要推翻黑暗统治，必须搞阶级斗争，而且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深有启发，促使一部分青年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毛泽东称该书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正是由于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绝大多数成员的思想在这段时间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化，为他们日后创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奠定了思想基础。

武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一直得到上海、北京等地共产主义者的帮助，并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关注。

陈独秀一直留心武汉地区的形势。1920 年 2 月 4 日，他应邀来到武汉讲学，在武昌文华学校做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的演说，指出：要改造当今的社会，必须研究改造的方法，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改造社会必须：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应归为社会

的共产。7 日，陈独秀又作了《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说。陈独秀在武汉期间，还多次会见恽代英等人，委托他们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调查武汉工人状况。

4 月，恽代英、施洋、李书渠、包惠僧等发起组织湖北平民教育社。5 月，董必武等组织进步学生，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之后，董必武、陈潭秋创建新教育社和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创办刊物《新教育》。这些团体在武昌开办了多处平民学校，进行义务教育，提高了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

7 月中旬，恽代英、林育南、李秋实、林育英等 20 余人聚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次会议，标志着恽代英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开展，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广泛传播，以及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的觉悟和力量的发展，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条件日趋成熟。1920 年上半年，陈独秀、柏烈伟、李汉俊等分别通过不同渠道，联络湖北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在该地区建立共产党组织做准备。

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与陈独秀一起发起创建活动的李汉俊致信董必武，约他们在湖北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不久，李汉俊又亲自回到武汉，与董必武具体商量建党事宜。

1920 年春夏之交，曾在广州从事社会主义思潮宣传工作的湖北人刘伯垂，由广州途经上海返回武汉。在上海，刘伯垂与留日期间相识的老友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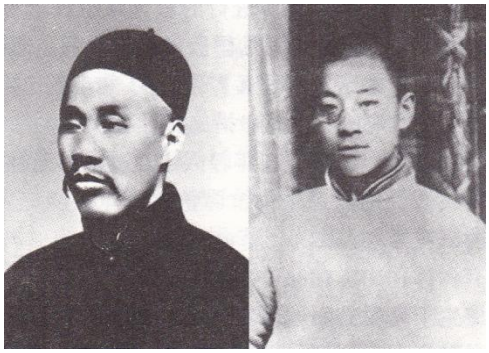
独秀重逢。两人谈了几次后，陈独秀即介绍刘伯垂在上海加入共产党，随即委派刘伯垂回武汉发展共产党组织，担心刘伯垂任务太重忙不过来，陈独秀又向他推荐了两位年轻人做助手。其中一位，是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另一个是包惠僧。

包惠僧(1894-1979)，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湖北黄冈人，1894 年 1 月 15 日，生于一个小土地经营者家庭。他曾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曾在武昌教书半年，后来又任《汉口新闻撮》、《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记者。1919 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以记者及学生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北京和武汉的五四运动。不久，他结识了五四运动中武汉学生运动领袖陈潭秋，次年又以记者的身份，结识了来武汉讲学的陈独秀。包惠僧对陈独秀仰慕已久，向其请教了许多问题。陈独秀也十分欣赏这个年轻人，不仅耐心回答包惠僧的问题，还告诉他，自己目前正委托郑凯卿帮助调查武昌工人情况，也请包惠僧帮忙协助。经过了一番交往后，陈独秀对包惠僧更为了解和信任。在委托刘伯垂赴武汉创立党组织时，他立马想到了包惠僧。

从上海回来的刘伯垂，带回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到达武汉后，刘伯垂和李汉俊一起，首先介绍董必武入党。随后，他找到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商谈，他们都同意参加党组织。

1920 年 9 月的一个晚上，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和刘伯垂来到武昌抚院街（现民主路）97 号董必武和张国恩的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宣布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会上，刘伯垂介绍

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经过，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大家讨论了刘伯垂带来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拟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草案，并研究了武汉党组织日后的工作安排，议定每周开会一次。会议根据刘伯垂的提议，推选包惠僧任武汉党组织书记。会后，刘伯垂租用武昌多公祠 5 号为党的机关所在地，对外挂上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以掩护组织活动。



◎董必武和恽代英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与湖北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武汉党小组成立后积极进一步开展工作。首先继续吸收党员，扩大组织。经过支部成员的培养、介绍，又发展了一些党员，如赵子君、刘子通、黄负生等。1921 年春，包惠僧离开武汉去上海，陈潭秋遂接任了书记一职。此时的小组成员，发展到了 9 人。

武汉党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组织，中共一大前，为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羊城先锋承斗志——广州早期党组织的创立

位于中国南疆的广东地区对外通商早，受外国侵略也早。在这里，诞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据统计，1920 年前后，广东省和香港两地的工人总数大约已经有 50 多万。

广东在 20 世纪初曾产生过一系列工人运动，也由此诞生过一些初期的工人组织。只是当时这些组织普遍缺乏鲜明的阶级意识，虽可能取得一些

局部斗争的胜利，但注定无法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摆脱自身的困境。尽管如此，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和纷纷涌现的工人组织，还是为广东地区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广东也是近代革命思想传播较早的一个地区，特别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以广东为主要活动基地，更是广泛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1917 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次年春天，苏俄政府宣布无条件取消帝俄时期与各国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夏季，苏俄政府又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些举动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巨大反响。孙中山在这一年夏天以广州南方国会的名义致电苏俄政府，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同时，广州的国会议员刘伯垂在他创办的《唯民》周刊上发表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之新写真》，报道了瑞士人比鲁果夫在俄国的亲身见闻，介绍了苏俄政府的各项革命措施和社会状况。

这样，很多广东年轻人迅速受到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三人。他们都是广东佛山高明人，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革命三谭”。

谭平山(1886-1956)，又名谭彦祥、谭鸣谦、谭聘三，1886 年 9 月出生于高明县明城新元村一个贫寒的缝纫家庭。1904 年夏，谭平山从东洲书院毕业。同年秋天，他考入广肇罗实中学继续学习。不同于传统的东洲书院，广肇罗实中学是一所新式的学校，谭平山在这里不仅继续学习古史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学习外语和数理化科目，接受新的科学知识。谭平出

为人聪慧，勤勉好学，记忆力强，成绩常名列前茅。他读完广肇罗实中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广州有名的两广优级师范本科学习。在这里，他和谭植棠、谭天度等人相识，成为同学，正是这一批年轻的学子，日后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

谭植棠(1893-1952)，曾用名昌泰，1893 年出生于高明县明城濠基村。谭植棠年轻时，最爱读康有为的《大同书》、严复的《天演论》等著作。他接受进化论观点，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这种志向也促使他后来走上革命之路。

谭天度(1893-1999)，出生于 1893 年 4 月，广东高明人。17 岁便参加革命，是中共一大期间的党员，1999 年 5 月 30 日逝世，终年 107 岁。到目前为止，他是中共历史上年龄最大、党龄最长的党员。

除了“革命三谭”，广州党组织还有另一个青年学生担任着主要发起人的角色，他就是陈公博。

陈公博(1892-1946)，原籍广东乳源。1892 年 10 月 19 日，出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其父陈志美曾积极投身反清斗争，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陈公博也从小就受革命思想影响。1914 年，陈公博考进广东法政专门学校读书。

这几位广东的青年学生，和同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都因目睹了国家的风雨飘摇而保持着救国的崇高理想。谭平山还曾在 1909 年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反封建运动。在十月革命爆发的 1917 年，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三人一起考入了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生。他们几个人曾经拜访过陈独秀，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革命

问题。在北大，他们还认识了李大钊，在课堂内外都受到他的言传身教。因此这几个广东青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思想上出现了很大变化，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师生成为这次运动的核心力量，其中谭平山、谭植棠都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且跻身于中坚的行列。谭平山在运动中奔走呼号，参加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战斗，并因此而遭到反动军警的逮捕关押。1920 年 2 月，他们共同创办了《政衡》杂志，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创刊号上，他们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这足见这些青年学子的救国决心。

在参加五四运动的同时，谭平山几个还把运动的详细状况写信告诉在广州的故友谭天度，谭天度收到后也深受鼓舞，他立刻将五四运动的确切消息在广州青年学生中间反复传播，这在广东的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五四运动中，广州各种社团组织也纷纷发表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 月 11 日，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联合广州各界群众数万人在东园召开国民大会，广州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参加了这次集会。会后群众不愿散去，又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派出代表向军政府请愿，提出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直接收回青岛，严惩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5 月底，广州各校学生连续举行集会，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广东籍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发动抵制日货的活动。

6 月 5 日，上海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声援北京斗争的消息传到广东后，广东学生相继效仿。在广东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同学们还联合了其他社会爱国阶层，以抵制日货为中心，不断推动运动的深入发展，使这场斗争坚持了大约半年之久，广大人民群众在运动中也饱受洗礼。

在群众运动日益高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其中，出生在广东的知识分子杨匏安功勋卓著。

杨匏安是广东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他 1896 年出生于破落茶商家庭。中学时因家境日艰，辍学回乡，在本乡担任小学教员，曾因反抗学校腐败而被诬陷入狱。出狱后，他游学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各种流派的社会思潮。1917 年杨匏安从日本回国，次年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后又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

1919 年 5——12 月，在广州五四运动处于高潮之时，杨匏安奋笔疾书，在不到半年时间，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篇幅最长、影响最广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又称《科学社会主义》）。杨匏安热情地赞扬“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之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在国内思想界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时，他发表《实用主义一文，针对胡适贩卖杜威的实用主义指出：这是“一种调和说，又日改良说”，并鲜明地指出“真理为实践的，凡不能证明者，非真理也”。五四运动爆发后.位

在广州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后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入党后，他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

除了杨匏安之外，当时在广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林修海等人二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在逐渐赞同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也从不断的工人斗争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所以他们开始组织各种团体，出版各种宣传物，举办平民夜校和工人学校，启迪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

由此，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迅速结合，进一步推动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整个1920年间，工人罢工达到17次以上，行业波及航运、铁路、机械、建筑和通信等多个行业，每次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

在不断的罢工斗争实践中，工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组织自己的团体对于保障自我利益的重要性，工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1920年4月的香港机器工人大罢工和1921年6月的广州机器工人大罢工，因为规模大、组织良好，均取得了胜利。在这两次罢工胜利的影响下，省港地区纷纷成立工会，仅广州的工会就由原来的26个迅速发展为130多个，香港也达到125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3月间，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这个工会后来领导了著名的香港海员犬罢工，此次罢工中虽然发生了沙田惨案，但最后取得了胜利。

综合来看，到1920年，广东已经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中国共产党广州党组织呼之欲出。

1920年夏天，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的谭平山、谭植棠以及陈公博，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途经上海返回家乡。在上海，他们又去拜访了自己的老师陈独秀。这次会面中，陈独秀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回到广州后，要

积极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时机成熟时，广州有更加重要的使命要他们肩负，三人表示定不忘老师的教诲。

回到广州，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三人分别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担任教授。与此同时，经过了五四运动的历练，他们在广州也经常深入到学生和青年中去，宣传五四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还和广东地区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取得联系，这些人就是前边提过的杨匏安等人。回粤学生和这些知识分子准备一起筹办一份宣传新文化、主张改造社会的报纸，写信请陈独秀指导。陈独秀复信表示支持，并对广东之后的革命形势十分期待。

在陈独秀指导下，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的积极努力下，《广东群报》于 1920 年 10 月 20 日在广州公开出版。当时陈独秀虽远在上海，仍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说：“我料压迫广东人的暴力不久也要去，我希望广东青年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这篇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广州青年人。

《广东群报》由陈公博任总编辑，谭平山编新闻版，谭植棠编副刊，谭天度负责征稿和发展订户的工作。他们在《筹办群报缘起》中公开声明：《广东群报》是“担负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广东群报》在传播新文化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广东工人阶级的觉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很快陈独秀就函约各地的共产主

义者建立党组织。

在广州，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也收到了陈独秀的信，他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他们以广东高等师范为主，发起组织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众人一段时间的筹措，1920 年 8 月，在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了大会，公开宣告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来又先后有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省立一中等学校的教授以及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数十人参加。青年团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而存在的，逐步地发展党员。谭平山当时是广州青年团的负责人，一时之间他声望高涨，当年甚至有“南谭（平山）北李（大钊）中间陈（独秀）”的说法。

9 月，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以苏俄政府的名义建立俄国通讯社。他们二人先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便指定了北京大学学生、广东台山人黄凌霜做向导。抵达广州后，米诺尔、别斯林在光光眼镜店租下二楼，开了家俄华通讯社，并委托黄凌霜替他寻觅广州的“共产主义者”。然而黄凌霜真正信奉的却是无政府主义，他给苏俄使者搬来的当然就是一帮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一位名叫区声白，乃是黄凌霜在北京大学的师兄，此时已在岭南大学任教。区声白英语非常好，每次这一帮“共产主义者”聚会，米诺尔等人用英语发言，区声白就当翻译。

1920 年年底，米诺尔、别斯林与区声白、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一个“共产党”，这个组织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这个党的执行委员会有 9 个委员，其中 7 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和别斯林是共产主义者。这个无政府

主义的“共产党”成立以后，出版了《劳动者》．印数为3000份，并在工人中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由于观念分歧很大，谭平山、谭植棠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拒绝加入这个党。

1921年1月，陈独秀从上海乘船经香港抵达广州，上海党组织的沈玄庐随之到了广州。陈独秀之所以到广州来，是以著名教育家的身份受陈炯明之聘，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孙中山很信任陈炯明，陈炯明初时也表现得很“革命”。陈独秀受到邀请后写信和李大钊等人商议此事，最后认为这是一个在广州宣传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好机会，于是陈独秀于12月17日离开上海，途经香港于月底到达广州。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与米诺尔、区声白等人建立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很快，他发现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在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者信仰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于是，陈独秀根据在北京、上海长期工作的经验，并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草拟了一份共产党党纲，于1921年1月给广东“共产党”讨论。然而这份党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就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上。区声白等人认为这个党纲与他们的信仰迥然不同。这也很好理解，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俸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陈独秀则认为共产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关系到党的性质、党的根本任务和远大奋斗目标等的大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则党会变质，会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

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双方各持己见，互不退让。陈

独秀认为，既然双方信仰的主义不同，将来始终是要分开的。那晚分不如早分，现在分开，各走各的路。无政府主义者鉴于与共产主义者不能共处，没有统一的语言，也甘愿退出广东“共产党”。这样，党内原来的 9 个成员中，7 个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广东“共产党”仅存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

◎从左到右：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

陈独秀这时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积极加强联系，开展革命活动。陈独秀曾经对谭平山等三人说，现在孙中山在广东已建立革命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他们开始研究建立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组织。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21 年春天，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开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陈公博

广州党组织建立后，进行了多项工作：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骨干力量，同时还派成员深入工人之间工作，组织工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此外，广州党组织还积极投入与无政府主义者

的论战之中。通过这些努力，马克思主义在南中国的土地上进一步传播，中国的革命事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3.革命曙光耀泉城——济南早期党组织的创立

20 世纪初，齐鲁大地正笼罩在军阀张树元和马良统治的阴云之下。省政府受到军阀的控制，省议会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的“民意代表”。城市里，军队和官老爷们作威作福，下层民众饱受欺凌。农村中，地主凭借私人武装欺压乡里，土匪横行无忌。农民们缺少土地，平日受尽地主盘剥和土匪侵扰，一旦自然灾害来临就只能四处逃荒。

参与组织发起济南共产党组织的王尽美、王翔千、王志坚等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后来成为一大代表的邓恩铭，更是来自偏远贫穷的贵州。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他们听到的是“一年年国土的沦丧”，他们看到的“满目是民众的嗟伤”。正是近代中国这种贫穷落后、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在这些青年心里种下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种子。

就在这些青年还在为祖国和家乡忧心忡忡之时，革命的曙光已经在齐鲁大地上悄悄升起。肖时，山东的工人阶级队伍开始不断壮大，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山东的近代工业就开始出现和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山东的产业工人已经达到 10 万人左右，山东地区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就在山东地区工人阶级不断壮大的同时，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内的

各种新思想也开始传播，影响日渐增长。当时，山东官书局和教育图书社推销《新青年》等刊物，在山东很受欢迎。但是，山东是中国“旧文化”的发源地，新文化相比之下还是“幼稚得很”。正在这种情况下，齐鲁书社诞生了。这个书社对后来济南共产党组织的诞生不仅有思想上的推动作用，更有人员组织上的直接影响。

1919 年 10 月，山东省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在社内设立了一个贩书部，这个部门创设的本意并非为了盈利，而是要“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所以以贩卖各种日报、杂志、中外书籍和新出版物为主。结果，通讯社因为缺乏人手发展并不乐观，但是贩书部却是越来越繁荣。1920 年 9 月 25 日，各股东召开了创立总会，决定把贩书部扩充为齐鲁书社，并且实行现代企业的股份制和公司制，选举董事会和委任社长（经理）进行管理，第一任社长便是王乐平。

齐鲁书社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书社成立后，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出版界建立联系，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此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许多新出版物都在介绍马克思主义。齐鲁书社推销的出版物内容虽相当庞杂，但主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像《俄国革命史》、《社会科学大纲》、《唯物辩证法研究》、《资本论入门》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莽原》等进步期刊，都受到山东进步知识青年的极大欢迎。这也使得山东当权派十分不安，山东督军张树元在 1919 年 6 月 11 日向北京政府密电济南罢市风潮时，如临大敌地密报了共产主义读物在山东流传的情况，并且通电山东上下官员，

对此要严加防范。

齐鲁书社对于此时正在济南读书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宝库。通过购阅这里的大量新文化图书，这些青年学生的思想境界和眼界见识迅速提高。而更加重要的是，齐鲁书社这样一个地方，为像他们一样的山东的进步知识青年提供了一个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互相交流联系的平台。通过齐鲁书社，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又结识了大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这也为日后济南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除了齐鲁书社之外，山东旅京大学生宋介、王统照、王晴霓、范玉遂、徐彦之等于 1919 年 11 月创办了《曙光》杂志，也为山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受到欢迎，除了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外，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巨大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巴黎和会将山东的权益（青岛和胶济铁路）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悲愤，山东人民更是有“切肤之痛”，当时山东各地的工厂大都是德国人修建，工人群众平日里受尽压迫和剥削，如今德国战败，自己的家园竟然又被日本觊觎，这让山东的百姓激愤万分。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济南学生纷纷罢课，学生还成队到工厂去演讲。越来越多的工人受到了学生的动员，也纷纷加入到斗争中来。除了参加游行示威外，工人们还热情帮助游行学生，济南电灯公司的工人自动给讲演的学生送茶送水，协助学生抵制日货。大槐树机车工厂的工人，为了保护

学生甚至不惜以身犯险，阻拦镇压学生的军警，保护学生的安全。工人还组织了劳动五人团、救国十人团。5 月 22 日，济南南门外大校场集结了数万工人和市民群众，共商救国大计，各团体代表相继演说，最后有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少年泥瓦匠一跃登台，向万余群众大呼：今日青岛未亡，我等受日本人欺侮已甚！待青岛亡于日本，青岛父老要受何等痛苦！台下听者“发指眦裂，号哭之声，远闻数里”。旅京山东劳动者也大声疾呼：“日本夺我青岛，即是夺我山东，即是夺我山东三千万父老兄弟之性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山东的进步知识青年正是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他们也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五四运动中，通过学生形成了各阶层的统一革命行动，像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所高校的进步学生带领着成立学生会，各个学生会之间再组成学联会，抵制日货，上街游行演讲，发动市民群众。也正是通过五四运动中的磨砺和考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

1920 年秋天，王尽美在《泺源新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乡村教育大半如此》的论文，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要普及乡村教育，让农民获得识字的机会，首先要打破阶级贫富才有可能。邓恩铭也在母校出版社发行的《灾民号》上撰文一篇，号召被压迫阶级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抗兵役，和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这帮豺狼们做斗争。

军阀的黑暗统治、经济的贫困落后、社会的动荡不安，早已在山东人

民心中种下了反抗的火种，五四运动的爆发，点燃了山东人民心中的革命之火。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影响越来越大，山东的工人阶级也越发壮大，在这样的形势下，山东共产党组织便应运而生了。

济南共产党组织，是在上海、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帮助和指导下，在山东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基础上，在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爱国青年的共同努力下成立的。

五四运动时，山东人到北京来，北京人到山东、上海去，共同的目的是外而争回青岛，内而惩罚国贼，济南与北京的交往就很密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济南又成为南北共产主义者往来必经之地。当时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派人到北京大学观摩学习。王尽美作为济南学联的领导分子，也常常去北京，并由此认识了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的罗章龙。

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和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建立了图书室，由“Communism”取名“亢慕义斋”，表达“非常渴慕共产主义”的心情。罗章龙正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研究会书记一职。

当时不仅是北京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同共产主义，远在济南的王尽美等人也向往这一条道路，希望通过这条道路拯救中国。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亢慕义斋”建立后不久，王尽美和早先认识的罗章龙取得了联系，赴北京大学参观学习，同时了解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系列情况。当时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仅在北京，还在天津、西安、石家庄、太原等地都吸收了一些成员，志同道合的同辈们虽然天各一方，却能因为这个组织联系起来，这让王尽美十分动心，他也立即申请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这次北京之行，在王尽美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那就是要在济南建立类似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他回到济南以后，就此事和邓恩铭、王翔千等人进行商讨，并和罗章龙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请教一些经验。

就在王尽美还在北京大学参观的时候，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为代表抵达中国，同行的翻译杨明斋，祖籍正是山东。杨明斋幼时家境贫苦，于是由山东流落东北，成为“闯关东”大潮中的一员，后来又从东北到了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以后，杨明斋在莫斯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组织。此次他回到祖国，就是要尽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活动。

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和李大钊等人见了面，然后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途经济南时，他们与王尽美、邓恩铭取得了联系。在杨明斋的引荐下，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见到了这位俄国来的使者，共同探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成立党组织的问题。他们从中吸收了不少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开展革命活动的有益经验。可以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一行由苏俄来到中国，不仅对北京和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起了促进作用，也推动了济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经过对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考察和同维经斯基等人的交流，早已开始酝酿建立一个组织。

1920 年秋，以王尽美、邓恩铭为首的进步青年酝酿成立山东第一个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11 月 21 日，励新学会正式成立，学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发行报章，举行演讲”为主要活动。学会出版有《励新》半月刊，王尽美任编辑主任，邓恩铭任庶务主任。刊物发表的文章揭露和抨击了腐败的社会制度，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进步

思想，有些文章还表现了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向往，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改造社会的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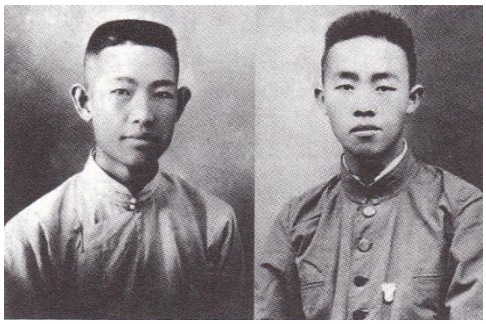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又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1920 年秋，齐鲁书社成立后，很快成为一个进步分子交流学习新思想的平台。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参与书社活动的过程中，结识了一批同样有志于共产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王尽美等人经过一番筹划，按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形式，秘密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以 Communist 直译命名为康米尼斯特学会，收集研究共产主义的书籍和理论。当时吸收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王翔千等，王尽美、邓恩铭二人担任领导。这个组织的成立，也为日后济南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准备了条件。

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曾函约五四运动中活跃的王乐平等人筹建济南共产党组织。但是王乐平本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并没有投身到在山东组织其产党的活动中去，于是便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等几名信仰共产主义的追求者给陈独秀。这样，由上海党组织发起的在山东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就落到了王尽美、邓恩铭等几个人的身上。

此时的王尽美、邓恩铭几个对于能接受这一项光荣使命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但是他们很快也发起愁来，建立共产党组织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尽管已经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但对于怎样建立党，几个人还是感觉没有经验。而陈独秀也早料想到仅靠几个学生在山东建党肯定是困难重重，于是他写信给李大钊，请北京党组织帮助山东建党。

李大钊对此事也十分重视，山东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重要，自古就是拱

卫京师的重要省份，还沟通了京沪交通，在这里建立强有力的党组织对革命是十分重要的。李大钊数次派遣北京党组织的一些同志来到济南，帮助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建立济南共产党组织。在以后济南党组织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北京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常常到济南来，王尽美等人也时常与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北京党组织成员接触。



◎王尽美与邓恩铭

于是，王尽美等人在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 1921 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济南共产党组织成立后，继续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为山东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济南党组织通过励新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组织了进步青年。励新学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 1921 年 6 月，许多会员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和青年团。同时，王尽美等人在斗争和学习中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使命。1921 年 5 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辛店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之后不久，济南大槐树机车工厂也建立了工人俱乐部，这是山东第一个由党领导的工人组织。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济南党组织选举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参加会议。他们两位是到达上海较早的代表，并且参加了一大的全过程。他们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虚心好学，表现活跃，和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一起共商建党大计，给与会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参加一大的经历，更如坚定了王尽美、邓恩铭二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

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从上海返回济南以后，王尽美、邓恩铭向济南党组织的其他成员详细介绍了一大的情况，大家共同研究学习党纲党章，并且根据会议上确定的党的中心任务，在济南和山东其他地区发动、教育工人，组织工人运动，继续推动山东地区的革命运动。

三、海外的早期党组织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中国青年走出了国门，法国是勤工俭学学生的首选。同学们一边努力读书，一边为捍卫中国学生的权利而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火焰的璀璨一点，燃烧在欧洲的土地上。日本是近代中国许多有志青年留学的国度，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也是先到日本，再从那里传到中国的。施存统从上海来到东京，又按照陈独秀的指示联系到了周佛海，两人共建了旅日共产党组织。遗憾的是，旅日中共早期组织始终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囿于形势的压力，这个在东京的党组织成立不到两年即停止了活动。

1.一寸丹心图报国——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创立

20 世纪初，大批中国人离开故乡，涌入法国。当时这些前往法国的中国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去法国谋生的华工，另一类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华工的发展壮大为共产党组织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而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更是怀着探索救国道路的理想，后来直接参与发起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1920 年，旅法华工总数已达 16 万人左右。然而，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华人在欧洲还被视作“东亚病夫”，为西方所轻视，而华工更是处在法国社会的最底层，做着最下贱最辛苦的工作。华工终日在各工厂车间工作，最

惨的是要上战场前线，动辄要作为炮灰，随时有丧命的可能。法国人对待华工完全不考虑什么工人利益，华工待遇极为凄惨，其境遇不啻亡国奴。

十月革命爆发后，欧洲各国工人为争取自身权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这也影响到了旅法华工，华工们逐渐觉悟到，中国工人也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其中的先行者是马致远和袁子贞。1919 年 10 月，他们二人发起组织了旅法华工会。这个工会由华工工会、中华工团、华工公会三个团体合并而成，会员达到了 4000 多人，下属 63 个分会散布在法国各地。工人们组织这个更大的工会，目的就在于更好地团结广大华工的力量，共同学习以增进知识，共同斗争以维护切身利益。

1919 年，巴黎和会上中国的权益被列强出卖给日本，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法国当地的华工也十分不解和愤怒。他们难以接受，自己以血肉之躯在“一战”的战场上努力工作，投入战斗，终于换得了中国的战胜国的资格，而日本竟然妄想夺得胜利果实，而懦弱的北洋政府，竟准备吞下这一苦果！旅法华工会组织了 1 万多人举行集会，甚至去包围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使馆，向中国公使施加压力，最终，在国内外爱国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收回成命，巴黎和会代表最终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像国内工人一样，旅法华工也显示出了自己巨大的阶级力量。

20 世纪初，中国一批批有志于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纷纷走出国门，到世界先进国家寻求振兴中华的良策。这股留学潮先涌向日本，后转向欧洲，其中到法国去的留学生最多。当时的青年们考虑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当时人们认为法国思想开放，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二是当时法国缺劳力，

工作比较好找；三是法国的货币比价在欧洲最优惠，可使学费降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等现代教育家的直接推动下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大多是清末民初的留法学生。1912 年 2 月，李石曾、吴稚晖和吴玉章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得到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1915 年夏，李石曾等人又在法国巴黎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提出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为了统一领导俭学会和勤工俭学会，1916 年 6 月 22 日，在国内和巴黎分别成立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和法国大学教授欧乐为中法双方会长。

这样，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从 1919 年春到 1920 年年底，先后有大约 1600 名青年，为了切身感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和社会制度，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踏上了前往欧洲的道路。吴玉章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的演说中说过，自己前往法国，就是为了考察俄国十月革命的“发动之源”，要自己亲自观察，看看是不是可以应用在中国，他鼓励青年学生们也要心怀祖国，放眼世界。

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当中，有一批是当年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导骨干和先进分子。在这支队伍中，著名的有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徐特立、王若飞、陈毅、李维汉、聂荣臻、李富春、李立三、蔡畅、向警予、傅钟等人。他们到达法国以后，便在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法华工中组织各种社团，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

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常常和华工一起生活、劳动，彼此也互相帮助。

学生们一方面帮华工学习一些文化和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各种工人运动中受到熏陶和影响。加上身在法国，更加容易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旅法学生逐渐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思想观念，转变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起初，在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影响最大的思想便是工读主义。所谓工读主义，是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提出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工读主义者倡导成立“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团”，主张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各地的工读互助团逐渐联合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以创造出一个新社会。基于这种信仰，1920 午 2 月，旅法的一些新民学会成员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为工学励进会。

工学励进会起初是一个工读主义性质的组织，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组织，这种转变是蔡和森等人促成的。

如前文所述，蔡和森是新民学会中旅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之一。在法国，蔡和森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并渐渐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蔡和森有了这样的想法，也开始在法国付诸实践。新民学会先后共有 18 人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之中多数住在蒙达尼，也有一些人散居于法国各地。当时的欧洲百家争鸣，各种各样的思潮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留法勤工俭学青年中，也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为了统一思想，把大多留法青年团结起来，蔡和森和妻子向警予、同学李维汉等人商量，于 1920 年夏季邀请散布于法国各地的 13 名新民学会会员来蒙达尼聚会，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

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正是这一次会议，形成了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股中坚力量，由于他们主要在蒙达尼这个地方开展活动，因此也被称为蒙达尼派。

接到蔡和森等人发出的邀请以后，这年暑假，新民学会会员从法国各地先后来到蒙达尼。7 月 6 日到 10 日，他们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举行了 5 天的会议，专门讨论了信仰什么主义和怎样“改造中国与世界”两个核心问题。在这一次会议上，蔡和森提出要仿效当今俄国，组织共产党，通过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根据考证，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的人，也是中共党内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经过激烈辩论和蔡和森的耐心说服，最后蒙达尼派的大多数会员放弃了工读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为了争取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信奉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蔡和森还向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宣传他的主张。工学世界社也是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组织的，是蒙达尼派之外的另一个组织。蒙达尼会议之后，1920 年 8 月，工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并且不再局限于新民学会内部，而是吸收了新民学会以外的十多人参加，由此也扩大了组织基础。随着人员的增多，世界社也须更加明确自身的宗旨。于是在九十月间，工学世界社的 30 余名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经过激烈辩论，最终决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肖三说：“这个组织已不简单是个学会组织，而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了。”

1920 午冬天，蔡和森又联系了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许多学生，组织了

一个讨论会。大家在讨论会里积极交流各种主义，把真理“越辩越明”。蔡和森认为，等到大家最终达成一致以后，就可以旗帜鲜明地成立一个共产党。

1921 年 2 月，赵世炎、李立三、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劳动学会。赵世炎和李立三最早商量成立一个名为“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但当时的 8 位成员中还有一些并不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所以就改称为劳动学会。它是一个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核心的革命团体。

自 1920 年 10 月以来，法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勤工俭学的学生纷纷失去了工作，1921 年 2 月，蒙达尼校方以拖欠学费为由，要求勤工俭学的学生退学，而华法教育会此时竟也不合时宜地发布公告，“与学生脱卸经济之关系”，这使学生们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此，他们就有关勤工俭学能否成功以及怎样勤工俭学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内部观点尖锐对立。以新民学会的留法会员为核心的蒙达尼派为一方，认为勤工俭学已行不通，唯一的出路是争取政府的经济资助。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的勤工派，则坚持勤工俭学能够实现，反对向北洋政府请求资助。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劳动技能，持之以恒地进行勤工，才能实现俭学的目的。两派的分歧从本质上看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和工读主义的分歧。

1921 年 2 月 28 日，蒙达尼派发动数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举行游行示威活动，高呼着“要读书权”、“要生存权”的口号，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请愿。这次运动之后，勤工俭学学生的内部纷争更趋尖锐，两派每日到处发放传单，互相攻击，勤工俭学学生濒于分裂边缘。针对这种情况，双方的几位主要领导都认识到，勤工俭学学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斗

争的胜利。当时相对中立的周恩来在《勤工俭学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一文中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他还在两派之间奔走，促成联合。

二二八运动实际上也教育了勤工俭学学生需要加强内部团结。蒙达尼派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劳动学会的领导赵世炎、李立三都到过蒙达尼，双方交换意见不止一次。王若飞还来蒙达尼与蔡和森、李维汉等人一起在胶鞋厂做工。通过交谈，双方的观点和认识迅速取得一致，本属于勤工派的赵世炎、李立三等人也逐渐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从事社会革命的思想。这样，本来对立的两派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并且在共同的斗争实践中团结起来，为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1921 年 7 月，就在国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蔡和森与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在法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不久他们就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由周恩来任总支书记，这个组织是中国人在欧洲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建立。各地共产党组织都派出代表出席了一大，只是因为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没有得到消息，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建党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在旅法学生重新团结一致之时，张申府的赴法给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成立带来了直接的契机。张申府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在去法国以前任教于北京大学。1920 年，他和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组织，年底受到吴稚晖的邀请，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当教授，教逻辑学。这一年 11 月，张申府启程前往法国。临行前，陈独秀委派他在欧洲留学生中筹建共产党组织。1921 年二三月间，张申府介绍了刘清扬、周恩来入党，他们在国内时都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与张申府相熟，而且刘清扬是和张申府搭同一艘船来法国的。在北京的时候，李大钊和张申府就很想发展刘清扬入党，但当时她不同意。到了法国之后，张申府成功介绍刘清扬人了党，然后两人一起介绍周恩来人了党。这样，旅法中共早期组织初具雏形。

不久，在法国的赵世炎、陈公培也加入到旅法中共早期组织中。这个党组织的成员包括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赵世炎早在 1920 年就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共产党组织，当年 6 月抵达巴黎。陈公培也是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后来他和施存统各抄了一份党纲出国，施存统前往日本，陈公培就去了法国。1921 年 2 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同张申府接上关系，4 月，陈公培也接到陈独秀的信去见了张申府，这样，由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和周恩来五人组成的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正式建立了。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是受陈独秀委托建立的，其主要成员原是上海、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建立后仍与陈独秀保持联系。可见，陈独秀在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过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巴黎党组织建立后，很快参与领导了 1921 年的数次大规模学生运动。

通过这几次大规模斗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诸如陈延年、陈乔年、陈毅、李维汉等一批知识青年在斗争中转变了自己的世界观，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随着法国各地乃至欧洲各地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共产主义者，统一的欧洲共产党组织的出现便成了一种必需，也是一种必然。

为了建立统一的旅法中共早期组织，1921 年年底到 1922 年年初，由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邀请了一些进步团体的代表，共赴巴黎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各地代表们就“少共”的纲领、组织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根据分工，赵世炎、李维汉等留在法国，聂荣臻、刘伯坚等前往比利时，周恩来等人去德国，分别建立和发展“少共”的基层组织。1922 年年初，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等到达柏林。之前，他们在一次归国中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柏林期间，与在德国入党的中共党员熊雄、张伯简等会合，并且介绍朱德和孙炳文两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

1922 年秋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巴黎的旅法中共早期组织与旅德的共产党组织统一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是张申府。按照当时组织规定，在党员人数较少，尚未成立党的基层支部情况下设通讯员，与中共中心机关保持联系。旅欧党组织由张申府任中共中心驻柏林通讯员，赵世炎任中共中心驻巴黎通讯员和中共留法组组长。继中共旅法、旅德小组之后，1923 年春，在旅居比利时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也发展了共产党党员，有刘伯坚、聂荣臻等。

中共旅欧组织建立后，赵世炎和周恩来分别在法国和德国的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进行筹建青年团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1922 年夏天，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旅欧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旅法、德、比利时的勤工俭学学生代表纷纷到场，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农、肖朴生、萧子璋、汪泽楷、郑超麟、尹宽、任卓宣共 18 人，代表团员 30 余人。在赵世炎主持下，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少共”的纲领和章程，宣布正式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决定由赵世炎担任书记一职，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其后，又增补王若飞、陈延午、尹宽为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宣告旅欧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成立。8 月份，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出版了内部刊物《少年》，专门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报道一系列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消息。

1922 年 11 月，李维汉回国，将欧洲党团组织的情况汇报中央。为了同国内党团组织在名称上取得一致，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来信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应将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是，次年 2 月 17 日至 19 日，“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国内称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因赵世炎等即将赴苏联学习，会议选举周恩来为书记，肖朴生、刘伯坚、袁子贞等为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大会还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新团章。

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支部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当时，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党组织是秘密的，一直到 1925 年 4 月 1

日才公开，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支部的结束。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领导全体旅欧华人开展了一系列斗争活动，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旅欧华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旅欧党团组织建立时，党团员县有 30 多人，到 1924 年间，发展到 200 多人，成为旅欧华人社团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战斗组织。

1927 年 2 月以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大部分优秀干部都回国从事革命运动，留在西欧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人数虽然不多，但仍在所在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为支援国内的大革命运动，为争取中国革命的国际援助而努力工作。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后，滞留在西欧的少数党团员，分别加入了所在国的党团组织，后来成为欧美各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独立的中国旅欧共产党组织从此不复存在。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青年团完成了历史赋予官们的光荣使命。

◎1912 年 11 月，第一批学生赴法前在北京燕喜堂

2. 革命火炬传东瀛——旅日中共早期组织的创立

日本，是近代中国许多有志青年留学的国度。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也是先到日本，再从那里传到中国的。在日本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施存统和周佛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施存统(1899-1970)，又名施复亮，还曾用名方国昌、光亮、子元、施伏量等。1899 年冬，生于浙江省金华一个农民家庭，自小天资聪颖，成绩优异，1917 年考取位于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施存统也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当时，陈望道是浙江一师的一名年轻教员，教授国文。后来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他们师生两个正是事件的主角。

1919 年春，施存统受杭州学生自办的进步刊物《浙江新潮》约稿，根据自身经历和反思，写就《非孝》一文，指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应该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

然而，此文一出，舆论哗然。中国近千年来都尊崇孔门孝道，很多人都认为这番以“爱”代“孝”的言论是洪水猛兽。施存统和支持他的老师陈望道也备受冲击。当局责令校长经亨颐将陈望道革职查办，这种粗暴的干涉自然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很快，这一风潮得到全国声援，当局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收回了成命，但最终施存统还是被迫离开了学校。

离开浙江第一师范以后，施存统到北京参加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组织的工读互助团。就是在这个时期，施存统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不久之后，施存统从北京前往上海。在这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等人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函约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党组织。

同时还考虑到，中国有一大批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很多人也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有必要在他们中间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当时的中国掌生，大部分去了两个国家，一个是法国，另一个便是日本。去法国的原因前文已有说明，选择日本的原因也显而易见：一是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且彼此毗邻；二是日本通过维新学习西方成为世界强国，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三是在日本读书比较便宜，物价不是很高，靠课外打工即可维持生计。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思想，都是先从欧洲到日本，再从日本进入中国。像“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就是从日文中直接移过来的。所以很多中国人纷纷东渡日本。陈独秀考虑在日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也就不难理解了。

1920 年 6 月 20 日，施存统受陈独秀之托，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东京。他的目的，便是争取在日本建立起属于中国人的共产党组织。因此，施存统还特意随身携带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这份党纲草案总共不过十几条，是不久前他自己和陈独秀、俞松秀、李汉俊、陈公培五人一起起草的。

这是施存统第一次来到日本，人生地不熟，不方便开展工作，他和国内的陈独秀等人联系，说明在日本开展活动的困难，陈独秀、李达想起周佛海正在鹿儿岛读书，便告知施存统与之取得联系，共同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

周佛海后来在抗战时期沦为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的第三号大汉奸，而此时却是陈独秀等人眼中大有可为的年轻知识分子。

周佛海于 1897 年出生，湖南沅陵人。1917 年，周佛海前往日本鹿儿岛

第七高等中学读书。1920 年的暑假回国期间，曾滞留上海，因缘结识了陈独秀等人，当时陈独秀正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商讨建立共产党的事宜，需要一些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周佛海恰巧因发表过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而小有名气。所以，陈独秀也邀请了他参加建党的一些谈话活动。在谈话中，周佛海表示非常赞同组建中国共产党。所以此时陈独秀就向施存统介绍了周佛海，让两人一起在日本开展建党工作。

1920 年秋天，施存统和周佛海在日本见面，施存统先把党纲草案给周佛海，然后两人一起商讨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宜。经过磋商和筹划，两人决定先行组成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然后逐渐发展壮大。这样，由他们两人共同组成的旅日共产党组织正式宣告成立。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旅日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

旅日共产党组织始终发展缓慢，组织也不够严密，活动亦不多，只是施存统和周佛海经常给国内写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施存统在 1921 年 8 月，先后在《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周佛海于 1920 年冬季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实用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1921 年正月和 5 月又先后在《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和《夺取政权》等文章。

上海共产党组织决定在 1921 年 7 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写信给在日本的施存统和周佛海，让他们准备出席大会。此时的旅日共产党组织还只有这两人而已，他们就互相推选对方作为旅日代表出席。最后考虑到恰逢暑期，就决定由周佛海作为代表出席一大，并在会上被选为仅次于陈

独秀的副委员长。

大会结束之后，因为周佛海的暑期尚未结束，就留在上海参加了一些党组织的实际活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开始开展发动工人的运动。当时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的工人想学习日本语，周佛海便到工人居住的地方，开了一所日语夜校，他每隔一夜去教两个小时。暑假结束后，周佛海不能不回学校去上课，所以离开上海，回到鹿儿岛。

7 月之后，东京的共产党组织已经发展到十来个人，其中一位就是彭湃，他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于 1896 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他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但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的彭湃，最终却背叛了自己的家庭，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做斗争。为此，家里人痛呼“祖上无德”，骂他为“逆子”。为寻求真理，彭湃东渡日本求学，并于 1918 年 9 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期间，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共产党宣言》、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书刊，并且加入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归国后逐渐走上农民运动的道路，可惜的是，彭湃后来于 1929 年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时年仅 33 岁。

旅日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大多都是留学预备生，小组大概开过两三次会议，详细情形现在已不可考。

1921 年 11 月 12 日至 1922 年 2 月 6 日，华盛顿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凡尔赛和约》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关于海军力量

对叱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因为巴黎和会虽然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方的关系，但它们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日美之间的矛盾尤为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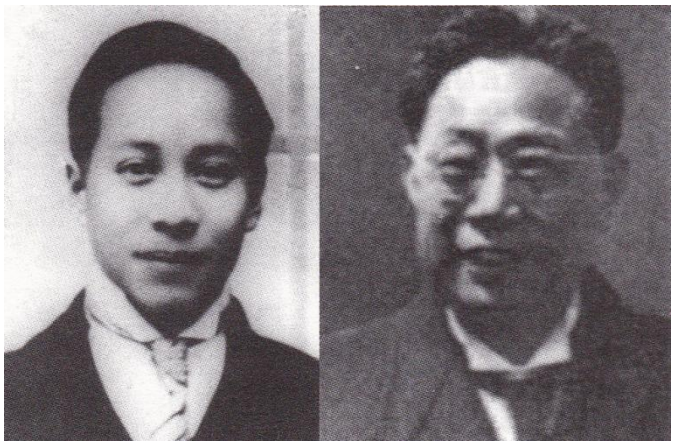
为了反制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径，共产国际针锋相对，于 1921 年年底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会前邀请中国各政治团体代表出席参加。

由于当时苏俄和日本之间尚无外交关系，苏俄方面不便派人去日本通知旅日共产党组织，于是，共产国际选定了时任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的张太雷，派其去日本通知东京小组参会事宜。可是，东京小组的两位成员此时已经处在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前往莫斯科一事，只得作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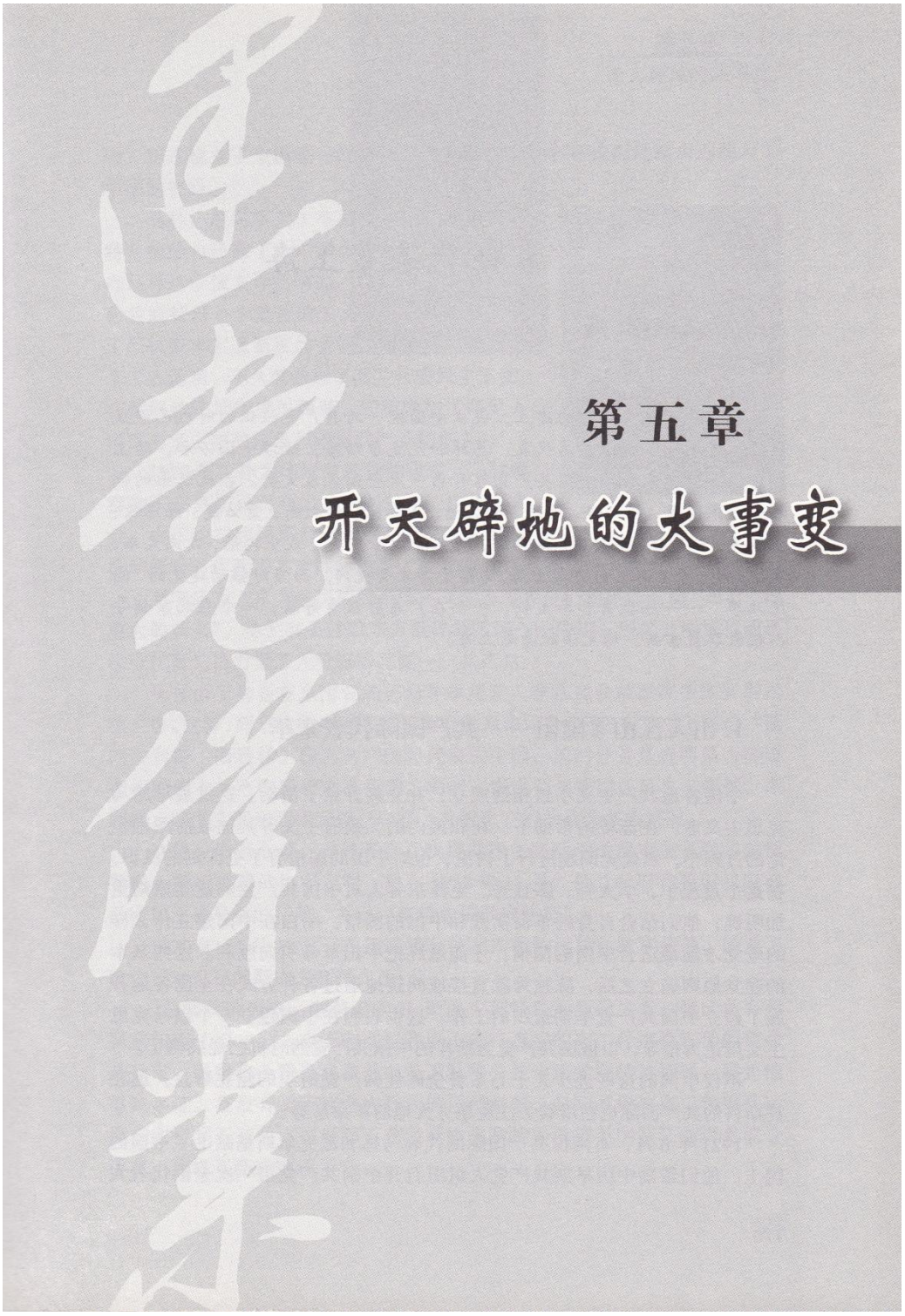
为何日本警察会严密监视施存统和周佛海呢？当时的日本政府十分仇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活动，日本警察对与之有牵连的人都会严密监视。由于施存统和周佛海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活动，当他们回到日本时，已经受到日本警察的暗中监视。1921 年 12 月，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逮捕，翌年 1 月被驱逐出境。在施存统被遣送回国的同时，周佛海则顺利从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升人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由于日本警察的监视和其导师以学籍相威胁，周佛海十分害怕，不敢参加任何活动，天天躲在图书馆看书，并且逐渐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时的他实际上已经和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他们俩之外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或者回国，或者受到监视，不敢从事活动，这样，

旅日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渐渐沉寂下来，最终在 1922 年结束。

日本共产党组织尽管人员少，活动少，存在时间也不长，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八个党组织之一，其地位是重要的，其历史进步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施存统与周佛海



第五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各地代表聚上海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共产国际派出了两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跋涉千山万水，踏上中国的土地，来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出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总共13人，或坐轮船，或乘火车，风尘仆仆，于7月下旬齐聚上海，寄宿于博文女校内。而当时推动建党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个在广东办教育筹款，一个在北京领导八校教职员索薪，均无法脱身赴上海。

1. 出入江山多险阻——共产国际代表来华

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并立刻开始了活动。这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苏俄的帮助下，在和国内的无政府主义等其他政治派别争论的过程中，对建党问题进行了讨论，也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更加明确，他们结合自身的革命实践和中国的国情，明白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党才能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这些基本的建党原则确立之后，陈独秀就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方式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这也表明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克思

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不仅中国的这些进步人士心系着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事宜，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在继续关注着东方大地的革命形势。

1921 年 6 月，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他们帮助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其名字也由此被永远载入了中国的史册。

◎马林

马林，原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孙铎，但是远没有马林这个俄文译名响亮。1883 年，马林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从小就形成了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1900 年，他投身于工人运动，不久就参加了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积极参加了印尼人民反对宗主国的斗争和印尼共产党的创立。

1920 年，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马林曾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他在印尼革命运动中积累了较丰富的活动经验，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

列宁认为，“东方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他们的革命运动”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他尤其关注着东方世界的大国——中国。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代表先进力量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马林由于具备在东南亚的革命斗争经验，非常适合被派往中国开展这项工作。这样，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派马林来中国。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

“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这样一位革命者，自然不会让仇视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本主义列强放松警惕。据所披露的档案表明，早在 1920 年 12 月，荷兰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已密切注视马林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

1920 年 12 月 10 日，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致函荷兰驻华公使，提及了这位行动诡秘的斯内夫利特先生：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 H. 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引者注：今天印度尼西亚）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诉我，我将不胜感激。”

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第二天便复函艾斯敦，信中非常清楚地提供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接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

这样，马林，这个来历不凡的“赤色分子”，1921 年 4 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出现，便被当地的警察逮捕，6 天后获释。但是，维也纳警方对马林下了逐客令——将其驱逐出境，并把他的护照交给外交部，向马林将去的国

家和地区发了通告。

维也纳警察局在 1921 年 4 月 21 日，发出一封致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的信。信中说：“斯内夫利特持有 1918 年爪哇所发的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聘证明之后，斯内夫利特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 1921 年 4 月 21 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杂志《东方经济学家》（引者注：这实际上是一家日本的杂志）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 年 3 月他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英国当局在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港口，对马林进行了严密监视。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甚至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虽然马林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但万幸的是，当时中国政府对荷兰驻华公使的这一提示并未重视，否则后来马林进入中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1921 年 6 月 3 日，马林乘坐轮船驶抵上海港口，刚刚踏上上海的码头，密探的眼睛就紧紧地盯上了他。

此时的马林，年近 40 岁，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戴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他到上海后化名为安德莱森，在与中国人交往时，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来到上海后，下榻在南京路东方大旅社。10 天后，他又住进了上海麦根路 32 号一家公寓。9 月底，马林为了躲避密探的监视，又到了汇山路（即今上海霍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居住，一直住到 12 月 10 日。

当时陪马林一同来中国的，还有马林的同事，即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及其妻子。巴尔斯化名“达姆龙”，当时巴尔斯夫妇也受到密探们的监视。

马林到上海后，很快与 1921 年 1 月来华工作的弗兰姆堡建立了联系，并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

弗兰姆堡，本来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工作。这次来华是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派遣，主要是联络和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工会国际联合会和少共国际一样，是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主要从事红色工会的领导工作。弗兰姆堡来到中国后，就与维经斯基接头。因此，马林来到上海后，也很快联系上了弗兰姆堡。

另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尼克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接替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的。他几乎与马林同时到达上海。

尼克尔斯基，虽然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之一，但由于语言不通，比较少言，所以远没有马林有名气，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了解他的组织关系，查不到他的身世，也说不清他的最终经历。

直到 1989 年，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在当年第 2 期发表了苏联科学院卡尔图诺娃博士的论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人》，人们才了解到这个人物的基本情况。

尼克尔斯基生于 1898 午，原名奈曼·尼克尔斯基·弗拉吉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在与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通信中化名瓦西里和瓦里里耶夫。1919

年到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共产党国际机关行政工作。随后不久，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来中国，赴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旅华朝鲜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召开的代表大会。此外，他还履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职责。可以说，他当时来中国，同时肩负着两项使命。

尼克尔斯基是一位有才能，办事认真，具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到，尼克尔斯基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曾参与派遣了一批中共代表出席 1922 年 1 月莫斯科会议的工作。

张国焘临行前向尼克尔斯基作报告，“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可以马上动身”。尼克尔斯基听后，从自己的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张表面看很平常的纸，这是一张某个商行的公文表格。尼克尔斯基郑重交给张国焘后，对他叮嘱说：“这张表就是您的身份证，上面被大头针压有的印痕，就是暗号。”

接着，尼克尔斯基详细地向张国焘讲述，如何秘密地把这张代表身份的卡片交给规定好的满洲里的一个理发馆的老板，如何接头，然后让这个老板送张国焘过境。正是这样，张国焘才顺利安全地抵达了伊尔库茨克，然后转去莫科斯出席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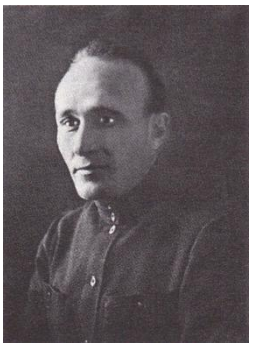
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尼克尔斯基仍然继续为赤色职工国际做工作，曾积极参与了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据包惠僧回忆：“约在（1921 年）8 月初，组织工作方面召集我们开会，张国焘传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尼克尔斯基）的意见：要设立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专管机构，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拟定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纲要。”

马林来华后，通过弗兰姆堡的介绍，与尼克尔斯基立即取得联系。马

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写道:“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 年 8 月到 1921 年 11 月间，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 年 6 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 1921 年 12 月初，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所代表的机构不同，身负的使命也不同。马林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到，他在中国的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研究工作。”“和尼克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而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派出的代表，他的使命很明确，就是代替此前的维经斯基出席并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共成立大会。



◎尼克尔斯基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联系上之后,几乎每天都聚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努力工作着。

2.排难历险齐聚首——各地代表抵达上海

1921 年 6 月，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后，很快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秘密取得了联系。李达和李汉俊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可以和马林很好地沟通交谈。而尼克尔斯基因为母语是俄语，

稍会英语，因此很少发言。

通过多次约谈，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筹建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判断中国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提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如李达后来回忆的：“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 7 月 1 日开幕。”

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法、旅日留学生中的组织或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通知他们派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不因党员人数多寡，派两名代表。

同时，考虑到各地代表来上海路途遥远，经费困难，便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出 100 元当作路费。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的信后，都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建议，选派出各自的代表。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开会通知后，因为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

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缺乏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再加上各地区的政治环境不同，活动特点也不一样，所以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样，各地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北京党组织马上召开会议，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

刘仁静后来回忆了代表产生的经过：“1921 年暑假，我们几个北京大学

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就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张国焘的回忆也一样，表示李大钊当时公务繁忙，无法前往上海出席会议。

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要参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也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他当时只有 24 岁，来沪的时间估计在 6 月下旬。

张国焘一到达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 2 号，拜访了李达、李汉俊。张国焘这样形容李达：“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辞，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对李汉俊他是这样描绘的：“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刘仁静在1921年6月底才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随后，刘仁静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他到上海时已是7月7日左右。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消息》记载说：“高君宇、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并游历沪杭一苇，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刘君拟留沪习德文云。”

武汉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

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大约是7月20日左右。据包惠僧的回忆，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相差无几。由此可以判断，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0日左右。

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

毛泽东后来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提及了一句：“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引者注：何叔衡）。”

谢觉哉在1952年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当时从长沙到上海的交通不便利，只能从长沙乘船先到武汉，然后再换船从武汉到上海。他们于1921年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武汉，然后再由武汉转赴上海。途中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7月4日以后才到上海。

济南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

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了一天。王尽美约集

了几位党内同志，和张国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主要就建党问题交换意见。

张国焘对这个事情作了回忆，一大前夕，他路过济南时，王尽美“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其烦地要我讲解。他们一面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王尽美参加一大时，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材料，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张国焘离开后不久，王尽美、邓恩铭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 6 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包惠僧和陈公博被选为一大的广州代表。

包惠僧原是武汉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1921 年年初，他带着几名青年团员由武汉到达上海，准备去苏俄自学。随后因海路中断，经费也很匮缺，没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与上海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同年 5 月中旬，李达、李汉俊派他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党务工作方面的问题。包惠僧到广州后，无固定的社会职业和收入，陈独秀便介绍他到报馆工作。

关于参加一大事宜，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诲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两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

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

陈公博在 1944 年回忆说：“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选举了我出席。”

这样，陈公博带新婚妻子李励庄赴上海旅游，包惠僧没有同他一起启程。他于 7 月 14 日偕新婚妻子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大约在 7 月 22 日，是最晚一个到达上海的。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也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发出了信。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有在东京的施存统，在鹿儿岛的周佛海。

当时，施存统到日本后功课很紧张，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中共一大。他后来回忆说：“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推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佛海出席（因为周佛海已多年未回国）。”

周佛海已离开家时间较久了，也想回家一趟，便答应了施存统的建议。他等到学校放了暑假，便动身回国。由于路途较远，他到达上海已是 7 月下旬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消息》记载说，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现寓居渔阳里 6 号。周佛海自己也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 7 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

通过以上的回忆和记载，周佛海从日本回到国内，又是利用暑假的时间，所以他到上海已是 7 月下半月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

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曾在1954年2月23日讲述了这一过程：“（1920年）11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引者注：应为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克（引者注：即维经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应为伊尔库茨克）。后来李汉俊困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李汉俊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上海是会议所在地，李达和李汉俊两人就承担了代表大会的联络、筹备和会务方面的工作。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

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

陈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其他代表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铺着红漆地板。

陈潭秋曾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这样写道：“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

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博文女校开办于 1917 年，校长是黄绍兰，她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李汉俊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均是湖北人，有着同乡之谊。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中共一大代表临时住所
——博文女校

李达夫人王会悟承担着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当时，她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黄绍兰等熟识。

博文女校当时已放暑假，有空教室。当王会悟找到黄绍兰校长，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要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博文女校内环境清静，陈设简单，有的房间只有简易的木板床，有的房间只在地上铺了凉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这里。

据包惠僧回忆：“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虏子。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期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

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睡在地上却也比较凉快。

这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志们终于会聚于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3.唯憾独缺二先生——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出席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进行了商讨。李大钊本应作为北京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但是，当时李大钊正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公务繁忙，更重要的是当时他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要领导北京高校索薪斗争，实在无法脱身，所以未能出席一大。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忙于扩充军备，欠薪乃是家常便饭，教育界更是如此。张伯驹在《春游纪梦》中就谈及此种情景：“至徐世昌为总统时财政部每月所费需二十余万元，人员几及二千，而各省税金多被截作军饷，于是薪俸至积欠数月以上。各部情形相同，而以参谋部、教育部为尤窘。财政部仅以发行公债与借款借作点缀，然亦不能全给欠薪。各部人员皆有索薪团之组织。”

从 1921 年 3 月至 7 月，北京国立八校联合起来向反动军阀政府展开了“索薪斗争”。1921 年 3 月，北京教育部已经连续三个半月拖欠各校经费，教职员领不到工资，生活发生了困难，甚至有的教师不得不暂时出卖教辅资料来维持生活。不得已，北京大学于 13 日召开了教职员大会，决定自次

日起全体罢教，选出色括李大钊在内的 11 人做大会决议的执行人。

很快，国立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女子高等师范等另七所学校的教职员加入罢教行列。3 月 16 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 20 人召开会议，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三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股干事。

3 月 19 日，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加派的 8 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一个“教育基金委员会”，拟请从所得税、铁路收入、关余等国家收入中分别拨出若干款项充作教育基金。

4 月 25 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大钊在该校兼课）教职员补推李大钊作为该校代理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由于联合会主席马叙伦因病缺席，自第 24 次大会起，由李大钊连续代理该会主席。

八校教职员的行动得到了各校学生、校长的支持，学生通过多种渠道与教职员联合会联络，并举行了游行、请愿的活动。此外，北京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也举行了罢课，对八校教职员的斗争予以声援。

但是政府方面，却对解决教育基金问题表现消极，迟迟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举措，以致形成了旷日良久的交涉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李大钊曾以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席名义接待了日文报刊《新支那》的记者，他愤然指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政府毫无诚意，纯属万般无奈。在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这种政府只能说是胡闹，谈不到负责

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从 5 月下旬到 6 月初，不断有学生代表到国务院请愿，斗争在持续着。

6 月 3 日这天，李大钊等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及一千多师生到国务院请愿，要求拨发教育经费。不料，总理靳云鹏拒不接见。人群与卫兵发生了争执，卫兵随即用枪柄、刺刀向手无寸铁的教授们施暴，将蒋梦麟、马叙伦等十余人打伤，李大钊也被打昏在地。事后，据 1921 年 6 月 5 日《晨报》报道，请愿师生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密布之军警，即用枪柄肆行殴打．并往来追击，当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遍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

新华门六三流血事件发生后，政府为了推卸责任，竟然反咬一口，连电各省区，诬称八校教职员破坏教育，破坏秩序，靳云鹏还指使京师地方检察厅起诉马叙伦等人。当时，轻伤很快痊愈的李大钊参加了由学生联席会发起的各团体联席会，向全国报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十余团体代表解释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的目的和对六三事件采取的方式，争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声援。

北洋政府在各种压力下，于 7 月 13 日，派范源濂会同前教育总长和另外几位政府大员出面进行调解，提出下列解决办法：讼案听法院处理，政府为六三事件派人向教育界慰问，受伤者医药费由教育部照实支付，政府

筹拨 200 万元证券存放银行为教育准备金并其银行存拨由教育部执管，八校临时费用由教育部按 1919 年预算付给，等等。至 7 月 28 日，各项解决办法一一落实，八校校长通电复职。9 月 1 日开课，次日，八校教职员宣布复职。

长达四个多月的索薪和为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而李大钊因为承担着联络教职员与学生的工作，没有能够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另一位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陈独秀，也因为种种事宜，未能出席中共一大。当时，陈独秀接到李达的信后，回信表示自己不能到会，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于是，他指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出席了中共一大。

当时，陈独秀正在广东办教育，这话说来也长。

1920 年 10 月，陈炯明拥护孙中山率领粤军讨伐桂系，打败桂军。孙中山回广东重组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于是，陈炯明以省长的名义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征求意见。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1)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2)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陈独秀对广东也寄有较大的希望，一直认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于是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的三项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畜经费；(3)行政措施与

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

12 月 11 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表示答应他的条件，“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之前，安排上海方面的工作，把党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由他代理，《共产党》主编职务交给李达，《新青年》主编职务交给陈望道。

陈炯明之所以力邀陈独秀，主要是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与陈炯明产生强烈共鸣。陈独秀认为，新教育的方针应贯穿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即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唯民主义”，即用民主主义教育取代封建主义的专制教育；三是“职业主义”，即用职业教育取代空洞的以伦理说教为主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即用注重体魄和意志锻炼的强身教育取代忽视体育的弱民教育。

陈独秀认为，区分新旧教育的界线在于，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而新教育则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如果教育只是为了给社会增添一两个好人，这并不能使社会变好；除去一两个恶人，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不恶。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前二者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都是妄想。因此，改革教育的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

陈独秀于 12 月 25 日抵达广州，不久即居住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

曲巷 11 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在广东，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深人工人群众中演讲，创办或鼓励支持创办革命刊物。他还指导谭平山、沈玄庐等人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报，为其撰稿，宣传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一致的，批驳守旧势力的种种谬论。

陈独秀把演说看作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常常受邀发表演讲，几乎有求必应，单是 1921 年 1 月间，大型演说就有 7 次之多。2 日，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是什么？》，15 日，在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20 日，在省教育会演讲《教育与社会》，22 日上午，在省立第一中学讲《中学生之将来》，……29 日，在省女界联合会演讲《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从 1921 年 1 月至 7 月，陈独秀还在《广东群报》、《新膏年》、《民国日报》等杂志上发表 40 多篇文章，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的方针。

陈独秀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半年多，刚到广州，便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1)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2)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3)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

此外，他认为，“刷新教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一为招集人才，以谋教育之发达；一为容纳过剩的中级毕业生。因此，他决定以广东高等师范校址筹办广东大学。

陈独秀为加强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委员会由政务委员和事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 8 人，由省长委任 4 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 4 人。委员长由全体委员互选产生，总揽全会事务。省长任命的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

1921 年 1 月中旬，广东省长公署设立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任委员长，主持一切教育行政事宜。教育委员会的主要职权有四项：(1)编定全省教育制度；(2)检查全省教育成绩及监督进行；(3)掌管教育经费及办理预算决算；(4)任免省立教育机关之人员。教育委员会举行会议，议决筹设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机关。

为发展教育事业，陈独秀还制定了教育经费年度核算表。总计费用为 357 万元（不含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 215 万元，社会教育费 90 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 万元。

陈独秀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创办的宗旨是：“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所长由陈公博担任，教员有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等人，“学员是从社会青年中招考来的，分甲乙两级。甲级一年毕业，乙级半年毕业。甲乙两级都有学员五六十人。……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社会教育和逻辑学等”。养成所培养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分子。

陈独秀还开办工人夜校。他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办机器工人夜校。2 月 10 日，广州理发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受邀到会演说，

在谈到工人学习问题时，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

陈独秀还委派袁振英为省立一中校长，支持他首创男女同校，广州省立一中开了全国男女同校的先河，陈独秀还指示袁校长就“男女同校”与汪精卫及守旧派人士激烈论战。

陈独秀在广东教育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及他的言论和活动，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一部分人表示支持，但是遭到了一些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

3 月中旬，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教职员集会，反对该校由国立改为私立，这个决定本来是陈炯明决定的，他认为“广东现为自立时期”，“所有省中各学校当然受其管辖”。但是，旧派职员把矛头对准陈独秀一个人，他们一致呈文陈炯明：若任陈独秀“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排斥愈演愈烈，当时的《广东群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指出有省议会、教育界一部分人物、一班政客、资本家、孔教徒、基督教徒、一般守旧派、少数自号无政府党者八派反对陈独秀。省议会的一些议员甚至公然提出驱逐陈独秀出广东的议案，污指陈独秀主张“讨父”、“废德仇孝”、“公妻”、“妇女国有”，甚至污蔑他宣扬“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陈独秀对谣言进行反击，他在《民国日报》上连续三天登载《启事》：“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态度。”

陈独秀处于广东反对派谣言的风口浪尖上，以致有一次在宴会上，陈炯明郑重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不失幽默地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除了要应付广东教育改革的是非，在教育行政权和经费上也常常被束缚着手脚。当时，筹办大学预科即第一师范，虽然已经开出了预算，也选择好了地点，但是经费没有按期照发。陈独秀在这种情况下，感到“若留恋不取，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

不久，上海方面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中央局工作，陈独秀便请辞，回到了上海。

二、第一阶段会议在上海召开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3 名各地代表，代表了全国 50 多名共产党员。会议气氛热烈，各项议题顺利进行。不料，在第六次会议期间，会场却闯进陌生人，随即遭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和监视。所幸虚惊一场，没有大损失。然而，这节外生枝的事件也使代表们意识到，为保证安全，会场必须转移。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代表们纷纷离开上海，转赴嘉兴南湖的游船继续开会，而陈公博受了搜查和所住旅馆命案的惊吓，偕夫人去了杭州。

1.100 支枪千里革命行跬步——大会正式召开

1921 年 7 月 22 日，代表们先在博文女校内开了一个简短的预备会议。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原来就互相认识，有的第一次见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互相问候和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应当立即举行。

关于一大召开的日期，由于记忆的偏差，大绚只记得是在 7 月份，但

仍不能定下确切的日期，于是就象征性地选择了 7 月的第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

很多国内外专家都根据史料进行了考证，也有很多的说法。他们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写作的时间离大会很近，因此有重要的价值和可信性。开头部分，就很明确地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 7 月 23 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1980 年，《人民日报》载文给出了 1921 年 7 月 23 日的说法。在 1981 年纪念建党 60 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 7 月 23 日。

关于中共一大的会议地址，也经历了一个考察和认证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交代上海市委宣传部，去寻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于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组建了一个寻访小组。寻访小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杨淑慧指出，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叫《往矣集》，就记载了有关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况：“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勃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贝勒路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黄陂南路。几十年来，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寻访小组多次陪同杨淑慧来辨认。有一天，杨淑慧站到贝勒路和兴业路的交叉口，看到了恒福昌面坊的大字招牌，终于认定兴业路 76 号就是李汉俊曾经住过的地方，也就是中共一大的会址。

为了进一步确认中共一大的会址，中共中央又专门委托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李达专程赴上海进行实地考察。李达进入恒福昌面坊后认定：“这是汉俊的家，党的一大就在这里召开。”

由此，最终确定了中共一大的会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李书城和其弟李汉俊的寓所。

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共一大开会期间，他正在湖北主持驱逐军阀王占元的运动。

李氏兄弟的寓所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上海典型的里弄住宅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乌黑的木门上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一眼望去有一种朴实典雅之感。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 8 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 13 人，代表当时全国 50 多名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会场的陈设十分简朴，十几位代表围坐在房间正中的一张长形大餐桌边，气氛庄重。

中共一大本来预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来，于是由预备会推选出的北京代表并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在开幕式上，首先由张国焘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接着，张国焘指出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由陈公博带来的信，主要说了四点：“(1)党员的发展与教育；(2)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3)党的纪律；(4)群众路线。”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把张国焘的一番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偶尔也补充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二十多分钟后，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向中共一大致辞。

马林讲起话来，声音洪亮，侃侃而谈，非常具有宣传鼓动性。他的口才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事后这样回忆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这样评价：“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还强调指出：“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马林上述的一番话是要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刘仁静把这番话翻译成汉语，代表们听后，意见不一，一部分代表认为，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而绝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

马林还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形势，介绍了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以及他

在印尼如何组织和建立印尼共产党。鉴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目前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建议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作组织，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马林还介绍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会见的情况，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代表们听了马林的这番话，个个心潮澎湃，对列宁关心中国革命的精神十分感动。

马林一下子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将近半夜。

马林讲话后，尼克尔斯基开始致辞。因为尼克尔斯基的母语是俄语，仅稍懂英语，而马林稍懂俄语。因此，尼克尔斯基的发言比较简短。

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

关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记载说：“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即马林）同志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克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克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话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中共一大的议程和任务，一

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备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

一大的日程表大致如下：

7 月 23 日开幕，召开第一次会议，制定议事日程并听取汇报。

7 月 24 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听取代表的汇报。

7 月 25 日—26 日休会，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

7 月 27 日—29 日，连续召开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 月 30 日夜，第六次会议因侦探闯入和其后的租界警察搜查而中断。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

张国焘宣布散会。

7 月 24 日，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和所进行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因为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都不是太长，工作也只是初步开展，代表们的报告都比较简短。毛泽东也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其余时间，毛泽东在留心听着其他代表的发言，不时有所心得，做着笔录。

在苏共中央 1957 年移交给中共中央的档案资料关于中共一大的文件中，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从内容上看是这两个地方在一大的汇报稿。

北京代表的报告，在谈到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时说：“在去年 10 月产生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才使他们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在谈到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北京代表的报告最后指出：“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和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向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筝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广东代表报告了广州共产党组织建立的经过和现状，叙述了《群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传员养成所的简况。关于今后工作，谈了吸收新党员、成立工会、成立工人学校、对农民的宣传工作和与士兵的联系等工作的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档案资料中，在谈到关于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时指出：“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三点：党员很缺少，

必须增加党员，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并进行了人员的推选。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他是起草小组成员的当然人选。李汉俊通晓四国语言，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有“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推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还提及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

7 月 25 日、26 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小组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

关于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会前虽有一些酝酿和准备，但由于人员比较分散，时间又仓促，没有形成供代表讨论用的会议文件草案。

开展建党活动以来，曾经草拟过几个简要的党纲。上海、北京党组织建立时都曾起草了党纲，作为接纳党员的标准。1921 年 2 月，陈独秀和李汉俊又分别在广州、上海起草了党章。起草委员会参考这几个最初党纲的内容，并吸取了《共产党》月刊上介绍的外国共产党纲领的部分条文，着手党纲和决议的起草工作。

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起草委员会拿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初稿。

后来，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草案原件，经过会议形成的中文原件，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会议期间又经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搜查，没能保存下来。

现在保存的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工

作计划（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有俄文和英文两种译本。俄译本来自 20 世纪 50 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其中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英译本是 1924 年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申国》的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这两种译本，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但从条文和内容上看基本是一致的，是可信的。

◎中共一大会址

2.奈何节外又生枝——会场闯进的陌生人

7 月 27 日、28 日、29 日，三天连续举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代表们集中精力讨论和研究了党纲和今后的实际工作。

代表在讨论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时，意见基本一致，但是在个别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上海代表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

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后，才能决定。目前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北京代表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他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刘仁静的看法受到与会多数代表的赞同和支持。

但大家在讨论党当前的斗争目标和手段，党员是否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等问题时，发生了分歧。

关于党在当前的斗争目标和手段，上海代表李汉俊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尚幼稚，不懂得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还缺乏思想准备。现在党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知识分子，当革命的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再大力组织教育工作，办马克思主义大学，出版报纸刊物，建立图书馆，组织和教育工人，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在现阶段，共产党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应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北京代表刘仁静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党应该立即向产业工人进军，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目标。无产阶级政党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反对任何形式的公开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大多数代表不赞成李汉俊的意见。李汉俊在没有改变自己看法的基础上，表示可以服从多数人的意

见。于是，在纲领和决议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阶层与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会上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克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共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当时党纲中使用“联合”一词，表明代表们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直到一年以后，在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地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代表们对于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引起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陈独秀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也同意他的意见。不过大多数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足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会议出现的激烈争论做如下记

载：

“代表大会的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能否得到执行委员会许可做官和做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

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形成的条文是：“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也就是说，在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做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公职做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陈公博在英译本这一条上加上了一句注释：“这一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留待 1922 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就是说，这一条尚需下一次代表大会做进二步讨论和决定。

这三天的讨论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基本确定了党的纲领，即最终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这对党的创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几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都没有出席，而由张国焘会后向马林报告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

7 月 30 日晚上，第六次会议仍然在李公馆召开。当日，天气闷热，雨欲下却不下，更显得闷了。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了。周佛海没有来，据说是肚子大痛大泻，无法

出门，独自留在博文女校歇息。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会议讨论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纲和决议。

8 点多钟的时候，会议刚开始，马林正准备讲话。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进李汉俊的住宅，掀开门帘，闯入了会场，朝在座的代表们贼眉鼠眼地扫视了一周。

大家立马警觉起来，问他是干什么的。这个中年男子含糊其辞地回答："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他接着又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并匆忙退了出去。

此处附近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设会长，也没有姓王的人。

马林询问代表们："认识此人吗？"代表们都纷纷表示不认识。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此人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于是，在场的代表赶紧起身先后离去，只留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

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

而马林之前也一直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 29 日晚上的会议上，马

林还提议 30 日的会议应更换一个地方，以免引起巡捕的注意。据周佛海回忆，会议“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的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

现在已搞清楚，当年闯进中共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是程子卿。这程子卿，乃是江苏镇江人，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的私塾。因与黄金荣拜过把兄弟，又臂力过人，虽然不会讲法语，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现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1956 年在上海病死。

代表们快速离开后，大约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就派人包围了李汉俊的寓所，进行了一番搜查。

巡捕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

法国总巡先问：“为什么开会？”

“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李汉俊答道。

法国总巡接着问：“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

陈公博答道：“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那个总巡听后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翻箱搜柜。发现李汉俊的家中藏书很多，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

“为什么家里藏着这么多书？”

李汉俊答道：“我是学校的教员，这些是用来参考和研究之用的。”

“那为什么还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

“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的。”李汉俊从容答道。

法国总巡接着把陈公博和李汉俊隔开，施行侦查。

陈公博不懂法语，于是用英语和法国巡捕周旋。

“你是不是日本人？”“懂不懂北京话？”法国巡捕接连发问。

“我是中国人，自然懂中国话了。”陈公博答道。

“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

“广州。”

“来上海为什么事？”

陈公博答道：“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偕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顺便游玩几日。”并且接着问法国巡捕为什么要来搜查，而且是这样严格的搜查。

那个法国巡捕听后，告曰他实在误认陈公博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

法国巡捕在搜查中并未发现有什么进行政治活动的证据，而室内桌子抽屉里放着的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很乱，字迹不清，搜查中并未引起注意，得以幸存。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写道：“（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被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中共一大会场

经过盘查，他们得知这所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将军的公馆，

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法国警官临走时，对李汉俊进行了一番警告和训诫：“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然后，他们不得不失望地离去。

但法国巡捕却在这所寓所四周布下了暗探，继续对这所房子周围的情况进行监视。

为什么中共一大的会场会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突然搜查呢？原来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当时法租界巡捕程子卿确实是来探查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情况的，各界联合会因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早就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立案侦查。程子卿误打误撞，竟然走进了一大的会场，又看到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聚会，于是马上就回巡捕房报告。

但是，这又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马林绕道来上海的途中，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和警方掌握，并互相致函通报，载人档案。他到上海之后的行踪．一直在荷兰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和上海工部局的监视之下。马林在 7 月下旬频繁出入李汉俊的寓所，很容易地就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

李汉俊的寓所已经不适合继续作为一大的会场了，需要另外寻找一个地方了。

3.力图大业暂离沪——代表们决定转移

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快速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于是穿小巷，走里弄，拐人渔阳里 2 号，来到《新青年》编辑部，也是当年陈独秀的住处。陈独秀去广州后，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夫妇也住在这里。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离开了李汉俊的寓所后，怕甩不掉跟踪者，让法国巡捕盯上代表们，便没有敢到渔阳里来，而是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自回了自己的住处。

代表们在渔阳里 2 号等了两个多钟头，看看外面没有什么异样动静，心里又牵挂着李公馆的情况。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李公馆探查一番。

他到李公馆时，法国巡捕们问话后刚从李公馆离开。陈公博看到包惠僧又回来了，简单地向他述说了刚才的情景，又对他说：“此非善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

李汉俊叮嘱包惠僧，以防暗探们盯上，出门后一定要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出门后，坐上黄包车，不急着赶往渔阳里 2 号。先到了三马路，即今天的汉口路。在那里买了点东西，又七拐八拐，确定后面没有暗探，才折回了渔阳里 2 号。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代表们都焦急得不行，渔阳里和李公馆相距不远，包惠僧去了很长时间，一直未回，大家都担心包惠僧是不是出了什么

问题，他们走后是不是李公馆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包惠僧向大家诉说了法国巡捕搜查李公馆的遭遇，大家无不佩服马林丰富的工作经验，也都为刚才发生的一切捏一把汗！

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没有造成直接的损失，但代表大会不能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为了党的安全，必须换个更加安全的开会地点。

当晚 12 时左右，大部分代表集中在这里，商讨下一步代表大会如何进行。

李达建议:“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吧！我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游人不多又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表示愿意做向导，明天一早就带着大家赶赴杭州。

本来，周佛海因为肚子突发大痛大泄，没有去参加当晚的会议，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时，毛泽东从渔阳里 2 号赶过来，看看博文女校的情况。

周佛海睡得迷迷糊糊地，听到声音，睁开眼睛。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底发生了什么？经过毛泽东的一番解释，才知道一大会场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时，自己的身体也好了些，便和毛泽东一起赶到了渔阳里 2 号。

这时，周佛海提出这个建议。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也容易暴露，在那里开会并不合适。这时，受到周佛海的启发，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也提了一个建议：“我倒是有个主意。”当时，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的代表，但

她帮助代表们找住的地方，并且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可以说是李达的好帮手。

王会悟说：“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嘉兴火车站不远，湖上有游船出租。上海到嘉兴比到杭州少了一半的路程，能省下一半的时间。嘉兴又是个小地方，即使在暑假里，南湖的游人也比西湖少得多。南湖还有一种带篷的大船，租一条就可以载上你们所有人。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

“不错，那里确实很安静，适合开会。”李达曾去游过南湖，同意妻子的看法。

“那儿到嘉兴的火车方便吗？”有代表感兴趣，问道。

王会悟回答代表的问话：“很方便！白天有多趟火车路过，从上海往南去的火车，都路过嘉兴。我每次回桐乡，都是在嘉兴下火车。早上七时三十五分有一趟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时二十五分到嘉兴。上午九时、十时，各有一趟慢车，中午以后才能到嘉兴。另外，下午二时五十分，还有一趟快车，晚饭之前可以到嘉兴。但要到湖上开会，只能在嘉兴过一晚了。”

李达接着妻子的话说：“就目前的局面，要避开法国巡捕的注意，最好是坐上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快车，当天就可以来回，早开早散，安全为要。”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赞同李达的意见和王会悟到嘉兴南湖开会的建议，并且确定会议要抓紧进行，不宜拖延，次日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当晚，代表们就开始进行转移会场的准备。王会悟专程去上海北站，了解第二天由上海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时间，其他代表也分别做了必要的准备。

当时，包惠僧走后，过了一会儿，李汉俊又把陈公博送出门。

李汉俊送走两位后，回身，闩紧前门，锁上后门。进屋，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后来，据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回忆：“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经过这一场风波，李汉俊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就没有去参加嘉兴的一大会议。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人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发现有暗探跟随。当时已是晚上 10 点，路上行人稀少，很难甩掉尾巴。

那暗探紧盯着陈公博，步伐随着陈公博，时而慢，时而快。陈公博一时很难甩掉，但绝不能让这暗探知道他住在哪里。

于是，陈公博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上海夜生活的中心——大世界，他去年回广州时，路过上海，到大世界游玩过，即使夜深时，那里依然很热闹，人也很多，应该是个甩掉暗探的好地方。

那条“尾巴”也叫了辆黄包车紧紧跟随。

陈公博在大世界下了车，“尾巴”也跟着下了车，真是黏人，甩不掉的牛皮糖！

陈公博假装随便逛逛，悠闲地出书场进戏场，逛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时，在人群拥挤处，他突然钻进黑压压的观众群，暗探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就是找不到陈公博的身影。

陈公博很快从另一个门下了楼，马上招手叫了一辆黄包车，催促车夫

快速离去。他坐在车上回头观察着，“尾巴”终于被甩掉了。但他仍小心翼翼，让车夫将车子停在距他住宿的大东旅社隔着一条街的地方。

他急忙来到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上了四楼。

值班的茶房为他打开 41 号的房门，陈公博按亮电灯，他熟睡中的妻子李励庄醒了。

他关紧房门，轻声叫李励庄快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放在痰盂中点火烧掉。这时他终于轻松一口气，但已是大汗淋漓。他把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下半夜，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暂时赶走了难耐的暑气，陈公博好不容易才得以入睡。

清晨 5 点左右，陈公博突然被一声枪声惊醒。这是一起命案，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有如下记述：“这次旅行，最使我终生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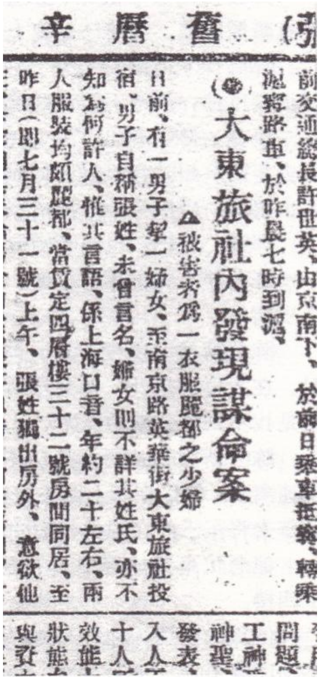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大东旅社处于市中心，发生了这样一起命案，自然引来了不少记者。当时，上海有几家报纸均有所报道。

命案发生的第二天，即 1921 年 8 月 1 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

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上海《申报》在第 14 版也刊载了这件新闻。8 月 2 日，《新闻报》刊载了《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也在 8 月 6 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几十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还根据这篇报道中案件发生的时间，“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来推定法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的时间，进而推定大会开幕的时间。


舊曆辛

前交通總長許世英、由京南下、於前日乘車抵蘇、轉乘滬寧路車、於昨晨七時到滬、

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

△被害者爲一衣服麗都之少婦

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婦女、至南京路英華街大東旅社投宿、男子自稱張姓、未曾言名、婦女則不詳其姓氏、亦不知爲何許人、惟其言語、係上海口音、年約二十左右、兩人服裝均頗麗都、當賃定四層樓三十二號房間同居、至昨日（即七月三十一號）上午、張姓獨出房外、意欲他

◎《申报》报道大东旅社谋命案

发生在陈公博房间隔壁的这起案情大概是这样的：7 月 29 日，星期五，一对男女来到大东旅社。男的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据这男侍役当时留下的五封信中所写，两个人因为不能结婚，所以相约而死，来到这大东旅社。

到了 7 月 31 日清晨，大约 5 时，这案件男主角用 32 毫米口径的手枪朝这位女工射击，一枪没有打死，然后又用毛巾勒死了她。最后，他自己却下不了决心，逃离了旅社，也留下了这桩命案。

陈公博本来是有条件去嘉兴出席中共一大的闭幕会。可不料，陈公博一夜之间两次受惊，先是在李汉俊的寓所受到了法国巡捕的盘问，还遭到了暗探的盯梢，好不容易摆脱了“尾巴”，却又被恰巧发生在隔壁的命案着实惊了一下。

这样，陈公博再也不敢在上海停留。早上，陈公博和大东旅社的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暂时寄存着行李，便偕夫人早早地离开了大东旅社。他没敢把早上的枪声告诉警察，怕警察盘问起来，连昨夜会场的事情都要牵连

进来。

他在通知李达后，偕夫人去杭州散心去了。

◎王会悟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已经在法国巡捕的注意之下，又是外国人，特别引人注目，为了减少意外，他们没有继续参加在南湖的会议。

何叔衡是否去了，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去了。

在确定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后，代表们开始准备行程。为了缩小目标，避免他人的注意，代表们决定分两批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等人，乘头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续行。

7 月 31 日早上 7 时 35 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载着一大代表们，朝南进发。

三、中国革命的航船正式起航

一大代表们离开上海，来到风景秀丽的嘉兴南湖，在一艘画舫上召开了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成燎原之势。中共一大后，各地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还开展了青年和妇女运动。中国革命面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焕然一新！

1.泛舟南湖言壮志——在嘉兴的闭幕会议

在嘉兴南湖召开的闭幕会，究竟是哪一天，因为中共一大会议的原始文件记载不明确，事后据代表们和当事人回忆，众说不一，有好几种说法。张国焘回忆说：“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根据他的这个说法，会议是在 8 月 1 日召开，但据 1921 年 8 月 3 日《申报》的《地方通讯》载嘉兴的消息称：本月 1 日下午 5 时许，忽阴云四布，狂风大作，嘉兴火车站的电杆被刮倒，停在铁轨上的车厢被掀翻，撞毁铁栅、木桩。南湖边的裕嘉总丝厂新建成的 38 间厂房，被吹倒 36 间，压伤漆工 1 名。北丽桥上的桥石，竟被掀下 2 方。8 月 4 日《申报》对嘉兴风灾作了进一步报道：8 月 1 日友生风灾时，“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

性，而溺毙者有三人。狂风有一小时始止”。这样的气候条件显然不适合在游船上开会。此外，在所有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及当日狂风暴雨之事。所以，南湖会议不可能是在 8 月 1 日召开的。

也有人认为南湖会议是在 8 月 5 日举行的。这个说法，源自于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信件》，提道：“您大概已经知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斯穆尔斯基是一大会议参加者尼克尔斯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传话人，有可能这个说法是尼克尔斯基在一大召开前的报告，预定的闭幕日期在 8 月 5 日。当时，一大代表们已经受到了法国巡捕的注意，却仍然滞留在上海，直到 8 月 5 日才去嘉兴南湖开会，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关于 7 月 31 日之说，是目前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认为准确可靠的说法。董必武 1971 年回忆说：“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嘉兴人）租了两只船开的。”刘仁静 1979 年回忆：“记得出事的那天晚上……李达的爱人王会悟说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会吧，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包惠僧在 1953 年回忆说：“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 10 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据查 1921 年 7 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 7 时 35 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到达时间是 10 时 25 分。这一点，与包惠僧的回忆相吻合。

嘉兴是座古城，在秦朝时称作由拳县。到了三国，这里属于吴国，设置了嘉兴县。嘉兴位置颇佳，处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逐渐就繁荣起来。

南湖位于嘉兴市区东南南湖路西侧，面积大约 41.6 公顷，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旅游区，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合称浙江三大名湖。南湖因地处嘉兴城南而得名，与西南湖合称鸳鸯湖，素来以“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迷人景色著称于世。

南湖本来是一片水域，并没有湖心岛。在明朝嘉靖二十七年（即 1548 年），嘉兴的知府修浚城河，挖出的泥无处安放，于是用船运至湖心，堆成了一个人工的小岛。

湖中小岛呈圆形，面积约 1 公顷，岛上有以烟雨楼为主体的古园林建筑群。烟雨楼始建于五代，原址在南湖之滨，明朝嘉靖年间迁于湖心岛上，现存为 1918 年重建之楼。清以后又相继建成清晖堂、孤云移、小蓬莱、来许亭、鉴亭、宝梅亭、东和西御碑亭、访踪亭等建筑，形成了以烟雨楼为主体的古园林建筑群，亭台楼阁、假山回廊、古树碑刻，错落有致，是典型的江南园林。

南湖由运河谷渠汇集而成，气候湿润，雨量丰富，常常是晨烟暮雨，烟雨楼由此而得名。此外，在南湖周围散落着其他一些景点，如西南湖、揽秀园等。

南湖名声逐渐远播，清朝乾隆皇帝尤爱那烟雨楼，当年他六游江南，曾八次登南湖烟雨楼，诗兴大发，赋诗近 20 首。

1912 年冬，孙中山路过嘉兴时，在兰溪会馆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后，也慕名游南湖，登烟雨楼，还在楼下留影，以传后人。

南湖确实是那江南佳境，美不胜收！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旅程，上午 10 时左右，分两批坐车的代表们相继到

达了嘉兴车站。

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了两间客房，又委托旅馆账房代租了一艘画舫。第一批代表到了嘉兴后，先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

期间，王会悟带着几个人登上了南湖的名胜烟雨楼，观察周围的环境，选择画舫划行路线和停靠地点，为大会做准备。

不久，第二批代表也到达了嘉兴。于是，大家一起来到南湖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画舫，是文人墨客对于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叫它“丝网船”。据说，南湖里本没有画舫，都是些敞篷小船，仅能乘坐三五个游人而已。而这“丝网船”，本来是在太湖里拉网捕鱼用的，但是收入一般。

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何时起，不知何人开了这个头，这太湖的渔船来到了南湖，改了行，成了专门的游船。空间大，载的客多，坐着舒服，颇受南湖游客的欢迎，收入也多了。

于是，好多艘“丝冈船”纷纷从太湖南下，来到了南湖，发展成了旅游船，也成了当地的一景。

这些船，为了招徕客人，船主可谓用心良苦。船上雕梁画栋，陈设考究。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中舱内铺上红漆地板，摆上红木太师椅、八仙桌，便于游人饮茶用饭；后舱是供游客小憩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代表们登上的这只游船，当地叫“单夹弄丝网船”。游船长约 16 米，宽约 3 米，船头平阔，内设前舱、中舱、房舱、后舱，以右边一条夹弄贯通：中舱顶上有气楼、悬明灯，当中一张八仙桌，周围安置茶几、椅凳，

会议就在中舱举行。

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上备好了酒菜，以游山玩水作为掩护。

王会悟也扮成了歌女的模样，先是到后舱和船老大打了个招呼，接着来到前舱，坐在船头遥望，充当会议的“哨兵”，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报告中舱的代表们。

这天上午，天气阴转小雨。起初湖面上还有些游人在划小船游览。天空的云层逐渐堆积，浓黑，到了 11 时许，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幽安静。

细雨中的南湖，别有一番情趣。代表们乘坐的画舫在湖面上缓缓划行。在这清幽的景色中，一个历史性的会议又开始了。

这次会议继续 7 月 30 日晚上被打断的议程，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在李汉俊公馆，被法国巡捕搜查时放过的党纲草稿，这时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不在场，不用翻译他们的发言，而且常常因持异议而唇枪舌剑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也不在。再加上上海会场发生的状况，代表们想在这一日内结束会议议程。这样，整个讨论的过程，进行得比较顺利。

偶尔有别的画舫经过时，代表们便“哗哗”地洗起桌子上的麻将牌，做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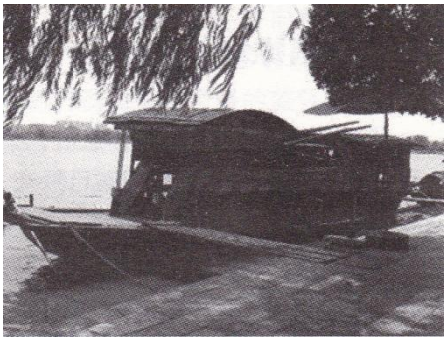
中午时分，一艘小船驶近。船娘递上鸳湖旅馆订好的饭菜。于是，代

表们借此歇息一番。

南湖的鱼、蟹、虾，味道鲜美可口。尤其是那长得像元宝一样的菱，不像别处的，竟然没有角，乃是南湖的特产，叫做无角菱，又叫馄饨菱，肉多味甜，实乃一大享受。

这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南湖的画舫，在 1937 年 12 月日军占领嘉兴之后，都被拉去当运输船，毁于战火。从此，南湖上再也见不到那一艘艘精美的画舫，至此已绝迹。



◎中共一大会场：嘉兴南湖游船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在南湖湖心岛筹办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建立后，许多中央领导人和知名人士曾来南湖参观。

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画舫中召开，没有画舫供后人瞻仰，生动地展现当时一大的场景终是憾事。

于是，有关的工作人员找了许多当年的摇船人、船娘开座谈会，回忆当年画舫的模样，又派人到无锡，找那些造过“丝网船”的老工匠，仔细询问当年的船的样子。这样，综合了这么多人的记忆，画出了图纸，做成了模型，送往北京审查。

模型得到了认可。1959 年，中央专门拨款 3 万元人民币仿制了画舫，还另拨黄金二两，供舱内装饰之用。

经过老工匠们的精心建造，一艘崭新的画舫出现在南湖。这艘画舫系在湖心岛畔，装了跳板，供瞻仰者进舱参观。作为一大会议的纪念船，停

泊在烟雨楼前的水面上，向人们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

1964 年，董必武重游南湖，步入画舫，连声说：“很像当年那艘画舫，仿制很成功!”他仔细察看纪念船后，欣然题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1985 年 9 月，邓小平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题写馆名。1986 年 1 月，胡耀邦题写了“中共一大会址”。1991 年 3 月 18 日，彭真登临纪念船，深情地说：“这船不大，但前途远大，有了这艘船，才诞生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画舫从供内部参观到公开展出。这条一大纪念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南湖红船”。

2001 隼 6 月，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一唱雄鸡天下白——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

代表们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会议继续进行。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

当时，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经在上海的会议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这次会议首先通过的便是后来分别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从苏联转来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从英文稿和俄文稿译成中文，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引人注意的是，英文稿和俄文稿都缺少了第十一条，全文内容如下（俄文稿）：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的地方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时，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的委员会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起过十人

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遗漏）。

“十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列。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画舫里，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党的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和安排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讨论结果形成了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部分，即：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代表们在讨论党的今后工作时认为，党必须集中全力投入实际工作，考虑到当时党员人数少、力量较薄弱，应以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任务，并提出了任务、方针和要求，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每个地方，

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产业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使工会避免成为其他党派之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尽快进行改组工作。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能成立工会，而且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两人到该工会去工作。”

代表们还认为，各地、各行业应组织“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为了总结工运经验，还应成立工会研究机构，“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而“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应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思想”。“机构的研究工作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

会议对党的宣传工作作了讨论，要求全党继续大力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为了出版更多的共产主义普及读物，“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同时，“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会议还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报纸、杂志上的影响，提出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组织纪律观念，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严肃性，“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

工作，均必须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管理之下”。“不论中央或地方任何出版物，不得登载任何违反我党主义、政策及决议的文章。”

在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讨论中出现了短时间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派别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在行动上与其他派别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会议最后在《决议》中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的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会议在党与第三国际关系上有如下决议：

“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

“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之后，会议又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这份事先起草的简短宣言，大约 1000 余字。讨论中对孙中山的南方国民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议。

包惠僧认为，孙中山好说大话，被称为“孙大炮”。国民党代表资本家的利益，是一个堕落腐化的集团。南方政府也同样搞军事独裁，广州满街都是“无兵司令”，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

但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包惠僧的意见，认为孙中山从成立同盟会以来，

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陈潭秋在《共产国际》1936 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有如下记述：“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在讨论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时，曾发生过小的争论，包惠僧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他说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他的意见，被大会打击以后，当时通过下面原则：对孙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对于某些进步的运动，则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他。这一原则的决定，可以说对于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发展广大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运动，种下了一种根基。”

会议最后确定把宣言问题交由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由于当时处于秘密状态，后来《成立宣言》没有公开发表。

据李达后来的回忆说：宣言草稿“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京

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了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京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了下落）”。

时间悄悄地流逝，下午 5 时左右，天气已经逐渐转晴。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人数少，各地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这时，传来一阵“突、突、突”的晌声，一艘机器艇出现在湖面上，向着画舫驶来，难道是当地政府的巡逻艇？代表们立即提高了警惕，收起会议文件，“哗哗哗”地搓起麻将来。

不过，汽艇只是从画舫侧旁经过，经过向船工了解，才知道这是本地士绅的私人游艇。

一场虚惊！会议接着进行！

中央局书记，当时非陈独秀莫属。作为《新青年》的创始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享有很高的声望。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有一段描述：“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

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下午 6 时左右，南湖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大会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代表们在闭幕时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完成了使命，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乘坐最后一班火车返回上海，到达上海时已是夜深人静时分。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除了一大会场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搜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它将划破黑幕笼罩的天空，带来那光辉灿烂的黎明。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和决议

3. 星火燎原赤县天——焕然一新的中国革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共一大会议后，全国 50 多名党员肩负起改造中国的重大责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马林和党内同志都普遍希望在广州任职的中

央局书记陈独秀及早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推动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全面开展。马林还派包惠僧亲自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并请他回上海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

包惠僧后来回忆说：“一大以后，中共即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周刊》，开展向工人群众进军的活动。接着马林建议陈独秀要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职务，回上海就任中央局书记职务。党中央商定派我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会议惰况，并请他回上海工作。我即去广州，见了陈独秀，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他也同意马林的建议。这时他在广州的工作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如许崇智、古应芬这些人有排外的特性，无政府党人如朱谦之、区声白等对我们肆意攻击。”

陈独秀本来就是为了推进广东的革命事业而去广州的，再加上当时广州的情势，因此，他欣然接受了马林的提议。

8 月 17 日，陈独秀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很快从广西桂林回电：“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对陈独秀表示了“极力挽留”。陈独秀看辞呈不获准，只能借口要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陈独秀于 9 月回到了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11 月，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对近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宣传工作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1)依团体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

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两千团员。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2)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3)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和上海以及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一大的决议和这一通告的计划和要求，迅速着手进行各项工作。

在党的组织方面，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各地党员数量得到增加，党的组织得到健全和发展，党的队伍不断壮大。

上海党组织行动最快，在中央局通告发出的当月就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由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担任书记。1922 年 7 月，又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的工作，委员有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三人，徐梅坤任委员长（即书记），沈雁冰负责宣传。至 1922 年 6 月底，上海已有党员 50 名，超额完成了中央局发展党员的要求。

北京党组织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尤其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1921 年秋，仅在长辛店就发展了史文彬、

王俊、杨宝昆等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不久，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罗章龙任组织委员，高君宇任宣传委员，李梅羹任财务委员。北京地委机关设在北京大学沙滩红楼。随后又在天津、张家口、唐山、保安等地发展党员，建立中共支部。

在湖南，党的发展工作积极而又严密。毛泽东、何叔衡出席一大返回长沙以后，立即着手发展党的工作。1921 年（民国十年）10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他曾称这一天为“三十节”。随后又在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党员，并先后成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半年多时间，湘区（包括江西萍乡、安源）的党员已达 30 人。1922 年 5 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隆郅（李立三）为委员，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 22 号。湘区委员会的党务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取得的成绩在各区中较为显著、突出。此外，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运行良好。他们以《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为教材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次举办公开的马克思学说讲演会。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作报告，评论各地党的工作时称赞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中共一大召开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传达了党的一大决议，先建立了党的临时领导机关。1921 年冬，包惠僧奉命返回湖北工作，并成立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1922 年年初，武汉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包惠僧任区委书记，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任区委委员。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以武汉中学、湖北第一师范学校为阵地，在学生中培养了许多革命积极分子，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包惠僧和陈潭秋也经常深入工

厂，调查工人疾苦，组织工人识字班，进行革命宣传，他们还在工人运动中挑选和培养党的干部。

陈公博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回到广州，传达了大会精神，宣告中共广东支部成立，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任组织委员，谭植棠任宣传委员。1921年秋到1922年6月，广东党组织的革命活动有了进一步扩展，当时党员已有十多人，经常召开党组织会议。1922年，党组织深入工人中间，在机器工人中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并从中发展工人党员。

王尽美、邓恩铭回到山东后，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党员有十多人，王尽美任书记，邓恩铭等人任委员。以后山东区支部又扩建为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努力下，不久，胶济铁路沿线的青岛、张店、淄博等地方，都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山东的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周佛海在中共一大后，在上海代理中央局书记，与马林多次接触，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也是在这段时间内，他的一段婚外恋搞得满城风雨。张国焘曾在回忆中记述了此事：“周佛海和那位富商的女儿及其家庭的来往日益密切，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急于要同杨淑慧一道去日本留学，并忙于准备结婚的事。他对于党的工作不再积极，在我们以后几次会议中，再也看不见他那种活泼积极的神情，听不见他那充满热情的论调。他觉得同志对他的恋爱所采取的态度过于严峻，更加影响了他的心理，由对中共热情的消失，而脱离组织，进而成为抗战时期南京汪伪政权的要角。”而施存统当时仍留在日本，在东京留学生中发展了杨嗣震、林孔

昭等人入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法国积极开展建团、建党的活动。1921 年冬，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建立旅欧少年共产党。1922 年 6 月，茬法国巴黎西郊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后正式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 年冬，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共党员，在法国巴黎统一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有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输送了大批的干部。

这样，从中共一大到二大短短的一年内，中共地方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截至 1922 年 6 月 30 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统计，各地中共党员人数如下：上海 50 人，广东 32 人，湖南 30 人，湖北 20 人，北京 20 人，山东 9 人，河南 8 人，四川 3 人；另有留俄学生 8 人，留日学生 4 人，留法学生 2 人，留德学生 8 人，留美学生 1 人。共计 195 人，其中工人党员 21 人，女党员 4 人。随着党组织的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第六章

完成建党伟业

一、中共二大的召开

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经过一年的工作开展，逐渐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共二大召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行动指南。马林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提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经过西湖会议的激烈讨论，陈独秀等人在两项条件的基础上统一了意见，同意了马林的建议。国共两党开始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

1.思想成熟重国情——陈独秀认识的转变

陈独秀一到上海，很快地就担负起了领导工作，主持中央局工作。

然而，他在上海很快就同马林发生了矛盾。一方面，因为互不了解；二是两人各有个性，火气都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二人对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不同意接受第三国际对各国支部进行高度集中领导的体制，因此目前也不必要接受国际的经济援助。

包惠僧曾目睹二人之间发生矛盾的过程，回忆道：“到了上海，第二天马林与陈独秀开始会谈，接连谈了两次，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有分歧。马林按照第三国际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

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暂时保持中俄两党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此时张太雷已到上海，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正遇见陈独秀与张太雷谈话，张太雷正以马林的口气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这一期间，法租界巡捕房已经掌握了陈独秀的一些政治活动的情况，准备寻找机会对他采取行动。

1921 年 10 月 4 日下午 2 时许，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说是要找陈独秀。当时，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正在陈宅聚会。

杨明斋一看这几个人的打扮，就回答：“陈先生不在家。”

这几个人听了，还要往里闯。包惠僧要拦住他们，其中一个尖嘴猴腮的又赶紧说：“我们要买几本《新青年》。”

包惠僧回答：“大自鸣钟下有得卖，那里是专卖《新青年》的。”陈独

秀在楼上听到楼下的吵闹声，知道情况不是很妙，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经有人把守，陈独秀只好又退了回来。

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把陈独秀和他的夫人高君曼以及在场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 5 人，带回了法租界巡捕房，陈宅的《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到了巡捕房，一位巡警让他们填名字、职业及与陈独秀的关系。陈独秀填了王坦甫，其他几人见状也都纷纷填了假名字。

巡捕房见陈独秀没有抓到，于是就在渔阳里 2 号留了几个便衣，继续监视，只要是到陈家的人都抓起来。

不久，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去陈家访问，也被巡捕房的便衣抓起来了。

到了巡捕房，褚辅成被带到里间，陈独秀一见褚辅成，忙摆手示意不要叫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陈独秀的身份一下子就暴露了。巡捕房查清褚辅成和邵力子的身份后，将两人释放，其余人均被关人牢房。

陈独秀被捕以后，党内同志和国际代表从多方面开展了营救工作。李达曾发信给各地区党组织，通报了情况并要求组织尽力营救，张太雷专程为营救工作从北京赶到上海，孙中山也从广州打电报给法国驻沪领事，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为了营救陈独秀等人，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叫巴和的法国律师，承办了这个案子，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

二十多天后，法国会审公堂才开庭审讯。开庭之日，巴和律师出庭辩护。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 5000 元而结案，前后共用了两个多钟头。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算是共患了一次难。

陈独秀本来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马林为了救他，出了大力，二人的感情增进了很多。之后，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陈独秀重新投人中央局书记的工作中。11 月，他向全国各地区党组织签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对近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宣传工作等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这期间，陈独秀很重视工人运动。1921 年年底，蔡和森、李立三从法国回到上海，陈独秀将蔡和森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从 1921 年 11 月至 1922 年 5 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尤为重要的一篇是 1922 午 5 月 1 日在《先驱》第七号发表的《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是当时对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篇纲领性文献。文章一开头就指出，“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及其最终目的，阐明了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益的关系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逐渐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国情和中国问题，逐渐认识到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会议对中国山东问题的解决，引起了国内不少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中国共产党及时向人们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本质，陈独秀撰写文章，指出：华盛顿会议可能是“弱小民族大大的不幸”，“可怜被压迫掠夺在此同盟势力之下的弱小民族，在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成功以前，绝没有一日能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铁蹄和算盘蹂躏的”，为此，他大声呼吁：“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领导之下，中国工运逐步趋向高涨。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陈独秀在 1922 年 4 月下旬来到广州。5 月 1 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大会，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5 月 4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学说，还要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同时，“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

1922 年 6 月，陈独秀发表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然后陈独秀根据中国经济上的半封建性、政治上的半殖民地性的特点，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结论：“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

在文章中，陈独秀还确定了第一阶段的革命目标：“(1)倾覆军阀及卖国党，尤其首先要惩办勾结卖国党或希图割据的军阀，以实现国内和平与

本部统一。……(4)制定保护农民工入的各种法律。”此外，陈独秀还表示：“我们知道民主主义的争斗仅是第一阶段争斗，不是人类最后的争斗；……在中国政治的及经济的现状上看起来，我们势不得不希望代替更罪恶的军阀政治之民主的政党政治能够成功。”

这样，表明陈独秀已经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应首先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为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创造了条件。

2.革命增筑民族魂——制定党的最低纲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在组织、宣传和工人运动等方面的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特点，尚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当时，党内不少同志对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总目标是明确的，但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的认识是模糊的。

进入 1922 年以后，党开始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分析和研究。当时《先驱》曾明确提出，当前我们必须“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922 年上半年，是中国共产党酝酿和形成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时期。

为制定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革命导师列宁和共产国际也曾给予很大的指导和帮助。1922 年 1 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团体的代表共 39 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揭露和谴责了华盛顿会议的罪恶图谋，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

论，指明了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创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会后，列宁还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代表，并希望两党携手合作。

在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已经在这两个会议的文件中提出来。全国劳动大会宣言提出：“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很多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时常压迫我们，杀戮我们的领袖，枪击我们罢工的弟兄，禁止我们的罢工，剥夺我们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我们认定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我们现在是需要这种自由的，而且我们不能忍受那种压迫和杀戮，我们要结合全国农人，至于小资产阶级暂时联络，共同向着那些敌人奋斗，争得我们的自由。”

青年团的一大制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指出“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使中国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和失业日甚一日。纲领对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提出三条政治方针：“(1)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2)工人和农人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3)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有绝对的自由权。”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局正式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先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性质，指出“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就使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成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接着，中共对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主张，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评论，指出这些空想的改良，绝不是挽救时局的正确主张。提醒农民、工人、学生和小资产阶级，“万万不可听从资产阶级学者政客的妥协的伪和平论”，必须认清“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挽救中国时局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它提出了进行民主革命的鲜明政治主张，指出：“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接着又提出 11 条目前的奋斗目标，核心内容是“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法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等。

在这一重要文献中，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已具雏形，为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做了必要的准备。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对中国国情与中国民主革命问题认识的深化，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成为客观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 1922 年 7 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共二大的筹备最早开始于 1921 年 11 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明年 7 月”召开。会议的地点，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提到，中共中央局考虑“如在上海，显然

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摩擦之说已甚嚣尘上，加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到了 1922 年 5 月中旬，广州局势已经十分严峻，因此会议地点仍然选在上海。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一周年之际，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党在自己的诞生地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代表共计 12 人。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施存统、王尽美等 12 人，代表全国 195 名党员。

毛泽东当时也曾到达上海来参加这次大会，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出席呢？

内中有各种说法。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述了 1936 年毛泽东同他的谈话，他对斯诺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这确实是一件憾事。

鉴于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又接受了一大遭受法租界巡捕搜查的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二大以小型的分组活动为主，全体会议的次数不必过多。小组讨论分别安排在党员家中，有必要召开全体会议时，也必须每次会议都变换会址。这样，在 8 天的会议中，共开 3 次全体大会，3 次大会的地点都不相同。

7 月 16 日，中共二大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今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召开。当年是李达的寓所，这是一幢一上一下坐北朝南的石库门旧式里弄房子，楼上是书房和卧室，楼下是小客堂，第一天的

大会就在楼下的客堂里举行。那里一排排的石库门房子完全是统一格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蛟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不易辨出哪家哪户，比较安全。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大会。首先他代表中央局报告了一年来党的工作概况，着重提出了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和策略。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现状，当前还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现在，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首要的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那时，资产阶级能得到发展的机会，无产阶级也可以得到一些权利和自由，并进一步成长壮大起来，有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够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接着，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远东各圉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说：“中国革命属于殖民地革命的范畴。这个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主体是资产阶级。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应当援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使它早日获得胜利。民主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可以很快发展起来，无产阶级同样可以很快发展起来。只有到了这时候，无产阶级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然后，施存统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中共二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是在英租界的另一个地方举行的。

会议首先讨论一年来党的工作，肯定了党在发展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批准了中央局的工作报告。

会议接着讨论了党在现阶段革命中的方针政策。多数代表认识到中国当前不可能实行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

会上，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问：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现在我们却要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使敌人掌握政权，反过来压迫无产阶级，这不是一个矛盾吗？大多数代表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党的民主革命方针与党的根本目标是不矛盾的，因为进行民主革命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联合资产阶级也不是投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固然使资产阶级获得利益，工农群众同样可以得到一些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加强本阶级的力量和地位，这种暂时的联合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是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会议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大会宣言，阐明党的政治主张，并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宣言和有关文件。

7 月 23 日，二大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仍在英租界举行，但又变换了一个会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民主的联合战线”、”工会运动”、“少年运动”、“妇女运动”、“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九个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所以，强调了党的“铁的纪律”：“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中共二大还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这与中共一大决议中的规定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共二大的中心议题和突出贡献，在于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内容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后文称《宣言》）中。这一宣言是由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成的起草小组起草的，陈独秀执笔，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

《宣言》分为三部分：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革命纲领。

《宣言》首先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环境，回顾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指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

一定要并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地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宣言》在分析了国际形势以后，接着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分析了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特点和政治态度，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指出了构成中国社会性质的两个因素：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它们操纵的”，这就浃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另一方面，中国“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又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

《宣言》着重分析了中国军阀政治的最新状况，指出：“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张作霖之割据东三省，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因此，“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

《宣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认清了反帝反封建是各阶级的共同愿望，又看到了民主革命的群众力量。更可贵的是已经提出了工农联合的设想，指出“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最后，《宣言》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

和最低纲领。

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二大还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初步的阐述，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已经形成，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行动指南。

当然，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只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摆在民主革命参加者的地位。

尽管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不是成熟的、完善的，但它无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际的初步结合。

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圆满完成；中共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但是，一大未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现阶段

革命纲领，二大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很大指导作用。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聚集和团结了革命力量，使社会各阶层联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展开英勇斗争，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做了准备。

3.同舟共济万里航——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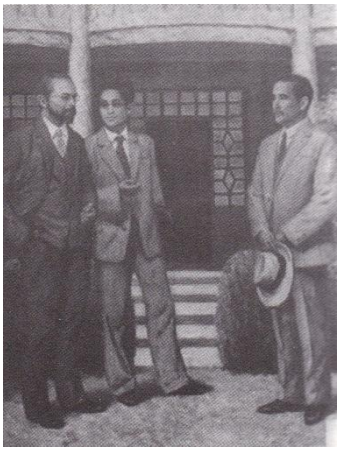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初建时，对于如何开展革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1920 年，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1922 年一二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还在病中的列宁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工人代表邓培，向他们提出了国共两党有没有可能实现合作的问题。

最早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的人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中共一大后不久，马林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局面曾一度感到悲观和失望。他在 1922 年 7 月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介绍说：“在上海，我是在极为不利的

条件下开始工作的。该城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凡尔赛和约》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强烈冲动，已经完全消逝，学生运动的领袖们从中国政府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因此，学生的组织从那时起也就变得没有价值了。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工人运动的障碍。……产业工人仍然是中国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在上海建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但是，在上海本地区还没有能建成一个有影响的现代组织。因为共产党秘密地工作，它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它同华南的国民运动没有保持联系。”



◎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会谈（油画），张太雷（中）为翻译

同时，马林认为，“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没有像俄国农民和印度农民那样的阶级斗争，也不像印度和朝鲜农民那样必须缴纳重税。因此，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中国“整个生活从政治上看仍在外国势力控制下，还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阶级能在当前这个时代指出前进的方向”。

然而 1921 年年底到 1922 年年初他的广东之行，使他看到了希望。马林于 1921 年 12 月 23 日在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随行的有充当翻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太雷，两人进行了三次长谈。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份报告中说：“我认为，这次南方之行是我在中国最重要的时期。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

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

这样，马林根据他在印尼取得的成功经验，在 1922 年 3 月底时，他来到上海，明确地向陈独秀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应改变对国民党排斥的态度，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合作，并采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联合的形式实现联合，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

但是，这一建议遭到陈独秀及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陈独秀认为国民党部不重视民众的发动，而只依靠军阀联甲倒乙、联丙倒甲的军事冒险，批评孙中山“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黏附在利用南北军阀冲突的机会上面”，认为国民党“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他甚至说：“宁死不加入国民党。”

因此，1922 年 4 月 6 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亦即“吴延康”），提出 6 条理由反对加入国民党，要求倘若共产国际问起这件事，请他代为陈述。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引者注：陈独秀原信竖写）：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出席远东会议的中共代表回国了，中共领导人了解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

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了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倡议。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但这时，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国共两党党外联合的政策。

而当时，马林见一时还不能说服陈独秀等，便于 1922 年 4 月回莫斯科述职。7 月 11 日，他向共产国际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中共应该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采纳了马林的意见。

7 月 18 日，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直接打印在马林的衬衣领子里，维经斯基用钢笔在上面签了字，并加盖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钢印，内容如下：“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

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引者注：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

马林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全权委托命令，抱着“尚方宝剑”，与新任苏俄政府驻中国特使越飞一起赶往中国。

8 月 14 日，马林到达上海，即向陈独秀、张太雷等中共领导人出示了这个共产国际的指令，并提议马上召集会议，具体讨论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

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22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

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他的论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绝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和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绝不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

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

多数中央委员坚持反对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和蔡和森强烈反对马林的这种主张，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

陈独秀也反对马林的主张，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是，陈独秀也表示，如果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可以服从，但要对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取消加入国民党要打手印和宣誓服从孙中山本人等封建主义的形式，二是国民党必须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进行改组。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坚决反对”。

李大钊基本上同意马林的“党内合作”意见，同时对于陈独秀提出的两个条件也表示赞同。

这样，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和马林的耐心说服，会议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林的建议。

最后的结果：一是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二是要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要取消入党时打手印的形式，国民党须进行改组。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按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中共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西湖会议是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一次决策性会议。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和林伯渠等在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具体途径，与孙中山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以个人名义第一批加入国民党。

1922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5 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上，刘仁静作为代表发言：“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1923 年 1 月 12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做出的决议，决议写道：“一，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一方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二，由于国内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而工人阶级又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互相配合行动是必要的。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四，但是，这不应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

1923 年 2 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震动，许多共产党员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更切身的认识，

党内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正如蔡和森所说：“二七惨案以前，工人运动处于勃兴耐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马上成功。二七惨案后却不同了，许多党员由此得到教训：‘工人阶级独立的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必须有各阶级的援助。’”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政策，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批评了张国焘等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左”的倾向，同时也不同意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的偏向。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其他 8 个决议案。

其中，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是最重要的一个决议。决议首先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情况和革命任务，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决议案还分析了国共两党的社会地位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做出了几项重要规定：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

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

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以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解决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真正得以实现。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猛醒，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更感到彻底改组国民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真正体会到要振兴圉民党就必须吸收新鲜血液。于是，孙中山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通过同苏俄共产党的接触，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并愿意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3 年 1 月，孙中山会晤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国民党的联俄政策。

11 月 25 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标志着国民党基本上完成了改组的各项准备工作，从而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1924 年 1 月 20 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政治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在组织上，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胜利完成和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二、掀起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工人运动，一大后，为了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发行《劳动周刊》，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劳动法案，领导各地工人罢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迎来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香港海员大罢工和安源路矿大罢工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军阀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林祥谦、施洋被杀，京汉铁路大罢工遇到重大挫折，工人运动一度走入低潮。

1.缜略运筹起盛事——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第一句话就说：“我党主要的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同时强调，要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公开的中央机构，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叫什么名称好呢？”

张国焘想了想说：“这个机构，不是由各地工会选举产生出来的，所以不能成为‘总工会’，”然后又接着问，“马林同志，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个机构叫什么名称合适呢？”

马林深思了一下，“就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你看如何？”这个

名称，恰适合于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工会的组织工作，张国焘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1921 年 8 月 11 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北成都路口 19 号正式成立，张国焘担任主任，李启汉任秘书。

8 月 16 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后文称《宣言》）公开发表。《宣言》指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的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宣言》呼吁工人铲除帮口，按产业组织工会，“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自然这种团结是不能自卫，也自然是无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劳动者只有团结成为统一的阶级力量，“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的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为此，就必须“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

《宣言》最后还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呼声，“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的世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时设在上海，主任为张国焘，随即各地也建立了分部。1922 年 8 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称总部，邓中夏担任主任。“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是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工人）做

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北方分部负责人是邓中夏和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湖南分部负责人是毛泽东，广东分部负责人是谭平山，山东分部负责人是王尽美。

创办工人刊物和工人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发行了机关报——《劳动周刊》，张国焘任编辑主任，李启汉、包惠僧等任编辑。北京分部也发行《工人周刊》，“每期刊两千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山东分部的机关报为《山东劳动周刊》。湖南劳工会也创办了《劳工》和《劳动周刊》。

《劳动周刊》的发刊词，短小精悍，仅 220 个字，却生动地说明了其性质和任务：“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中国的工人们，快快把我们的头抬起来呀！”

《劳动周刊》经常用大字在报纸的白边处，刊登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斗争口号，非常醒目：“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啊！”

当时，《共产党》月刊称赞《劳动周刊》，“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工人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

李启汉是最早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他是湖南江华人，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时，参加了新民学会。

李启汉一开始为了和工人建立联系，参加了青帮，与工人兄弟拜把子，

结兄弟，还在神像前歃血为盟，烧香起誓。但不久，他就发现青帮的这一套帮规和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就退出了青帮。

他开始深入工人中间，与工人谈心，帮助工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逐渐和工人建立了信任的关系。这期间，他领导英美烟厂工人成立了烟草工会。

李启汉来到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我们工人日夜干活，越干越瘦，越干越穷。而资本家不干活，却越养越肥，工厂也越开越多。我们工人的血汗，全被资本家给喝光了。”

接着，为了进一步说明资本家对工人的盘剥，李启汉扳着手指头给工人算了一笔账，“一斤烟叶价值一蛱钱。工人干一天活，把它卷成香烟，在市场上卖，可卖三块钱。工人一天创造的价值一天就是两块钱。可是，工人只能拿到两角的工钱。剩下的一块八角钱，全都装进了资本家的腰包”。

工人们听了李启汉算的账，个个是恍然大悟。可是知道了又该怎么办呢？

李启汉接着说：“我们工人要不分帮派，不分地域，不分男女，组织自己的工会，进行斗争，叫洋资本家给我们增加工资。我们团结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

发动了工人，李启汉看时机成熟了，随即帮助工人推选出工人代表，组成代表会议。他还帮助工人代表起草了《罢工宣言》和传单，提出和洋资本家谈判的条件。

经过与洋资本家的周旋斗争，李启汉领导的英美烟厂罢工，历时 20 天，取得胜利。伴着胜利的喜悦，李启汉领导英美烟厂工人组织了自己的工会。

1922 年元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给烟草工会送来贺年片，背面印了一首《太平歌》，鼓励工人继续斗争：“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几个月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邓中夏，领导长辛店的铁路工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使工人运动掀起了高潮。

1922 年 4 月 9 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上坡店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简章》，规定：工人俱乐部的基层组织为小组。十个工人组成一个小组。小组选出个当头的，叫十人干事。每个工场选出个当头的，叫场干事。工人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是委员会，领头人叫委员长。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现代产业工会的雏形，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所属北京、武汉、湖南、山东、广东分部建立以后，纷纷深入到各地铁路、矿山、工厂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为了交流各地工人运动开展的经验，确定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起初不过由广州、上海、北方十余个工会，感受世界潮流，都觉得有全国联络之必要，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发函召集全国劳动大会”。

4 月 10 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顷接各处工会来函，主张‘五一’纪念节在适宜地点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以志盛典，且可以联络全国工界之感情。本书记部亦认为有举行之必要。特拟就宗旨及办法列后，请贵团体选派代表一人，持贵团体选

派证书，如期赴会为荷！”

书记部发出召开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后，各地工会大为欢欣，竞相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各处派代表约三四十人，加上广州各工会代表，合计竟达 160 余人，代表工人 30 余万。这个劳动大会，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破天荒”的。

1922 年 5 月 1 日至 6 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会的代表，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招牌工会和劳资合作团体的代表，可以说是成分非常复杂，大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主持。

大会讨论通过了十个决议案，其中三个决议案，即《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界虎伥案》，是当时工人群众最关注的，因此成为大会最热烈讨论的问题。

《罢工援助案》的提案人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案是这样说的：“现在我国劳工运动，尚在幼稚时代，能力薄弱。平时即受不正当势力压迫，在罢工时候，尤受资本家欺蔑；非我工人本互助精神，互相援助，必无希望。故工人无论在何时罢工，应当设法援助，以达我工人牺牲奋斗、自求幸福的目的。”

大会通过了这个议案后，提出了相应的办法：一是，“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应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各地劳工各书记部暂担通讯义务”。二是，“凡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知各会员干下列各事，即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得受该处东家之雇请；派人慰问，

或通讯慰问；派人帮忙办理事务；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即一处罢工互相支援，体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团结性。

《工会组织原则案》的提案人为邓中夏，他认为：“工会是由一种职业的工人所组织而成，则罢工运动每至一行业的工人陷于孤立，而容易失败。产业组合则不然，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争斗力就异常雄厚。故我们组织工会，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但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各种职业的工人，则仍不妨沿用职业组合法以为着手之起点。又我们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织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而咸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再由各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则工会的组织，就上真正的轨道，成为一个铁样的团体了。”

大会同意了这个提案，并决议：“凡能采用产业组合的，就应一律采用产业组合法去组织工会。”“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办法的，不妨用职业组合”；“务必将每个地方所有各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工人，将来由各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这样，产业和地方相结合，就成为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沿用至今。

《惩戒工界虎伥案》的提案人为中国劳动同盟会上海总部代表谭竹轩：他提案的理由是，“我工友们既饱受资本家之压制，复受虎伥之欺凌”，对此必须加以惩戒。公决“办法分三层，先警告，次宣布罪状，最后则以铁血对待。”

大会公开发表了宣言，刊载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宣言指

出，“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很多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时常压迫我们，杀戮我们的领袖，枪击我们罢工的兄弟，禁止我们的罢工，剥夺我们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所以，我们要结合全国的农人，至于小资产阶级暂时联络，共同向着那些敌人奋斗”。这样，就在政治上为中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合法的公开的总机关。大会通过的《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公认了它为全国唯一的领袖。大会结束以后，党中央决定，邓中夏接替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

1922 年，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为粉饰专制统治，曹锟、吴佩孚宣布重开国会，酝酿制定宪法。

邓中夏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运动。他提出劳动立法四项原则：保障政治上的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劳动补习教育。在此基础上，邓中夏又主持拟定了《劳动法案大纲》19 条：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承认劳动者有同盟罢工权；承认劳动者有缔结团体契约权；承认劳动者有国际联合权，等等。大纲的 19 项条款，是同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相对应的，是这些原则内容的细化。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给众议院发出了《关于劳动立法的请愿书》，“素从事劳工运动，连年来亲睹国内劳工饱受暴力摧残之惨状，深知国内劳工无法律保护之痛苦，加以感受操政柄者之巧于舞文玩法，益觉得劳动法案

规诸宪法之重要“。请愿书要求国会在宪法中规定保护劳工的条文。

1922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工会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要求各地工会开会讨论劳动立法问题，以便乘此制宪运动的良好机会，争取劳动者应有的权利，并且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下来。

为了扩大劳动立法的社会影响，邓中夏又举行了新闻记者招待会。他向在场的记者介绍宣传《劳动法案大纲》的内容，又接着说：“劳动阶级一向被看作牛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都没有。我们要求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改善工人的生活。”

他进一步呼吁道：“我们要求国会在宪法中规定劳动立法，保障工人政治自由，改善工人生活。”他最后又着力强调了：“劳动立法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创建工人的国家。”

邓中夏的一席话在记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媒体纷纷加以宣传。

全国各地的工会热烈拥护劳动立法。唐山、长辛店、长沙等地的工人，组织了“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示威游行，通电国会，要求国会采纳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

尽管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曾通电表示保护劳工，一些国会议员也曾表示同情劳动立法运动，但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粉饰专制统治和进行政治投机。他们根本就无意制宪，书记部所提出的劳动法案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了。

尽管如此，劳动立法运动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经过广泛的宣传，《劳动法案大纲》所列的 19 项条款深入了工人群众的心中，实际上变成了罢工高潮中的斗争纲领。这个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同北洋军阀政府进

行合法斗争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2.云开月明见薄光——取得胜利的罢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个罢工高潮，从1922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23年2月。

1922年1月，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拉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序幕。香港，海岸线约为34公里，是个水深、不冻、可停泊巨轮的良港，地处交通要冲，是远东的转运中心。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侵略者霸占为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利用香港的地理条件和特点，大力发展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第一代中国海员就是在香港诞生的。

香港海员长期遭受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资微薄，生活艰苦。鉴于这种情况，1921年3月6日，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茬香港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当时的苏兆征、林伟民，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后来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苏兆征于中共八七会议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为了维护中国海员的正当权益，反抗中外资本家对海员的残酷压迫和剥削，9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表全港海员，向香港轮船公司提出三条要求：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为此，海员工会还成立了“增加工资维持团”、“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等组织机构。

然而，香港轮船公司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在收到工会如不答应要求

就罢工的最后通牒后，仍然是一副傲慢的态度，置之不理。

忍无可忍！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1922 年 1 月 12 日下午 5 时，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苏兆征带领着“泽生号”轮船首先发难。很快其他轮船的海员也相继行动起来。

据《新闻报》报道：“此次香港海员罢工，凡用华人为船员之船，除某某一艘外，余皆在内……船上大小华员，自领港以至装炭之人，均停工离船。”

◎苏兆征

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还没遇到过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因而惊慌万分，立即采取各种办法来破坏罢工。当天晚上，华民政务司官员赶到海员工会，恐吓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这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子吗？”

苏兆征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答道：“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都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饿不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担心。”这番话深得海员们的赞同，掌声如雷。

罢工海员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香港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越来越困难。港英当局派出轮船到广州采购，受到当地商人的抵制，一无所获。

2 月 1 日，港英当局以“危及本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宣布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不法会社”，派出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逮捕了工会办事人员，抢走了工会的文件、账簿，摘去了工会的招牌。

这些行径，非但没有吓倒工人们，反而激起各界人士财海员的同情。

2 月中旬，香港各工会派出代表，前来和苏兆征、林伟民商讨，发动全港工人大罢工，以示支援。

当局了解到这个情况，决定改变策略，派人和海员工会“调停”。

中国轮船资本家出场了，对苏兆征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你们的罢工，我们是同情的。我们商量一下，中国轮船先复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照办。”

苏兆征义正词严地回答：“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共同努力，使当局接受我们的条件，早日解决罢工。其他条件，免谈。”

话不投机，港英当局又请东华医院出面。东华医院实际上是一个颇有政治势力的中国绅商集团。

一开始，苏兆征就提出：“恢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送回总会的牌子。”

绅商代表们建议：“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要先改变招牌，添多或减少几个字。”

海员代表立刻驳斥：“工会招牌，一个字也不能增，一个字也不能减，而且要还给我们原来的招牌。”“工资太少，海员不能维持生活。所以，增加工资，非马上签字不可，不能待以后再议。”

绅商代表们看实在没有进展，马上转换了话题：“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可是，香港已经粮尽食绝。再罢工，岂不是要把几十万香港居民活活饿死？！”

苏兆征反击道：“是的。香港将要绝粮，这是实情。我们挂念着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也不挂念海员，老早就有几十万海员要饿死了。我们此

次罢工，天寒肚饿，你们为什么不说一句救济的话呢？”

绅商代表闻听此言，立时语噎，无以应对。此后，港英当局华民政务司对海员代表的恐吓言辞，也被代表们一一驳回。

威逼利诱失败，调停也彻底破裂。一计不成，港英当局又生一策，他们使出了更恶毒的手段——招募新工。他们派人到上海等地募工，企图以此来破坏罢工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到香港海员工会的通电后，立即发动工人抵制募工活动。

被招募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失业工人。他们听说是去香港接替罢工海员工作的，就不大愿意去。

招募来的新海员，到了汕头时，被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回去了一大半。“弟兄们！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工人不会来。现在，香港海员罢工，我们也不要去。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能坏工人的事。我们要团结起来！香港海员罢工，也是为了我们，加了工钱，大家都有份！”

到达香港的上海工人，不足 300 人。港英当局的这一诡计又被挫败了。

香港海员罢工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工会组织的大力声援。2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散发了 3000 份《敬告罢工海员》传单，指导海员罢工，“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我们为争生存而举行这次大罢工，凡是有良心好和平的人们，除资本家及帮助他们的走狗——官僚军阀外，没有不同情于我们的。……不过，我们还是不可疏忽，就是资本家的爪牙众多，侦探遍布。他们有本事能够制造谣言，颠倒是非，欺骗我们的同志”。

最后，发出了号召：“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海员同志们，快快共同一致地望着我们的目标奋

斗，以期得到我们的最大光荣最大胜利啊。”

2 月 28 日，香港各行业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支援海员的罢工。到 3 月初，罢工人数超过 10 万。

为了同港英当局斗争到底，苏兆征、林伟民组织罢工工人回广州。3 月 4 日，港英军警在沙田悍然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阻拦罢工工人离港，当场打死 4 人，打伤数百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

惨案更加激起了工人们的斗争决心，全港总同盟罢工继续发展，致使香港航运瘫痪、交通中断、生产停顿、生活用品来源断绝，完全变成了“死港”、“臭港”，“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是危在旦夕”。

港英当局招数使尽，黔驴技穷，不得不答应，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提出的恢复工会原状、送还工会牌子等 9 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复工问题。

3 月 5 日，双方达成复工协议。6 日，港英当局发表《特别公报》，宣布取消查封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命令，答应当日派人送还工会牌子，挂回原处。8 日，协议正式签字，复工。

罢工胜利了！这次罢工是与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直接交锋，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70 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圭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下屈服了。”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矿山工人的斗争，是从安源开始的。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安源路矿的兴衰，对当时全国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及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经济

政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安源路矿当时有 1.7 万工人，长年累月受到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把头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煤矿设备很差，经常发生严重事故，“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工资极低，还经常遭到矿长到工头的任意殴打和辱骂，是个“人间地狱”。

1921 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到安源，了解情况，为开辟工人运动做准备。毛泽东在安源调查了一个星期，他认为，安源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回到长沙后，他就向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提出，希望劳工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一起，派人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1921 年 11 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了解情况，这一次，他带着湖南劳工会的交际部干事张理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宋友生，还有李立三。

张理全领着毛泽东、李立三、宋友生来到修理厂，与进步的青年工人谈心。聊了一会儿后，毛泽东说：“你们整天干活，做牛做马。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资本家不劳动，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楼大厦，这是什么道理？”

工人回答：“命里注定的。”

毛泽东摇摇头，语重心长地对工人说：“不对。工人不是生来就穷的。资本家是靠剥削你们的血汗钱发财的。你们是被资本家剥削而受苦的。”“工人不是天生的奴隶，是天下的主人。我们要挺起腰杆，结成一团，开展斗争，才能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那怎么结成一团呢？”工人问。毛泽东拿起桌上的一根筷子，轻轻一折，断了。他又拿起一把筷子，怎么折都折不断。工人们看到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一行四人，在安源住了三天。白天，他们去矿区了解情况，晚上，就和工人谈心。之后，回到长沙，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讨论决定，派李立三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李立三，湖南人，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归国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派回湖南工作。

动身之前，李立三来询问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在安源工作．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李立三接着问：“有哪些合法的形式可以利用？”毛泽东想了想回答：“办平民教育。”

李立三到安源的时候，时年 22 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对工人运动有火一样的热情。他一到安源，就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蒋先云来安源，协助李立三办学。

很快，工人夜校办了起来，开设了国文、算术两门课。课本是李立三、蒋先云等自己编的，内容都是工人身边的事，通俗易懂。逐渐，学员越来越多。夜校，就改名为工人补习学校。

工人补习学校讲授的《补习教科书》，课文有《无产阶级》、《资本》、《为

什么要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等，向工人传授马克思主义。

之后，李立三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安源的工作。毛泽东听了，称赞李立三工作开展得不错，并提出：“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在安源工人中发展一批党员，建立党的基层支部。有了党的组织，就有了核心，工作就好做了。”

1922 年 2 月，安源党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牛角坡 52 号举行成立大会。大门两旁有一副对联：“世界劳工大团结，改造社会除压迫”，横批是“纪念五一”。二门的对联是：“有团结精神，有阶级觉悟；是劳工保障，是人类福星”，横批是“俱乐部诞生”。当天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大家一致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安源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22 年 7 月，汉阳铁厂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下，罢工取得胜利，厂方答应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俱乐部是工人的合法组织。

这一消息振奋着安源路矿的工人，工人们纷纷议论着：路矿两局几个月拖欠的部分工资未发，我们也应起来罢工，工人要求罢工的呼声越来越高。

路矿当局得知工人在酝酿罢工的消息后，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上告赣西镇守使和萍乡县衙门，要他们出面干涉．封闭工人俱乐部。另一方面，趁着李立三不在安源，威逼蒋先云、朱少连离开安源，声称如果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

在这个关键时刻，9 月初，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到了安源。毛泽东听取了安源的情况汇报，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发动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举行罢工。他写信给李立三，让其立即返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同时考虑到安源罢工是湖南分部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

9 月 9 日，李立三回到了安源，立即进行罢工的各项准备。12 日晚，秘密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具体制定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等 17 条复工条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以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

罢工前夕，毛泽东给安源党支部发来了指示信，他鼓励大家，并且要大家注意三件事情：一是罢工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发动和组织好全体工人。二是要注意秩序，要有罢工纪律。三是要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取得社会各界的同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来了支援信，信中希望路矿工“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应努力奋战！

安源这个地方，帮会很多，尤以洪帮势力最大，有几千工人参加。洪帮的头目，大都是矿上的工头。因此，如果不把洪帮的力量争取过来，罢工的秩序恐难维持。

刘少奇认为：“帮会有两面性，既有野蛮、愚昧的落后一面，又有讲义气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利用他们积极的一面。”

李立三赞同刘少奇的看法，并且自告奋勇，“我在安源搞了一段时间，对洪帮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个工作交给我。”

李立三派人打听，找到了洪帮的头目，开诚布公地对洪帮头目说明了此行的情况：安源工人俱乐部为了解除工人的痛苦，要求当局发清欠饷，准备发动罢工，并请求各位头目开胸解怀，帮言劝语。

“罢工？！”洪帮的众头目惊愕不已。

李立三慷慨激昂地说：“对！我们要罢工！不罢工，工人没法活了。众兄弟是讲义气的，岂能见死不救？”

众头目听了，纷纷点头，说：“那要我们帮什么忙？”

李立三说：“主要是维持安源的秩序。第一，立即关闭鸦片烟馆、妓院。第二，不准抢劫。第三，赌场、赌摊，都要停止。”

洪帮头目拍拍胸脯，答应了。罢工前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9 月 14 日凌晨，路矿当局拒不答复 I 人俱乐部的要求，李立三一声令下，安源路矿大罢工爆发。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全体工人”的名义，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说：“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活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但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并且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 17 项要求。

罢工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湖南、上海

和北京等地的报刊大量报道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消息或评论，极大地增强了安源路矿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路矿当局极为恐慌，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罢工进行破坏，甚至悬赏 600 元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李立三。工人得此情报，发誓“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另一方面不许李立三外出公开活动，派人严加警卫，甚至一天睡觉的地方也要换好几次，保护李立三。

路矿当局又请赣西镇守使萧安国出动军队，镇压罢工，派了旅长李鸿程率领一队人马，奔向安源。到了路矿，就派士兵抓人，工人们和士兵僵持着。

刘少奇对士兵们说：“弟兄们，我们都是苦同胞。你们出来当兵，是为了吃穿，为了活命。我们工人罢工，也是为了吃穿，为了活命。我们的工钱被当局扣了不发，连粥都吃不上。我们是死里求生，迫不得已才罢工的。”

经过一番劝说，士兵们纷纷放下了枪。路矿当局的阴谋又破产了。

由于共产党组织对这次罢工斗争组织严密，工人坚强不屈，加上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几次的阴谋又没得逞，无可奈何，只得同意谈判解决。

俱乐部派刘少奇前往谈判，戒严司令李鸿程恐吓刘少奇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面无惧色，态度坚定地说：“这是一万多工人的要求，你们就是把我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谈判过了一个小时，集合在戒严司令部周围的数千工人担心代表受害，

高呼：“伤我代表一根毫毛，整个矿井全遭毁灭!”

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路矿当局被迫同工人俱乐部代表李立三于 9 月 18 日正式签订了有 13 款内容的条约，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俱乐部随即发表了上工宣言，表示：“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宣布上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去奋斗!”

当天，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庆祝游行。会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当李立三、刘少奇等走人会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

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他说：“工友们，这次罢工，我们胜利了。这是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坚决的结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团结，共同战斗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接着，李立三宣读了 13 条协议，每读完一条，会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工人山呼：“工人万岁!”

安源路矿大罢工，历时 5 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完全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了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少奇对此曾高度评价：“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

3.暴雨疾风事堪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镇压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

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全长 1200 多公里，分江岸、郑州、长辛店三个总段，共有工人 2 万多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邓中夏等人，率先在长辛店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对全路工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2 年春，京汉铁路又相继组织了 13 个工人俱乐部。到了年底，全路各站已经建立 16 个工会分会，工人们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的愿望也愈加迫切。

1923 年 1 月 5 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决定 2 月 1 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会议拟定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确定宗旨：一是改良生活，提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二是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三是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是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

筹委会在撮纸上发布了这个消息，向全国各工团、各界发了请帖。当时，为了防止当局阻挠，筹委会也向郑州军警各机关及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做了报告。赵继贤表面上同意，而暗中却密电军阀吴佩孚，认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是“聚众招摇”，要吴佩孚“预为防范，切实监视”。

1 月底，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已全部到达郑州。出席大会者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 65 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 60 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 30 多个工会的代表 130 人，北京、武汉的学生和新闻界人士 30 多人。

吴佩孚此前长期打着“保护劳工”的旗号，给人以进步的印象。当时不仅工人们被蒙蔽，连孙中山和苏俄方面也曾对吴佩孚寄予厚望。然而，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人的团结对于他自

然是个威胁。在收到赵继贤的报告后，吴佩孚撕下自己的假面具，立即通知郑州的第 14 师师长靳云鹗，要其设法制止会议的召开。

1 月 28 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来到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奉吴大帅之命，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大帅来电，说你们胆敢在军事区域擅自开会，实属胆大妄为。业已命令靳师长严加制止，否则以武力对待”。

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当场质问黄殿辰：“我们的大会，是呈报铁路局批准的，在报纸上也刊登了开会启事，怎么叫‘擅自开会’呢？”“你说郑州是军事区域，不准开会，可是，郑州商有商会，学有学会，为什么偏偏不准我们工人成立总工会呢？”他接着义正词严地说，“告诉你，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全路工人的权利，谁要破坏我们的大会，办不到!”

黄殿辰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大会筹备会依旧按原定计划进行。

1 月 30 日，吴佩孚给大会筹备会发来电报，召工人代表去洛阳与他面谈。他直言：“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

工人代表据理力争：“你口口声声‘保护劳工’，可是，我们工人要组织工会，你却百般阻挠，这就是你说的‘保护劳工’？”

吴佩孚始终顾左右而言他，还想用金钱收买代表，不成。最后撂下一句狠话：“我是军人，岂能收回成命？你佃若是一定非开会不可，那我可就对不起了。”说完冷笑两声，拂袖而去。

当晚，工人代表返回郑州，开会讨论怎么办。工人们有的主张改变开会方式，有的主张改期开会。项英大声疾呼：“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斗争!”

参加会议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站起来，大声说：“吴佩孚叫我们不要开会，我们就不开会。吴佩孚不叫我们活，我们还活不活？”

◎林祥谦

最后，林祥谦激动地站在一条板凳上，放开嗓门说：“我们工人联合起来，组织工会，为了什么呀？就是要打倒封建军阀，”接着，他振臂一呼，“我们的大会，一定要按期举行。”

与会代表群情激昂，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武汉工团联合会主任林育南、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徐白昊等纷纷发言，支持他们的意见，最后决定如期开会。

2 月 1 日上午 8 时，各站工人代表和前来祝贺的各地区工团代表齐集五洲大旅馆，前面是军乐队奏乐开道，接着是工人们抬着一长串八仙桌，上面摆放着各地工会赠送的贺礼。代表们手执红旗，和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一起向会场——普乐园戏院进发，在距会场不远的地方，遭到了军警的阻拦。

双方相持两个多小时，代表们拨开军警们的刀枪，冲破防线，直奔普乐园。

这个时候，普乐园已经被查封，门上贴着十字交叉的大封条。项英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手把封条撕下来。代表们群情激愤，涌入会场。代表、来宾和工人们进入会场就座后，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走上主席台，高声

宣布：“弟兄们！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顿时，“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连续不停，响彻天空。

当天下午，军警又包围了代表所住的旅馆，不准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会所也被军警占领，禁止工人出入，各团体赠送的匾额、礼品也被尽数损毁。

当晚，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各地代表“无不愿舍死拥护此神圣之总工会，奋力争夺此获而复失之自由，虽死亦无余恨”。决定发动全路大罢工，抵抗军阀吴佩孚的武力压迫。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成员有张国焘、罗章龙、项英、高斌等。

2 日，代表迅速返回自己的岗位，组织、发动罢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叙述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被镇压的经过后，指出：“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祸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紧紧地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

宣言最后呼吁：“工友们，无产阶级呀！为争自由而战呀！为争人格而战呀！为争我们的切身利益而战呀！弟兄们！无产阶级呀！努力呀！奋斗呀！冲锋呀！前进呀！”

按照总工会规定的时间，4 日上午 9 时，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下达罢工命令。10 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下达罢工命令。11 时，长辛店分工会委员长史文彬下达罢工命令。12 时，京汉铁路全线 16 个站区实现总罢工，1200 多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

当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全国总工会，支援京汉铁路罢工工人。《通电》说：“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

2 月 5 日，吴佩孚致电京汉铁路沿线驻军及湖北省督军公署，命令对各路工人罢工“查明严禁。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赵继贤也顺势发表《京汉铁路管理局布告》，对工人欺骗加恐吓，想让工人们在 12 小时内复工。然而，工人们却勇敢而坚定地回绝：“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

2 月 6 日，罢工进入第三天。在郑州，为了恐吓罢工工人，靳云鹗、黄殿辰指挥军警，把高斌等五人的棉衣剥去，光着身子，捆绑在车站月台路灯的杆子上，逼他们下令复工。时值隆冬季节，滴水成冰，然而高斌铁骨铮铮，横眉怒目，不为所动。恐吓手段没有效果，靳云鹗又耍新花招。他下令解绑，然后又假惺惺地用美酒佳肴款待他们，同样没有动摇工人的决心。

在长辛店，当局挨家逐户搜查，先后抓走史文彬、陈励茂、洪永福等 11 人，对他们拳打脚踢，并施以脚镣手铐送入监牢。

在江岸，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等率领湖北 18 个工团和学生联合会两千余人的慰问队伍，高举“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大旗，慰问江岸罢工工人。总工会秘书李震瀛致辞：“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远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渲染了！工友们！这军阀的

火线上应该我们去做先锋，前进呵！勿退却!”会后，还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同时，在汉口英国领事署内，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召集湖北督军萧耀南的代表及外国资本家，商讨镇压罢工之策。吴佩孚本已有镇压的打算，这时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遂下令在 7 日南北一齐下手。

2 月 7 日，吴佩孚脱下伪装，调动了 2 万多军警，向赤手空拳的工人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惨案首先发生在长辛店。黎明时分，三四千工人聚集起来，高喊着“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的口号，涌向驻军旅部所在地。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反动军队血腥的屠杀，纠察队队长葛树贵等 5 人当场牺牲，重伤 30 多人，另外有 30 多人被捕。大屠杀之后，工会被封闭了，工人们都不准自由行动。

同样的惨案在江岸也发生了。已经被萧耀南任命为镇压罢工的刘家庙铁路警备司司令的张厚生，耍起了阴谋诡计。他派一名军官，去京汉铁路总工会，表示铁路局已经全部接受总工会提出的条件，要总工会派出全权代表，与张厚生谈判复工的问题，并约定好下午五时半。

可是工人上当了。张厚生带领着官兵包围了江岸分工会，袭击了守候在工会的数百名纠察队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曾玉良等 37 名工人牺牲，200 多人受伤，60 多人被捕。

江岸工人的境遇更为悲惨。林祥谦与其他几十名被捕的工人被捆在车站站台的灯柱上。晚上 10 时许，天空飘着雪花。张厚生认出林祥谦后，威逼他下上工的命令。

林祥谦昂首挺胸，怒目而视，不予回答。张厚生命令刽子手用刀先砍林祥谦左臂一刀，厉声说：“上不上工？”

林祥谦忍着剧痛，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工!”

张厚生气愤不已，又令刽子手砍林祥谦的右臂，顿时，鲜血如注，张厚生逼问道：“到底下不下上工的命令？”

林祥谦还是坚定地说：“没有命令，不能上工。”

张厚生追问：“到底是谁的命令？”

林祥谦表情坚毅，大声说：“总工会的命令。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

张厚生更火了，又令刽子手砍了林祥谦几刀，林祥谦在剧痛中晕倒。醒来后，张厚生狞笑着，说道：“现在怎么样？”

林祥谦面对着张厚生的可恶嘴脸，痛斥道：“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王八蛋的军阀手里。”

张厚生气急败坏，林祥谦话音未落，就令刽子手将林祥谦乱刀砍死，并将其头颅割下，挂在车站示众。

在汉口，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劳动者律师”的施洋，也被反动派以“煽动工潮”的罪名逮捕了，被关在武昌湖北督军署陆军审判处看守所，戴上了手铐、脚镣。

施洋在 2 月 8 日的陆军审判处的审讯中，痛斥了审判官对他的污蔑。但是，他也深知，在这个地方审判，只要吴佩孚的一个命令，不要证据，不要审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在押的 7 天，施洋坚持记了 7 天的日记——《伯高狱中七日记》，这是

施洋和敌人斗争的真实记录，表现了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

在吴佩孚下令禁止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的时候，施洋就向工人发表了演说，指名道姓地声讨吴佩孚。

“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国的约法上明白规定，我们工人创造的功劳甚大，在人民中占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不能享受约法上的自由？军阀吴佩孚，野心勃勃，南征北剿，不是依赖我们制造武器及交通运输的工人吗？他的生命，他的权力，都是建立在我们身上。他不知感恩，反要摧残我们，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约法上应有的权利。这是何等的无理。”“大敌当前，我们有进无退，善自防卫。工友们，努力奋斗呀!”

吴佩孚对施洋恨的是咬牙切齿，叫嚣：“不杀施洋，工潮不能平静。”2月14日，吴佩孚给萧耀南下达了秘密杀害施洋的命令。

15日凌晨，施洋被押至武昌洪山脚下。行刑前，执法官问施洋：“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

施洋慷慨激昂，像往常发表演说一样，高声回答：“中国就是我的家！我有什么信可写？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班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食肉寝皮!”

枪声响起，施洋身中三弹仍高声三呼“劳工万岁”，倒在血泊中。

◎施洋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的声明，指出：“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杀，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发纵指使的!”“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

困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共产国际在发来的《为二七屠杀告中国铁路工人》的电报中，希望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增加自己团体的斗争力，以达到中国人民的解放”。

大罢工坚持到 2 月 9 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被迫下令复工，复工令指出：“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此时唯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

至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宣告结束。在反革命武力的压迫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革命斗争遭到了失败，中国的工人运动也由高潮转入了低潮。

三、开展农民、青年、妇女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积极开展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沈玄庐在浙江萧山组织和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彭湃，领导了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被誉为“农运大王”。随着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为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对青年团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党开展了各项工作。中国共产党开办平民女校，出版《妇女声》等刊物，积极领导妇女的解放运动。

1.千年沃土耀星火——将农民发动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党的时期，就注意到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1921 年 4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 3 号发表了《告中国的农民》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农民的问题。

《告中国的农民》一文中指出，中国农民存在着不同的阶级，既有有土地并且出租的“土财主”，也有连一点地都没有的“穷光蛋”。农民要想摆脱贫困，必须起来“抢回被抢的土地”。而且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莹要位置的”。共产党人要引导农民的阶级觉悟，

使他们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使他们早有一天阶级觉悟，早免一天痛苦”。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广大农村，开展艰苦的农民运动，虽然规模有限，但却是新型农民运动的先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出现在浙江萧山和广东海陆丰等地区。

萧山县位于钱塘江南岸，是浙江北部平原上一个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的地区。萧山的贫苦农民长期遭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勒索，往往被逼得无路可走。五四运动前后，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响应“劳工神圣”、“与劳动者为伍”的号召，纷纷到农民中去，热情传播新思想，通俗讲解革命道理。萧山与省会杭州一江之隔，距上海也不远，优越的地域条件，使当地农民在接受新思潮方面，比边远偏僻地区的农民，时间上更早些，影响也更大些。

在萧山发动和组织衙前农民协会的，是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他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曾积极参与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前后，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杂志，以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出路问题为宗旨，在当时颇有影响。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一起，在上海共同发起了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0 年春，衙前农民李成虎兄弟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所收获的油菜籽被人收去，到了翌年的 4 月份，却还一直讨不回钱。家里连买米的钱也拿不出来了，眼看一家老小嗷嗷待哺，李成虎实在没办法了，找到了村里的沈玄庐，想讨个主意。

沈玄庐世代都是萧山有名的地主，在衙前村一带拥有大量的土地，但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沈玄庐，内心深处早已站在贫苦农民的一边，曾

多次公开表示不向农民收租。

沈亥庐深思后，对李成虎等说：“要想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为今之计，我们要组织起来。”

李成虎听了，急忙接声问道：“沈先生，组织起来？”

沈玄庐面对着充满疑问的李成虎等农民，目光坚毅地说道：“对，组织起来，我们要成立农民协会，我们自己的组织。这样，地主恶霸们才不能随随便便地抢了我们的果实。”

这样，李成虎兄弟热情地跑村串巷，向农户们痛诉农民们悲惨的苦境，吸引和发动了大批的农民。

沈玄庐以衙前为中心，开展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工作。1921 年 8 月的一天，烈日炎炎下，沈玄庐头戴农民的草帽，穿着农民的土布衣衫，来到萧山山北地区的一个土地庙前。他站在土地庙的戏台上，慷慨激昂，以当地农民的方言，向附近二三十个村庄的农民，发表了《农民自决》的演说。他首先指出了地主和佃户的剥削关系，说明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开展斗争才有活路。他的演讲浅显易懂，农民们越听越入迷，听到兴致高时插话问：“你说地主老财剥削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沈玄庐接话说：“如今你们要求我发表根本的主张，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也要看你们团结的力量和组织上的努力，而定这个主张实现的迟速。”

他热情地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说道：“你们赶快地团结呵！你们紧密地组织呵！大地主们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

沈玄庐的演说，在萧山农民中很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引起了农民强

烈的反响。后来，农民组织在一个宣言中，对此事曾有如下记载：“可怜我们乡民，已经人多地狭，还要被有产阶级剥削，使农民犹如泰山压顶，弄到无余钱盖房做衣，吃餐断餐，惨酷的状况，无可言喻。今年 8 月里，玄庐先生到我们北山村中戏台上演说，题目叫做‘农民自决’，我们听了他的话，如见天日。”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21 年 9 月 26 日，衙前农村小学举行开幕式，当时共有学生 100 多名，分 5 个班，免收学费，学习用品也全由校方免费供给，参加开学典礼的除教师、学生外，还有附近的工农群众以及当地的士绅、官吏。

开学典礼上宣读了《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这个宣言旗帜鲜明地向旧的教育制度宣战，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体力被有产阶级夺了去替他们生产”，“照这样下去，不是世界上穷的永远穷，富的永远富，人类最大多数陷于穷困愚笨的一境，这不是人类自杀吗？”最后．宣言号召：“小学生啊，你们是荆棘丛中最美丽的花，朝起的太阳，正对着你们含笑哩!”

衙前农村小学为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做了准备，衙前农村小学不仅教文化知识，而且向农民宣传减租减息、抗捐抗税、争取翻身解放的革命思想。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了衙前农民活动的场所，发动和团结农民群众的中心。

9 月 27 日，衙前农民大会在东岳庙前召开。会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声、掌声不时响成一片。这次大会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选举了 6 名农民协会委员，并推举贫苦农民李成虎为农协领导人。至此，我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

《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喊出了压在农民心底的呼声：“我们农民，从小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长大时做了田主地主不用负担维持生存条件的牛马奴隶，老来收不回自己从来所努力的一米半谷来维持生活。人生少、壮、老，三个时代这样过渡，这还好算是人的生活吗？”在揭露了地主、资本家对农民的剥削之后，指出农民要想摆脱贫困的生活现状，“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的命运”。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积极领导农民开展了同地主的斗争。农协提出了“二五减租”的要求，在李成虎、宣中华等人的领导下，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了打击地主豪绅的勾结活动，农会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举行抗租游行示威。当地有个高姓的地主，曾在江西九江当过监察官，又仗着自己的父亲是萧山县商会会长，就壮着胆子亲自下乡来向农民收租。佃户依照农协的规定，只交四折租，他硬是不肯，还耀武扬威。农民们商议要教训他一番，于是把他围起来打了一顿，打得他狼狈而逃。其他的地主知道了这件事后，也灭了胆子，改变了以前的高额地租，接受了农协的“二五减租”，并且废除了其他的一切额外苛例。

农协还提出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反对旧礼教等革命口号，一时间，农村的社会风气有了大大的改善。

衙前农民运动的胜利开展，引起了萧山、绍兴一带农民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效仿。到 1921 年冬，绍兴、曹娥等地方圆 300 里的几十个村庄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榜样，先后建立了 80 个农民协会。

萧山、绍兴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减租斗争的不断发展，使当地的地

主、豪绅坐立不安，对农协恨得咬牙切齿，百般攻击农协，他们和当地的官吏串通一气，欲将农民协会置于死地而后快。浙江省长亲自下令，诬指农协“散布谣言，煽惑群众，顽佃聚众抗租情事”，指令“严刑拿捕惩治”。

1921 年 12 月 18 日，几百名农民集合在衙前东岳庙，商讨减租事宜。省县当局早有准备，派出了大批的军警，冲散会场，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大打出手，有的农民被打落到水中，伤痕累累，有的农民甚至被打致残。当地的官吏强行解散了农民协会，逮捕了农协委员李成虎，严禁农民集会演说。

衙前农民运动在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下，暂时转入了低潮，被捕的农协领袖李成虎虽经多方营救未能获释。次年年初，萧山县知事庄伦仪亲自审讯李成虎，对其严刑拷打，致使其备受摧残。1922 年 1 月 24 日，李成虎重伤死于监狱。衙前农民在悲痛中举行了悼念李成虎的活动，并立碑纪念。沈玄庐在挽联中写道：“四山坟墓堆里，找不到第二具；中国农运史上，这位推第一人。”衙前农民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实践，是初创时期党的史册上重要的一页。

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党的初创时期范围广、影响较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开创者是后来被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彭湃的家在海丰县属于大地主，每年收租约千余石，他从事农民运动，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力，朋友们都劝谎他，“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

彭湃不惧亲朋好友的阻挠，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海洋中。一开始，彭湃身穿白色学生服，头戴着洋帽，脚上蹬着皮鞋，农民们见他这

身打扮，都不敢和他接触，见到他就远远地避开了。几次之后，他吸取了教训，换上了农民的粗布衣服，摘下了白通帽，戴上了尖顶笠，脱下了皮鞋，赤着双脚，完全就是一副当地农民的样子。他的宣传也逐步深入人心，来听他演讲的农民越来越多。

彭湃出身于豪绅家庭，连日在农村奔波，累得面黄肌瘦，衣服也脏了，头发蓬乱。地主豪绅都耻笑彭湃犯了“神经病”、“说疯话”。彭湃毫不理会这些，一心一意地做农民运动的工作。

7 月的天气，酷暑难耐，彭湃又顶着酷热来到农民中间。一天，当他讲到只要农民团结起来，所有附加的地租都可以免除的时候，有一个农民因为彭湃的出身，对他的话很不以为然，质疑道：“欠你们彭家一升半合都不行，还说减租？请你们彭家不要来逼我们的旧租，我才相信你的话是真的。”

彭湃刚要回答，这时有一个青年抢先说道：“你这话就错了，你种彭家的田，彭家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们又怎么办呢？现在不是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倘若整天求人让步，早晚也是要失败的。”

经过继续交谈．发现这个叫张妈安的青年，敢说敢为，很有冲劲。于是，彭湃邀请张妈安到家里详谈。当晚，张妈安带着农友林沛、李老四、李思贤、林焕，一起来到彭湃的住处。彭湃备茶招待，他们热烈地交谈起来。他们从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农民，谈到农民应该如何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越谈气氛越高涨。于是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当晚就由在场的 6 人参加，成立了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以这 6 人为骨干，大家分头宣传、联络，一个月以后，赤山约农会发展到 30 多人。此后，掀起了震动广东的农民革命运动。

为了进一步发动农民入会，彭湃把他所有的土地契约拿出来给农民，农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迟疑着不敢接受。彭湃当着众百姓的面，把这些契约一把火全都烧了。农民们看到这里，都连连赞叹，彭湃真的是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的，大家都聚集在彭湃的周围，报名参加农协的人越来越多了。10 月，海丰平岗、青湖、河口、河西、公平等十余约（乡）都成立了约农会。

农会成立起来以后，积极引导农民向地主展开斗争。为反对地主任意对农民实行“加租”、“易佃”，农会组织“同盟非耕”活动，还组织农民对抗城市地痞恶霸的敲诈。过去海丰农民驾船进城运肥载物，总要被当地流氓强收“粪船捐”、“码头捐”，还要挨打受骂。为此，农会又作出规定：凡是城市各类人等在本乡经过，或其船只驶入本乡，也要向农会交纳路费。经过几番较量，迫使城市地痞霸头取消了“粪船捐”、“码头捐”等。

1923 年 1 月 1 日，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彭湃当选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彭湃亲自草拟了海丰总农会简章，提出总农会的奋斗纲领为“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其任务是“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

海丰总农会下设卫生部、教育部、庶务部、交际部、财政部、仲裁部、宣传部、农业部等部门分管农会的各项工作。当时海丰人会的会员达到了 2 万户，在农会管辖下的人约 10 万人，全县农民运动盛极一时，成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中心。

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彭湃又先后到陆丰、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到 1923 年 5 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共有 70 多个约、1500 多个乡建立了

农会，会员达到 20 多万人。1923 年的五一劳动节，三县农会举行庆祝大会，发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

农会的不断壮大，农民运动的兴起，自然引起了地主的仇视，他们勾结当局对农会进行了镇压，使农会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彭湃也不得不离开了海丰。尽管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暂时遭到了挫折，但是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埋下了火种。

2.书生意气斥方遒——将青年组织起来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十分重视，党的一大后，青年运动很快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青年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恢复和加强青年团的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 S·Y）。1920 年 8 月，上海首先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区的青年团组织相继成立。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一方面积极向广大青年工人、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组织上还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入团，为建党在思想和组织上起了一定的准备作用。但由于早期的青年团内部成分比较复杂，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原因，到 1921 年 5 月左右，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青年团，都暂时停止了活动。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运动进入了新阶段。1921 年 8 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

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青年团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从苏俄返回上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决定，由张太雷主持，着手恢复和整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张太雷

张太雷四处奔波，首先恢复了上海团组织，进行团员重新登记，吸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而劝告坚持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退出团组织。1921 年 1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重新制定完成，这个章程吸取了过去建团的经验教训，着重从抓思想建团人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为了加强领导，决定在青年团中央机关未组成前，以团的上海机关代理团中央职权。

1922 年 1 月 15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创刊。创刊号至第 3 期，由北京青年团组织主办，邓中夏、刘仁静担任主编。第 4 期迁至上海，卣上海青年团组织主办，施存统任主编，蔡和森、高尚德参加编辑。《先驱》努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最早译述宣传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主张和思想；《先驱》还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了中国革命和青年团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刊物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对重新开展青年团工作，统一全团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地青年团组织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 1922 年 5 月为止，全国有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共 17 个地方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分布在江苏、河北、湖南等省，全国团员总数

达到 5000 多人。

为了适应团组织迅速发展的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青年团的建设，1922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局和临时团中央决定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各地发出通知，指明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议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国 S·Y 运动”。

1922 年 5 月 5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 15 个地区的代表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等 25 人。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出席并指导了这次大会。会期选择在 5 月 5 日马克思诞辰 104 周年召开，有着重大的意义，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

由于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开幕式，是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起举行，因此出席大会的来宾达到 1500 多人，是一次盛大的会议。会议首先由张太雷致开幕词，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发表了《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说，还有十多位代表和来宾发言，大会开得隆重热烈。

这次代表大会共开了 6 天，举行了 8 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 6 个决议案。施存统作了临时中央的情况报告，广州、北京、长沙、南京等地的代表报告了本地区团的工作。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确定了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团章规定“凡 15 岁以上，28 岁以下的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和

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大会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最后，大会在 5 月 10 日晚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担任书记。

在国内建团的同时，旅居法国、比利时、德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等 18 人，也于 1922 年 6 月 3 日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上开会，会议持续了三天，决定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担任书记。

不久，他们得知国内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便于 11 月 2 日写信给团中央，表示“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经与国内联系，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1923 年 1 月 29 日，收到党中央正式同意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回信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当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的周恩来，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表达了大家的心情，“我们现在已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旅欧的党团组织，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 30 多人，到 1924 年扩大到 200 多人，很多人回国后成为党组织的骨干。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1922 年七八月间，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

并拟出 19 条《劳动法案大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先驱》在第 11 期全文刊登了《劳动法案大纲》。为了配合《劳动法案大纲》的宣传，一并发表了《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的文章，指出劳动立法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法，为了在宪法上规定劳动法案，文章还号召青年工人要与成年工人协力合作，向国会请愿、举行游行、罢工以及其他示威运动。经过党团组织的广泛宣传，《劳动法案大纲》深受工人群众欢迎。

◎赵世炎

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少年中国学会，决定在 2 月 9 日举行集会，声援京汉铁路公认的斗争。3 月 1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案宣言》，揭露吴佩孚等军阀屠杀工人的残暴罪行，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一致团结起来奋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争回我们的自由以继诸先烈未竟的伟业啊!”

1923 年 8 月 20 日至 25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邓中夏、瞿秋白、林育南、恽代英等 30 多位代表，代表全国 6000 多名团员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接受了党的三大确定的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出：“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本团应保存本团的独立的严密组织。”保证了在政治方面，与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

大会通过的《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决议案》，明确肯定了社会主

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要完全依照共产国际的规定执行。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党的主张；在其他一切为青年利益而奋斗的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有完全自主权。

1923 年 10 月 20 日，在团的二大闭幕后不久，团中央在上海淡水路 66 弄 4 号创办了《中国青年》。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早期的创办人和主编是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任弼时、李求实等。刊物肩负的使命就是“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其发刊词的开首语中写道：“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

《中国青年》是在极其艰苦、非常秘密的条件下出刊的。编辑部在一所非常狭窄的房子里，屋内只有一两个书架子的参考书。开会、写文章、编辑、校对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晚上就在那里睡觉。为了避开警察和特务的破坏，还要经常搬家，刊物开始时是半公开的发行，后期只能秘密发行。《中国青年》自创刊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在青年中积极热情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大批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当时青年们的“良师益友”。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和指引下，广大青年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许多青年勇敢投入到工运、农运的火热斗争中去，进一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把青年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3.巾帼解放亦栋梁——把妇女动员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阶级关系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出发，自觉地将领导妇女争取解放视为己任，使中国妇女运动从此进入新的斗争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很重视妇女运动，发表了许多谈论妇女解放的文章，阐述妇女解放的问题。李大钊在其《现代的女权运动》中指出“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的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味，而且有互相辅助的必要”。他将妇女的解放与整个社会的解放、与劳动解放结合起来，他认为要想真正解放全体妇女，必须要做到“一方面要结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结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上做演讲，题为《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陈独秀首先指出“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先是大大批驳了当时一部分人的“不必社会主义，女子也可独立”的错误观点。接着他进一步指出，“女子若离了家庭……一定要受人雇，一定附于资本家，那么就会变成资本家的奴隶了”，因此，“必要把社会主义做唯一的方针才好”。这样，陈独秀就将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去谈妇女问题。此外，陈独秀还支持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刊物，宣传妇女与劳动者联合起来，解决“压迫在劳动与妇女上面的阶级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制度”。

李达在 1919 年 10 月写了《妇女解放论》，在妇女解放的途径上，指出“全劳动界，有合组团体的必要，所以男男女女互相结合起来，对抗那资本家”。1922 午他又在《妇女声》第 6 期上发表了《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指出“法律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限制，使得无钱无势的人不能得到读书的机会，使得女子不能取得读书的资格”，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未被推倒以前，我们暂不去作什么不分贫富、不分男女都受平等教育的空谈”。

毛泽东曾针对长沙震惊全城的赵五贞为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上刎颈自杀的事件，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等 9 篇文章，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揭露封建制度黑暗、残酷和吃人的本质，号召人民起来改造旧社会，争取妇女的解放。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就将领导妇女运动列入了它的议程之中。1921 年 8 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就着手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并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 9 卷第 5 号上，登载了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和新的章程。

1921 年 11 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的文件，要求各地“切实注意”妇女运动，并于即日寄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和章程，按新章从速改造或建立妇女组织。提出了奋斗纲领，除了要反映妇女一般利益的要求外，还要“在人权平等的理由上，我们努力拥护女工及童工的权利，为女工及童工所受非人道的待遇、痛苦而奋斗；在男女劳动同一阶级觉悟的理由上，我们主张女子参加一切农民、工人的组织活动；在男女对于社会

义务平等的理由上，我们主张女子与男子携手，加入一切抵抗军阀、财阀的群众运动；在民族生存权的理由上，我们须与外国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奋斗；在人类利害共同的理由上，我们主张与国外妇女团体联合”。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于妇女运动的基本主张。

19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党的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这也是第一个以政党的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高度重视。

决议首先分析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妇女的地位。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场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而俄国妇女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解放，“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他们业已在实际上参与改造社会的工作，与男子毫无区别。……以图根本解除妇女家庭的奴隶地位。可见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工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经过一世纪奋斗的结果。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

接着，决议指出中国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后，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妇女的悲惨处境，“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地位。他们在不堪忍受的工作状况中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不过取得比男子更低的工钱，对于女工童工的待遇，简直惨无人道。在中国现状之下，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残酷的地位，还有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

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

因此，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领导妇女运动的任务是：“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决议还指出，妇女的解放不仅仅限于此，因为这些努力“不过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决议还决定在尽快的时期内实现第三国际的这一决议，即“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决，定各国共产党于他们的组织之旁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宣传广大的妇女群众，并令在各国创立一妇女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

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向警予是参加中共二大的代表，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负责领导妇女运动。向警予，原名向俊贤，湖南省溆浦县人，是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法国留学期间，向警予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密切注视着世界形势和国内斗争，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1920 年 5 月 26 日，向警予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撰文《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批驳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表明她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认识。1922 年年初，向警予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7 月，在党的二大上，她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

一任妇女部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她撰写了大量文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向警予

向警予在当时党的妇女运动刊物《妇女周报》上，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贯彻党的妇女运动主张，对当时比较活跃的女权运劫、基督教妇女运动，一方面肯定她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争取男女平等以及援助女工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耐心教育她们要认清中国的大势，不要脱离国民革命运动，不要抛弃劳动妇女这支大军。1923 年《妇女周报》发表数十篇关于女工罢工斗争的文章，仅向警予一人便写了 6 篇，她高度赞扬 1922 年女工的斗争，称之为“妇女解放的先锋”、“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

这样，中共二大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妇女运动纲领，利用各种进步刊物，积极开展宣传工作。还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各小组对妇女问题就比较重视。例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 年在渔阳里 6 号举行了“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在活动的时候也开始做妇女运动。

中共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地为发展妇女运动做各方面的准备。开办妇女学校，培养妇女运动人才，培养妇女干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学校，于 1921 年冬诞生，李达任学校校长，学校是以女界联合会名义出面创办的，目的是培养妇女运动的人才，开展妇女工作。学校于 1922 年 2 月 10 日正式开学。

平民女校主要招收渴望追求革命真理、有志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青年或贫穷家庭的失学女子，如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等。

女校根据学生原有文化程度分为高级和初级两班，教师有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泽民、高语罕等人。常到平民女校作政治报告和时事演讲的还有张太雷、刘少奇、恽代英、施存统等人。

平民女校的学生还在学习之余，从事成衣、制袜生产，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支付日常生活开支。此外，女校还组织学生深入工厂、接近工人。1922年在叉袋角开办一所女工夜校，帮助女工学习文化，向她们进行革命宣传。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女校学生到社会募捐，支援罢工活动。这样，学生们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女校为党培养了第一批妇女干部，而通过办学校来培养妇女干部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积极有效的经验。

除了创办女校来培养妇女运动的人才，中国共产党还积极通过创办妇女刊物，扩大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1921 年 12 月，党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妇女声》，该刊由李达审稿，王会悟、王剑虹任主要编辑，她们都是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先声者。王会悟在《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趋向》一文中提出，女子的历史使命“就是根据阶级觉悟为阶级的结合去推翻资本制度”，“无产的妇女若不是自己起来掌握政权和奴隶制度开战，即是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时候，真的妇女解放就不能达到目的”。这个刊物公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和其他妇女刊物最根本的区别。1922 年 4 月上海浦东日华纱厂 3000 多名女工举行罢工时，《妇女声》热烈鼓励和支持女工的斗争，指出“工会是你们团结的中心点”，“资本家最怕的，就是工人的工会”，“在

罢工期内要维持秩序，不要听人煽动，男女工人一心一意团结到底”，号召各阶层妇女，声援和支持女工的罢工斗争。1922 年 6 月《妇女声》停刊以后，党又将宣传重心转移到早期党员邵力子任经理的《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上。

各地区的党团组织，都十分重视妇女运动，并创办了一批妇女刊物。广州党组织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天津觉悟社社员邓颖超、李峙山于 1923 年 4 月，发起团结和联络妇女的进步团体“女星社”，公开声明以“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宗旨。女星社创办了《女星》刊物，此外还开办了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以救济失业的妇女，希望这个学校“产生许多妇女运动的先锋队”。这些专门为妇女办的刊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办得非常活泼，深刻揭露了妇女受到多方面迫害的现实，抨击了封建势力和旧的社会制度，提倡打破旧礼教，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广泛发动女权运动，并进而探索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妇女刊物的出现，特别是彻底解放妇女的新思想的广为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妇女运动中，十分重视女工问题。1922 年 4 月，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起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的 3000 多名女工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党组织为了发展女工运动，从开办女工夜校、女工俱乐部人手，进行无产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她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党组织特别注重对女工领袖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她们领导女工斗争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了女工运动的发展。

共产党创建时期，有少数的女青年参加了党的创建活动，这个时期的

党员，大部分都是受五四运动启蒙，走上革命道路的。如天津女师学生郭隆真，五四运动中“经三次掏禁，仍然毫不退缩，依然猛勇奋斗”，于 1923 年加入旅欧中国青年团，她被当时党的组织称为“中国将来妇女运动中有力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组织女学生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培养发展女党员。1921 年冬，武汉女师进步学生在该校教师——共产党员陈潭秋、刘子通启发教育下，成立了妇女组织武汉妇女读书会，不定期地组织进步女青年学习《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产党》等书刊，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徐全直、杨子烈、袁溥之等八人于 1921 年年末至 1922 年年初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都转入共产党。此外，最早的女党员、女团员还有湖南的许文萱、杨开慧、张琼，广东的谭竹山，武汉的秦怡君等。建党初期女党员人数，据陈独秀报告，1922 年 6 月为 4 人，1923 年中共三大时为 13 人。经过几年的努力，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有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的妇女运动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组织发展、理论宣传、工人运动以及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结语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近代中国历经坎坷磨难，无数有识之士积极探索着救国的良方。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伴随着袁世凯的窃权，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北洋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压迫本国人民，中国虽然号称实现了共和，但仍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新的革命正在酝酿。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先进的知识分子，毅然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反对迷信、专制和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和新道德，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启迪了迷茫的中国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日本和欧洲的共产党组织陆续成立。这些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不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在最后一天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事变，给长期处在

黑暗之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投入了实际斗争之中，制定了党的纲领，掀起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开展了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征程，克服了一处又一处艰难险阻，取得一次又一次辉煌胜利。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峥嵘岁月。它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也应对着全新的挑战，在这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回顾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创建历程更有现实意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我们对悠悠党史的智慧继承，也是对时代使命的庄严宣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茅家琦等著．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鹭江出版社，2009

4.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5.郭晓平主编．中国共青团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6.彤新春著，晚清中国道路：多元博弈下的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庄士敦著，紫禁城的黄昏．译林出版社，2014

8.陈占彪编．五四事件回忆（稀见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9.曹成伟等著．执政襄助：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之路．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10.李春雷等著．赤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实，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11.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12.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3.刘宋斌、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4.沙健孙、龚书铎主编．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人民出版社．2001

15.刘明逵、唐良玉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16.彭明若，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

17.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

1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

19.高熙著．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求实出版社，1988

2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1.胡绳武、金冲及著．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

2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24.唐振南、赵丛玉著．风华正茂的岁月——新民学会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25.毛求主编，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1920-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26.陈弘君著．中共广东历史择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27.余世诚、刘明义著．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

28.吴家林、谢荫明著．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9.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党史研究文集.北京出版社，1989

30.陈绍康编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

31.王永祥等著．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32.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北京出版社，1981

33.孟醒著．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人民出版社，2009

34.朱成甲著．李大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5.朱文华著，陈独秀传．红旗出版社，2009

3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37.刘革学著，中国北洋军阀大结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38.高良佐著．孙中山先生传．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39.邓明以著．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0.回永广著.叛国奸贼——大汉奸的最后结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41.姚仁隽著，赵世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42.孪东朗、雷国珍著．董必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3.陈乃宣著，陈潭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4.田子渝著．李汉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5.杨青著．何叔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6.张树军著．张国焘．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8.闻少华著．陈公博传．东方出版社，1994

49.闻少华著，陈公博传．东方出版社，1994

50.高菊村、陈峰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51.杨树升编著．革命先驱李大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2.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53.元邦建著．谭平山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54.田子渝等编著，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55.张静如、马模贞编著．李大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6.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57.陈锡德著．王尽美，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

后　记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以来已走过了近一百年的伟大历程。她从几十人的党，成长为一个拥有近八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历程，缅怀革命前辈为创立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我们特组织编写了《建党伟业》一书。

本书主要描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社会状况，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过程和主要人物，各地党组织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中共一大召开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主要工作。

本书由何虎生主编，参加编写、修改、资料搜集、校对和其他工作的还有张天宇、赵文心、龙春利、戴晨京、韩晓青、向金芳、王汇鑫、王磊、朱晓艳、李晓雨等人。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也由于写作体例特殊：一是把建党伟业放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去描述，二是对每一个党小组主要介绍其成立经过和主要人物，三是把各地党小组成立后的活动集中起来描述。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否合理，是否遗漏了重要内容，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7年3月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鸣谢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书出版的支持